应对低生育率的政策：有效性如何？

1 号工作文件

2019 年 5 月

技术司

工作文件系列

人口与发展处

Tomáš Sobotka

维也纳人口研究所（奥地利科学院）/ 奥地利维也纳维特根斯坦人口和全球人力资本中心

Anna Matysiak

维也纳人口研究所（奥地利科学院）/ 奥地利维也纳维特根斯坦人口和全球人力资本中心

波兰华沙大学经济科学学院（自 2019 年 10 月起）

Zuzanna Brzozowska

维也纳经济和商业大学（WU）/奥地利维也纳维特根斯坦人口和全球人力资本中心

捷克布尔诺马萨里克大学社会研究学院

完整草稿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更新和修订。2020 年 2 月 7 日进行最后更正。

目录

概要——主要发现.....4
1. 引言.....6
2. 低生育率和很低的生育率：区域对比和主要驱动因素.....9
2.1 低生育率和生育偏好.....9
2.2 低生育率的原因是什么？.....15
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15
事业与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16
在家务和育儿分工方面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17
高强度育儿.....18
难以负担的房价.....19
家庭结构快速变化与固有规范、价值观和期望不符.....19
社会动荡.....20
3. 低生育率应对措施：解决思路及方法论相关问题.....21
3.1 国家家庭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什么？.....21
专栏 1. 政策文件和举措中明确和隐含的生育目标.....24
3.2 评估政策对生育率和生育率变化影响的关键问题.....26
衡量生育率的挑战.....26
衡量和对比政策的难点：一揽子政策（政策包）与单一政策.....30
评估政策的影响.....31
4. 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回顾与说明.....35
4.1 国家间政策取向和政策支出的主要差异.....35
4.2 儿童托育覆盖范围、可获得性和费用.....40
专栏 2. 挪威学龄前儿童托育：高质量、接近全覆盖以及提高生育率.....42
4.3 育儿假制度.....44
专栏 3. 瑞典“速度津贴（speed premium）”：长期成功？.....46
专栏 4. 设计全面、普遍和充裕的产假：以爱沙尼亚为例.....48
专栏 5. 育儿假使用的灵活性.....51
4.4 支持父母双方共享育儿假.....52
4.5 财政激励.....53
专栏 6. 俄罗斯联邦的“孕产资本”计划和生育率.....57
4.6 劳动力市场状况.....59
专栏 7. 大力推行家庭政策却生育率影响不明：以日本和韩国为例.....61
4.7 辅助生殖.....65
专栏 8.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中欧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鼓励生育主义政策和生育率.....69
4.8 政策组合：评估“一揽子”家庭政策对生育率的总体影响.....74
专栏 9. 瑞典和法国的现代“一揽子”家庭政策的漫长发展道路.....77
专栏 10. 德国现代家庭政策之旅.....79
5. 政策对生育的影响：结论性讨论和未来研究展望.....82
家庭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82
政策的不稳定性和财政的可持续性.....82
明确的生育政策未必最具影响力.....82
政策兼容性.....83
政策（无）目标性.....83
道德考量因素：反映家庭多样性和生育权利的家庭政策.....84
参考文献.....87
人口学相关词汇中英文对照表.....108
编译说明.....113

概要——主要发现

低生育率和政策响应

在过去 30 年里，**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在全球蔓延**。目前，全球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时期总和生育率低于 2.1 的国家。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东亚、南欧，以及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部分地区生育率达到“超低”水平，时期总和生育率为 1.0-1.4，平均每位妇女实际生育 1.4-1.6 个孩子。

如此低的时期生育率无法用生育偏好低来解释。在很低生育率（very low fertility）的国家里，女性、男性和夫妇双方通常期望要两个孩子，其平均意愿家庭规模为一个家庭有两个或更多的孩子。很低生育率表明，**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数量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来说该差距进一步拉大，原因在于这些女性发现兼顾职业、家庭生活与生育意愿更加困难。

因此，**提高生育率逐渐成为一项被多国家政府宣布的家庭政策目标**：自 1986 年至 2015 年期间，计划提高本国出生率的政府数量从 19 个跃升至 55 个。鼓励生育只是家庭政策的众多目标之一，除此之外，此类政策还包括补偿父母养育子女的经济成本、促进父母就业、支持儿童早期发展以及减少性别不平等。

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女性无法兼顾职业发展和家庭生活。一方面，当代大量女性接受过高等教育并参与劳动；另一方面，女性个人抱负越来越高，无法兼顾带薪工作与养育子女，最终导致不生育或只生育一个孩子。这与家务分工方面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密切相关：数十年来，强烈传统性别角色范式的社会持续呈现很低生育率的现象。近来，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包括育儿难度提升、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以及伴随不断飙升的房价。

家庭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

由于时期生育率测量本身的问题和单个政策内嵌于广泛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比较和**评估应对低生育率所采取的政策存在诸多挑战**。除了整体的政策支持之外，还有许多标准会影响家庭政策的有用性和有效性。这些因素包括政策的连贯性（不同的政策工具在多大程度上相互兼容，并与现有的劳动力市场和教育体系相适应）、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以及政策在满足不同家庭需求和愿望方面的灵活性。

高度发达国家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至 4%用于家庭支持。**用于家庭的公**

共支出水平与时期生育率以及代际家庭规模有紧密的相关性。

提供广泛可得、可及和高质量的托育、托幼服务，且在产假结束后立即开始，服务日常开放时间应与父母的工作时间一致，这些都是维持较高生育率的必要条件。北欧、比利时和法国等提供了这样全面综合的**托育、托幼**服务，并覆盖了大部分与家庭公共托育服务有关的支出。

其它的家庭政策效果则没有那么明显。产假是孩子出生到进入正式托育之间的时间桥梁。最有可能对生育产生积极影响是产假期间仍可以获得良好薪资。如果产假的目标是在育儿分工方面实现更多的性别平等，则应该按照“使用或放弃”的原则按比例分配（父母双方之间不能转让产假）。**一次性的财政激励措施**会对生育率产生适度的积极影响，但是短暂的。相对于那些严格的“朝九晚五”的工作安排，**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工作时间更具**家庭友好性。最后，**补贴和大范围提供辅助生殖服务**对生育率具有少许积极影响。

家庭政策的大规模扩展往往会对生育率产生相当大的短期影响，如导致短期婴儿潮和在有限时间内提高时期总和生育率。这一举措经常会影响生育的时间选择，支持早生和更短的生育间隔。但其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往往是有限的。不过，爱沙尼亚、日本、德国、俄罗斯联邦和其它国家的案例也表明，它们有助于制止甚至扭转队列生育率的下降趋势，为家庭规模的长期稳定奠定基础。

最有效的政策是能够满足男性和女性在不同生活状况中差别化需求下的生育选择。这些政策应促进有偿工作和养育孩子之间的协调，但也需对收入有限的家庭提供经济支持。北欧、法国或比利时等国已经实施和持续制定了上述综合政策包，其他国家包括德国和韩国也在努力开发本国的政策包。

未来的政策挑战

未来的家庭政策需要反映不断变化的家庭挑战及新出现的经济社会挑战。家庭政策需要考虑到家庭的高度不稳定性和反映日益多样化的家庭需求，包括单亲家庭、未婚同居夫妇、同性恋家庭和“重组”家庭。需要反映经济不平等加剧、新的不稳定的就业模式、不断变化的性别角色、母亲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许多家庭难以承担的住房成本。还需要满足人们对生育时间、子女数量的不同偏好，以及个体对于为人父母前提条件的认知差异。简而言之，家庭政策应促进创建家庭友好型和儿童友好型社会，并聚焦于儿童和家庭健康、教育和福祉的全面发展。

1.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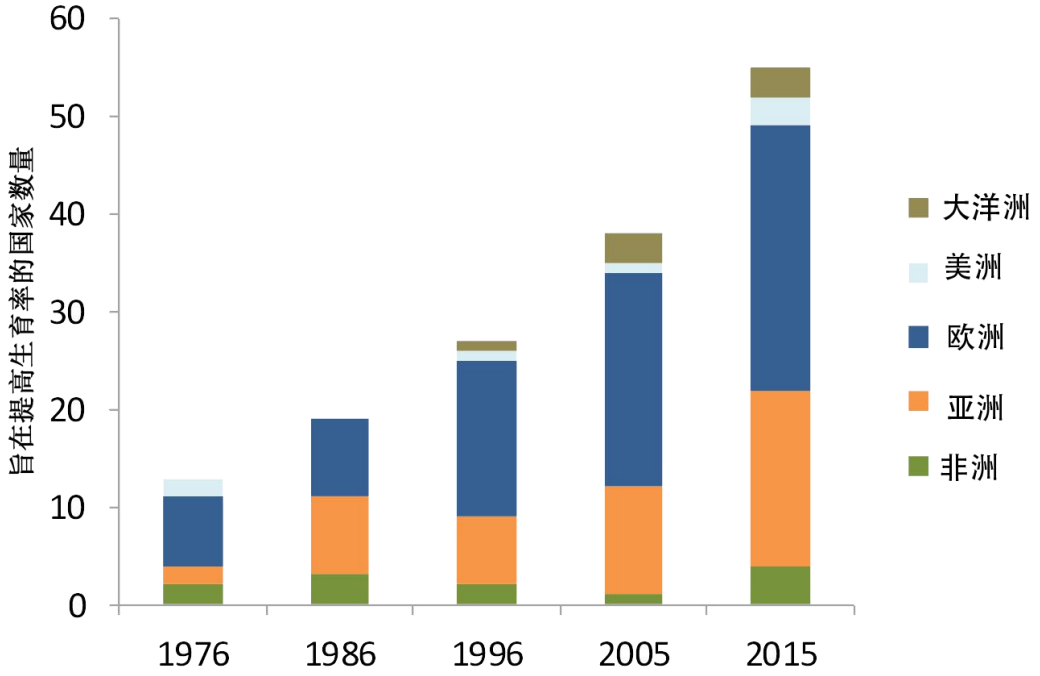
在最近的 30 年间，生育率下降导致的家庭户规模缩小已经成为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联合国人口基金，2018）。目前，全球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时期总和生育率低于 2.1 的更替水平线下的国家里，这意味着，如果未来没有生育率的提高、死亡率的改善或吸收国际移民，这些国家的人口最终将开始缩减（Wilson，2004；联合国，2017）。20 世纪 80 年代，只有高度发达的国家才会出现低生育率。而最近低生育率已成为一种全球现象，越来越多的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呈现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现象。而且低生育率的情况并非相同。通常情况下，生育率下降达到更替水平也不会停止继续下降的趋势，在南欧、东南欧和东欧的一些国家，生育率下降到“很低（very low）”的水平，其总和生育率为每名妇女生育 1.5 个孩子或更少。

生育率“很低”（总和生育率低于 1.5）、“极低”或“超低”（总和生育率低于 1.3）的现象开启了一条难以预料的全球生育率转变的道路，这让许多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担心其潜在的后果（Stark & Kohler，2002；Westley et al.，2010；Hakkert，2014；Poston et al.，2018 年）。这些担心包括人口趋势的长期可持续性（包括整个国家人口、特定地区或者人口群体的实际或预期人口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进而将给公共财政、养老金系统、社会保障和老年服务带来更大的压力。这些担心还涉及预期的经济增长停滞、劳动力减少，以及需要实施对社会保障体系、卫生保健或劳动力市场进行快速的改革。在一些国家，尤其是东南欧和东欧国家，低生育率现象伴随着本国向欧洲其他富裕国家的长期移民流出，进一步加速了人口和劳动力的萎缩。从 1990 年至 2017 年，欧洲有 18 个国家人口减少，其中一些国家（波黑、保加利亚、摩尔多瓦、乌克兰）自 1990 年以来人口规模减少了至少 18%（欧洲人口数据表；VID，2018）。此外，2017 年至 2050 年，全球 51 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预测将出现下降趋势，其中东南欧和东欧的降幅最大。中国作为目前人口最多的国家，预计从 2030 年起人口也将开始减少（联合国，2017）。

面对这些可能，许多政府开始实施家庭支持政策。这些政策已成为当代福利国家不可或缺的部分，用以支持家庭的健康和福祉，儿童的成功发展，降低家庭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缓解贫困。例如，在除美国之外的所有高收入国家，在职父母现在都享有孩子出生后的带薪假期。许多面临低生育率的政府也转向出台刺激出生率的家庭政策。鼓励生育政策的历史与低生育率的历程一样悠久：例如，法国在 1919 年就施行家庭份额制度，对无子女的人征收额外的税收，对有子女的纳税人实行税收减免，从而刺激生育（陈，

2004）。但直到最近的 30 年，鼓励出生主义才开始在全球扩展。自 1986 年至 2011 年间，政府报告其政策目标为提高生育率的国家数量从 19 个跃升至 52 个。2015 年，联合国编制的世界人口政策数据库（2015）显示，55 个国家和地区的目标是提高生育率，占所有国家的四分之一（28%）。这其中，有 27 个国家来自欧洲（占欧洲国家的 60%）、18 个国家来自亚洲（占亚洲国家的 38%；参见图 1）。

图 1 不同时期政府宣布其目标是提高生育率的国家数量



数据来源： *世界人口政策数据库*（联合国，2015）

包括匈牙利、日本、韩国和俄罗斯在内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政府议程上将刺激生育工作摆在了重要地位，并得到了广泛的媒体报道（专栏 1）。因此，研究这些鼓励生育干预政策的前提、目的和目标并分析其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越来越多的文献分析了特定政策干预对生育率的影响，帮助我们更广泛地了解家庭政策执行的结果和效果。同时，我们的认知仍然是零散的。衡量家庭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是一项棘手的任务，而且要面临误解、伦理问题、目标界定不清、测量困难和数据限制等困难（Neyer & Andersson，2008；经合组织，2011；Thévenon & Gauthier，2011；Luci-Greulich & Thévenon，2013；Hakkert，2014；Lutz，2014；Matysiak& Węziak-Białowolska，2016；参见第二节）。从长远来看，许多政策缺乏正当性或财政不可持续，更多的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而不是科学证据。频繁且可能令人困惑的变化使政策效果难以评估。

许多政策忽视了当前的家庭多样性，或只针对某些人口群体，如已婚夫妇或低收入

家庭。生育率通常是根据时期总和生育率来评估的，而往往时期总和生育率是不稳定的，且可能会受到生育时间变化的强烈影响。特别是在一些政策频繁变化的国家，为了从新出台的但可能很快就会消失的政策中受益，个人可能决定尽早生育（而不是更多地生育），这些国家的时期总和生育率可能会形成国家生育率走高趋势的假象。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这些问题，其中概述了评估家庭政策效果所面临的挑战。

本报告旨在总结家庭政策对生育率影响的现有证据。我们将文献综述与特定国家和政策干预的实例相结合。此外，我们还讨论了政策与生育率联系的复杂性。在我们的综述中提出了以下主要问题：

- 国家出台家庭政策目的是什么？
- 为了阻止或扭转生育率下降而出台的政策目标和范围是什么？
- 分析政策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 在文献中明确低生育率的决定因素与出台解决低生育率问题的政策之间是否有良好的一致性？
- 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家庭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有些国家在解决低生育率问题上比其它国家更成功吗？
- 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参差不齐和模糊不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政府如何能够做得更好？

鉴于我们的研究范围广泛，我们的综述必须是有选择性的，不能针对所有问题提供全面的证据。我们通过高质量的生育率数据，将注意力集中在低生育率国家的国家政策。其中大多数国家在低生育率以及福利政策和政府政策干预方面都有相对较长的历史。这将我们的关注范围缩小到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东亚、美国、加拿大和以色列。我们提供了更加详细的家庭政策实例，这些政策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扩展，并且这些政策构成了具体、明确的干预措施，可以视为案例研究。我们的工作基于大量证据，包括 Hakkert（2014）对低生育率国家人口政策的回顾、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出版物（特别是 OECD 2006a、2011、2017a & 2019），以及过去 20 年发表的关于家庭政策及其影响的广泛研究。

2. 低生育率和很低的生育率：区域对比和主要驱动因素

在讨论家庭政策，家庭政策多样性和测量挑战之前，我们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当代低生育率的情况，特别关注包括南欧和东亚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很低的生育率。我们强调了测量生育率的不同方法，并展示了时期指标和与家庭规模相关的不同年份出生（出生队列）的队列指标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们还讨论生育偏好和实际生育率之间的差距，以及大多数高度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强烈的二孩家庭模式的倾向。最后，我们讨论了低生育率背后的关键因素，特别关注了导致生育率下降到很低水平的因素。Wilkins（2019）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一份报告中对低生育率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更详细的回顾。

2.1 低生育率和生育偏好

这些文献广泛地论述了生育率的变化及其在高度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Basten et al., 2014；Billari，2018；Bongaarts, 2002；Frejka et al.，2008；Jalovaara et al., 2018；Kohler et al.，2002；Rindfuss& Choe，2015 & 2016；Sobotka，2008 & 2017；联合国人口基金，2018；Wilkins，2019）。这里，我们简要概述当代低生育率的主要特征。

简而言之，时期生育率低且不稳定，表现出频繁的起伏（Frejka & Sobotka，2008）。此外，生育年龄不断推迟（Sobotka & Beaujouan，2018；Beaujouan & Sobotka，2019），家庭变得更多样化及更不稳定，伴侣关系和居住安排变得越来越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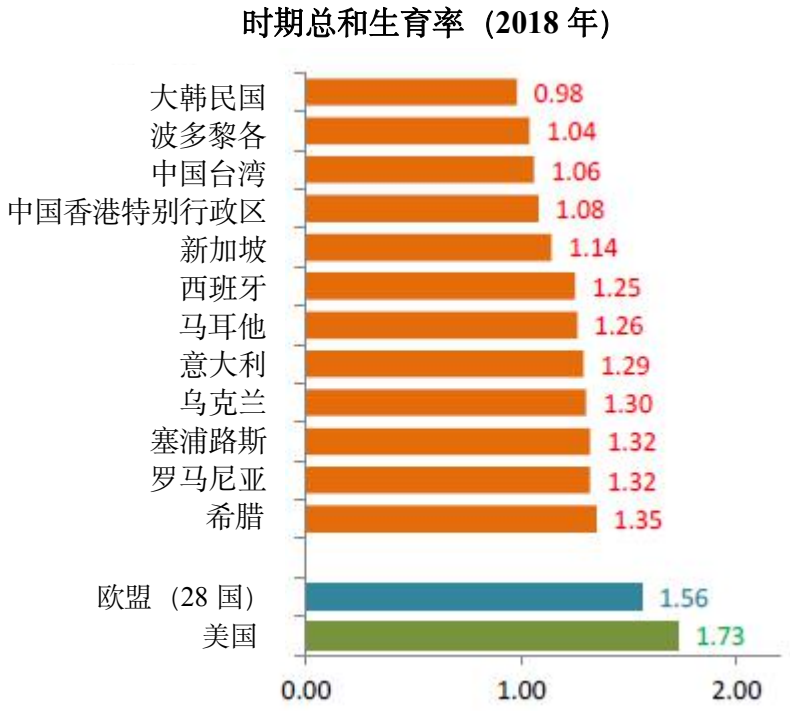
目前，除以色列外，所有高度发达国家的时期生育率都处于低水平[1]。关键的区别在于生育率降至很低水平的国家与生育率保持偏低水平的国家之间的差别（Billari, 2018）。对于 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妇女来说，她们现在几乎已经完成了生育角色，中低水平和很低水平之间以终身生育率 1.6 左右为界。西欧和北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的妇女保持较高的终身生育率, 每名妇女平均生育约 2 个孩子 (Myrskylä et al., 2013；联合国人口基金，VID2018）。有些国家（例如中国、韩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生育率仅接近或略高于 1.6 的边界。相比之下，南欧国家（希腊、意大利、马耳他、葡萄牙和西班牙）、中欧和东欧部分国家（罗马尼亚、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德国、日本和新加坡的生育率则低于该边界（联合国人口基金，2018）。大多数国家的生育率在用时期总和生育率衡量时甚至更低。从极低生育水平来看，韩国于 2018 年达到全球极低总和

[1]以色列是一个重要的例外，保持较高生育率（时期总和生育率以及世代完全生育率大约为每名妇女生育 3 个孩子）的原因是一些种族和宗教团体的高生育率（Okun 2013 年，Anson 和 Ajayi 2018 年）和根植于宗教、文化传统、国家历史的高度支持家庭的态度（Della Pergola 200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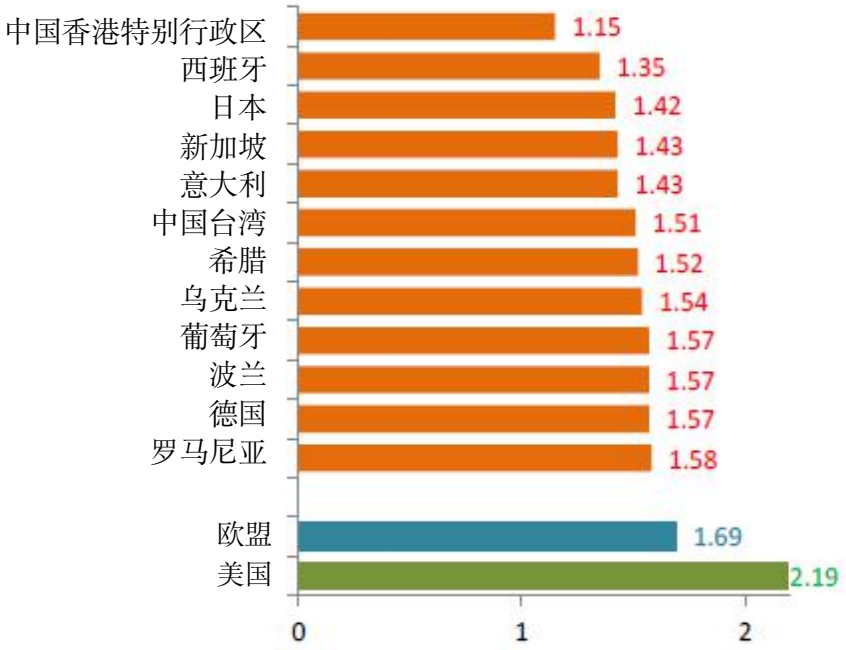
生育率水平 0.98。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为“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 2018 年的总和生育率为 1.06-1.14，南欧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为 1.25-1.4（图 2）。

生育率接近每名妇女平均生育两个孩子还是一个孩子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没有大量移民迁入和由于外迁而导致人口减少的国家。在缺乏迁入移民和死亡率没有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如果总和生育率长期保持在 1.8 的水平，将导致人口规模每年下降 0.4%，进而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可以说，人口的适度下降可以通过逐步调整劳动力市场、养老金制度、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来解决，或者可以通过接收适度的迁入移民来抵消。相比之下，长期总和生育率为 1.0 将导致人口规模每年下降 2.4%，并会加剧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即便对于那些接收大量移民或愿意对其社会保障和养老金制度进行彻底改革的政府，如此快的人口下降速度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图 2 2018 年时期总和生育率最低和 1976 年出生妇女的世代终身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和地区



终身生育率（每名 1976 年出生的妇女终身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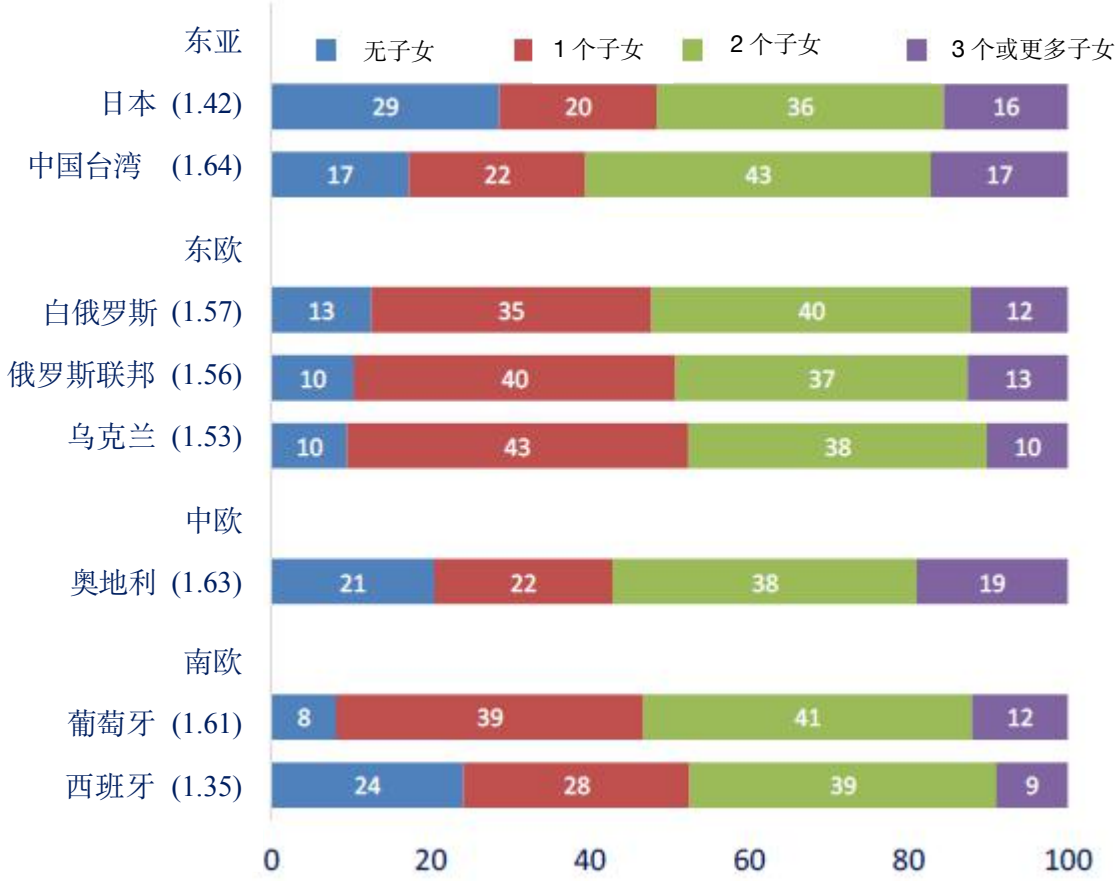
注：数据不包括人口在 10 万以下的国家和地区。塞浦路斯、马耳他和希腊的总和生育率是 2017 年的数据。该表格不包括波黑和摩尔多瓦共和国的数据，因为这些国家的数据可靠性较低。乌克兰的数据包括政府控制地区的数据。

来源：欧盟统计局（2018），人类生育率数据库（2019），欧洲人口数据表（VID，2018）和各国统计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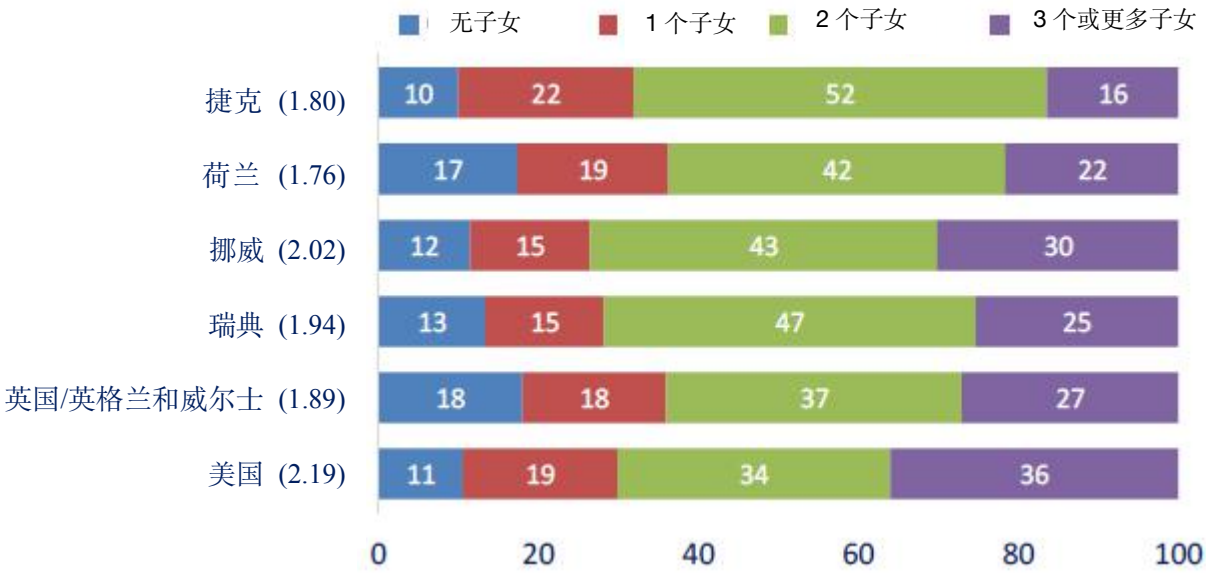
低生育率意味着拥有较大家庭规模（生育三个及以上的孩子）的妇女相对较少。较大规模的家庭在东亚国家、东欧和南欧变得最少见。例如，在白俄罗斯、日本、韩国、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20 世纪 70 年代初出生的妇女中，12%-15%有至少三个孩子，仅有 2%-4%至少有四个或更多孩子（人类生育率数据库，2019；CFE 数据库，2019；图 3）。在西班牙，20 世纪 70 年代初出生的妇女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有三个及以上的孩子。相比之下，许多生育率偏低的国家，包括挪威、瑞典、英国和美国，有三个及以上孩子的妇女比例（25-36%）要高得多（图 3）。很低生育率的国家和中等低生育率的国家之间的另一个差别在于，前者只有一个孩子的妇女所占比例往往高很多。独生子女家庭在南欧和东欧国家最为普遍，而在葡萄牙、俄罗斯和乌克兰，每十个妇女中就有四个仅有一个孩子（图 3）。在设计和评估政策时，这些数字也很重要：在那些许多妇女在计划生育第一个或第二个孩子时遇到困难、而政策针对的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的妇女“群体”相对较小的国家，鼓励妇女和夫妇扩大家庭规模的政策可能是无效的。

图 3 部分低生育率国家和地区 1971-1975 年出生的妇女生育的子女数（%）和终身生育率（括号内）；

a) 生育率很低的国家和地区



b) 生育率中等低水平的国家



注：数据显示女性在 42 岁（英国为 45 岁）之前所生育的子女数量。这接近于她们生育年龄结束时的终身生育率，因为只有很小一部分（约 1%或更少）是在 42 岁以后生育的。括号里的数字显示的是 42 岁时的队列终身生育率（家庭规模）。数据涵盖以下年份出生的妇女：乌克兰 1971 年，中国台湾、俄罗斯、挪威、英国 1972 年，葡萄牙 1973 年，日本、白俄罗斯、西班牙、捷克、荷兰、瑞典和美国 1974 年，奥地利 1975 年。

来源：人类生育数据库 (2019)、英国国家统计局 (2018)（数据仅适用于英格兰和威尔士）。

在过去的 40 年中，不仅生育水平发生了变化，生育时间和对生育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生命历程事件发生的顺序也产生了变化。教育扩张使生育年龄向后推迟。长期教育之后，职业发展轨迹越来越不稳定，也越来越复杂。将生育年龄推迟到接近 30 岁或 30 岁以后，准父母可以在劳动力市场获得更安全的立足点，积累足够的资源，获得住房，实现更稳定的伴侣关系，享受无子女的生活方式，并为养育子女做好准备（Schmidtet al.，2011；Sobotka & Beaujouan，2018）。因此，大多数低生育率国家的女性现在平均在 27-30 岁成为母亲，比 20 世纪 70 年代晚了 5 年左右。意大利、西班牙、瑞士、日本和韩国的女性平均 30 岁之后才生育第一个孩子（VID， 2018）。此外，许多女性，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将生育年龄推迟到接近 40 岁或 40 岁出头（Sobotka，Beaujouan &Sobotka，2019）。这种“不断推迟”（Berrington，2004）使夫妇更有可能发生不孕，并寻求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

很低生育率并不能反映很低的生育数量偏好。欧洲和其它高度发达地区的女性一直强烈表示想要两个孩子；平均理想和意愿生育数量为每名妇女生育两个及以上的孩子 (Morgan & Rackin, 2010; Sobotka & Beaujouan, 2014; Sobotkaet al.，2015； Beaujouan & Berghammer，2019）。在很低生育率的国家，人们年轻时的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数量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这表明许多女性、男性和夫妇双方在实现其生育计划时都面临障碍。在欧洲，南欧的意愿生育率和实际生育率之间的差距最大，在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每名妇女平均生育 0.6-0.8 个孩子（表 1；Beaujouan & Berghammer， 2019）。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和夫妇来说，这一差距往往更大，因为他们在兼顾职业发展和家庭意愿方面常常面临巨大的障碍。在个人层面，意愿生育率和实际生育率之间的差距可

能是由于生育计划改变以及家庭政策无法对生命事件和环境状况产生影响造成的（例如，健康状况差、伴侣之间意见分歧、没有合适的伴侣、伴侣关系破裂）。计划生育率和实际生育率之间的较大差异，即大约每名妇女 0.3 个孩子及以上，构成了形成旨在解决女性和男性在实现其家庭计划方面所面临障碍的家庭政策最有力的理由之一（Sobotka & Lutz, 2010；Philipov, 2009）。也即构成了 Gauthier（2007）所说的“政策机会之窗”。

表 1 欧洲和美国部分国家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出生的妇女在 20-24 岁时的意愿家庭规模（意愿总和生育率）与其 40-42 岁或以上时的实际家庭规模（实际总和生育率）之间的差距

很低队列生育率的国家				中等低队列生育率的国家			
	意愿家庭规模	实际家庭规模	差距(实际-意愿)		意愿家庭规模	实际家庭规模	差距（实际-意愿）
东南欧和东欧				捷克	2.04	1.81	-0.23
保加利亚	1.88	1.63	-0.25	法国	2.14	2.02	-0.12
拉脱维亚	2.13	1.67	-0.46	匈牙利	2.14	1.86	-0.28
南欧				荷兰	2.32	1.76	-0.56
希腊	2.27	1.56	-0.71	挪威	2.46	2.08	-0.38
意大利	2.09	1.43	-0.66	英国	2.22	1.90	-0.32
葡萄牙	2.14	1.58	-0.56	美国	2.33	2.18	-0.15
西班牙	2.18	1.43	-0.75	***7 国平均值***			
中欧					***2.24***	***1.94***	***-0.29***
奥地利	1.95	1.67	-0.28				
德国	1.83	1.53	-0.30				
斯洛文尼	2.30	1.69	-0.61				
瑞士	2.25	1.64	-0.61				
10 国平均值							
	2.10	***1.58***	***-0.52***				

注：年轻时意愿家庭规模与实际家庭规模之间的差距是根据人类生育数据库和其它资料来源，通过比较 20 岁出头的女性生育意愿的调查数据与同批女性在 40-42 岁时实际实现的家庭规模数据而得出。20-24 岁意愿家庭规模的数据是基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展的调查。除了挪威和英国的数据是关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出生的女性，其他大多数数据集都是关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到中期出生的女性。详见 Beaujouan 和 Berghammer (2019 年）文献中的表 3。

来源：Beaujouan 和 Berghammer（2019）文献中的图 1。

2.2 低生育率的原因是什么？

大量的文献研究了导致生育率从较高水平下降至相对较低水平的因素，以及低生育率的原因（例如，Adsera 2004、2005; Balbo et al. 2013; Basten et al. 2014; Canning 2011; Feyrer、Sacerdote 2008; Hirschman 1994; Lesthaeghe 2010; Morgan、Berkowitz King 2001; Morgan 2003; Morgan、Taylor 2006; Rindfuss et al. 2003; Rindfuss、Choe 2016; van de Kaa, 1996;另见 Wilkins 的比较报告（2019 年））。本研究将不再赘述。我们专注于当代高度发达国家典型的中等低生育率与很低生育率之间的差异（例如，UNFPA，2018），并概述文献反复提及的很低或“超低”生育率的重要决定因素。这些因素并非孤立地起作用，而是形成了一套更为广泛的制度条件，使个体和夫妻难以实现他们的生育计划（Rindfuss、Choe 2015; 2016）。我们讨论了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的影响、就业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冲突、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高强度育儿、住房成本、快速的家庭变化和社会对婚姻和生育的期望之间的不匹配，以及社会动荡的影响。虽然其中例如住房可及性和住房成本等因素与政策有直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政策干预得到缓解，但有些因素已超出了传统家庭和社会政策的范畴。

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

获得经济保障、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获得合适的住房通常被列为为人父母的重要先决条件（Thomson & Lee, 2011）。上述不确定性对生育率有负面影响：它会对首次生育意愿尤其是男性的首次生育意愿产生负面影响（Fahlen、Oláh 2018），并会导致生育推迟（Kreyenfeld, 2010，Vignoli et al., 2012，Pailhé & Solaz 2012）。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已被反复确认为各国生育率下降的重要驱动因素（Sobotka et al., 2011），在最近一次 2008 年至 2013 年的经济大萧条期间也是如此（Comolli, 2017; Matysiak et al., 2018）。在一些社会中，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Adsera（2004 & 2005）和 Barbieri et al.（2015）认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不稳定的（劳动）合同是南欧生育推迟和低生育率背后的重要因素。

在许多高收入国家，经济的不确定性集中在年轻人身上，体现为工作的日益不稳定和偏低的收入，2007 年至 2010 年的经济衰退愈发加快了这一趋势（Sironi 2017, Katz & Krueger, 2016）。在高度发达的国家，1981 年至 2000 年出生的“千禧一代（Millenials）2”与前几代人相比，在 20 多岁和 30 岁出头时的收入或停滞不前，或有所下降，南欧（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降幅最大，其次是德国和美国（Rahman & Tomlinson, 2018：图 7）。住房成本的上升进一步加剧了许多年轻人生活的拮据。其中许多人因此无法达到所谓组建家庭所必需的物质标准——稳定的工作、足够的收入和合适的住房。其结果便是，住房独立推迟、结婚推迟、生育推迟，简而言之，即一种“成长失败综合征”（Sanderson et al., 2013）。

收入和经济地位的下降趋势在较低和中等教育程度群体中尤其明显，这加剧了经济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地位差距。持续的全球化和技术革新导致对中级技术工人的劳动力需求下降，给低级技术工人的工资造成下行压力，迫使工人接受低收入、零散（固定期限、短时间、随叫随到）合同（Autor & Dorn, 2009; Goos et al., 2014; Ridao-Cano & Bodewig, 2018）。因此，中级和低级技术人员组建家庭的机会可能会尤其受到持续的劳动力市场转型和日益增加的就业不稳定性的强烈影响（Adsera, 2017）。

事业与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

高等教育的扩张伴随着大量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她们在成为母亲后不再辞职，而是选择兼顾育儿和参与有偿工作（Goldscheider, 2000，Goldin, 2006）。尽管在诸如奥地利、荷兰或德国等许多西方经济体中，母亲从事兼职工作仍然最为普遍（Berghammer, 2014），但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夫妇中，双职工家庭已经取代了男性养家的家庭模式（Steiber et al., 2016）。这种转变极大地提高了旨在减少事业和育儿之间矛盾的“协调（reconciliation）”政策的重要性，尤其是提供育儿假和产假，以及父母工作时间和包括兼职、灵活工作安排等就业条件的规定（McDonald, 2006; OECD, 2011）。

[2] 译者注：“千禧一代”是指出生于 20 世纪时未成年，在跨入 21 世纪（即 2000 年）以后达到成年年龄的一代人。

在新的双职工模式下，以工作时间长而灵活性有限为特征的严格而苛刻的劳动力市场对生育决策产生了负面影响。东亚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情况尤其明显。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工作时间尤其是男性的工作时间过长与母亲在子女的教育和养育方面承担的家庭责任过多相冲突（又见专栏 7）。这些地区的工作文化是奖励资历和工作时间，这就需要投入很长的工作时间，并随时准备满足临时的工作需求（Nagase & Brinton, 2017; Brinton, 2019）。想要在如此苛刻的劳动力市场上参与竞争的女性需适应竞争性的“男性化”工作方式。由于在家庭中几乎得不到男性伴侣的支持，她们无法在抚养孩子的同时兼顾繁重的工作。与此同时，那些选择减少工作时间的人往往失去晋升机会和享受包括产假在内的社会福利的资格。女性在签订临时劳动合同的人员中也占比过高，而临时劳动合同也不会给予女性享受休假福利的权利（Lee et al., 2016）。这使得女性几乎不可能同时兼顾家庭和劳动力市场的角色（日本，Tsuya, 2015; Rich, 2019）。

Cooke 和 Baxter（2010）认为，那些至今仍然认可男性养家模式的社会中生育率是最低的，因为这些国家仅为母亲的就业提供有限的公共或市场支持。东亚、南欧和讲德语的国家都属于这一类。相比之下，北欧国家和一些西欧国家（法国、比利时）则通过大力提供针对所有年龄段儿童的托育服务，并对产假实施包括缩短休假时间但提供更高工资且覆盖父母双方等改革措施，从而很早就对提高女性的就业参与做出了应对。(见专栏 3 和 9)。

在家务和育儿分工方面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

尽管母亲参与到劳动力市场已是普遍现象，但在世界各地，女性仍然比男性承担更多的家务和育儿任务（OECD, 2017a）。在欧洲境内，北欧国家的这类差异最低，而南欧国家则最严重，其女性仍承担 75%以上的家务（Fisher & Robinson, 2010; Kan et al., 2011）。东亚女性承担的家务责任甚至更高。尤其是韩国和日本，在 2010 年前后的富裕 OECD 国家中有着最不平等的家务劳动性别分工，女性承担了 88%的无偿劳动（OECD, 2017a: 191; Kim, 2018）。

在过去，家务劳动与育儿方面均存在严重的性别不平等。当时男子主要负责赚取收入，而妇女则负责生育和抚养子女。然而，在女性从事有偿工作的社会中，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通常会导致低生育率。正如 McDonald (2000: 1) 所说，“如果妇女在教育和市场就业方面获得与男子几乎相等的机会，但是，这些机会由于生育而受到严重限制（……），那么妇女将限制生育的数量，使生育率长期处于不稳定的低水平……” Goldscheider 等人（2016）和 Esping-Andersen 和 Billari（2015）也认为，向性别平等主义的转变和男性更多地参与家庭是实现生育率上升的先决条件。这一结论得到了 Myrskylä等人（2011）的支持，其研究表明，在高度发达国家，财富、健康和教育方面的发展对生育率的积极影响取决于性别平等程度：性别平等程度低的国家，即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高，但其生育率仍然很低。

根据这些论点，一些国家实施了以提高家庭中性别平等为目的的措施。例如，他们引入了带薪育儿假，按照“使用或默认放弃”的原则给父母双方分别分配产假（父母双方之间不能转让产假）。这种育儿假计划背后的想法是，他们给予父亲法定的权利，休假照顾孩子（Brandth & Kvande, 2009）。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项政策缓和了父亲和雇主之间的谈判，雇主仍然倾向于认为男性是“理想的工人”，因为他们会不受家庭责任影响，一心一意投入工作（Acker, 1990; Davies & Frink, 2014）。

高强度育儿

关于如何做一个好父母的社会规范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育儿日益以儿童的需要为中心，需要更高的情感、时间和资金投入，以及更多的“专家知识”(（Hays, 1996）。高强度育儿的趋势与儿童大脑发展的新证据相一致，这些证据强调了父母投资对儿童情感和认知发展的重要性（Wall, 2010）。现在人们普遍达成共识，即生命的早期阶段对于未来在教育、劳动力市场和人际关系方面的成功至关重要（Wall, 2004；经合组织，2006b & 2011）。因此，父母更注重与孩子的直接互动，更关注孩子的需求和认知刺激。对欧洲和美国的研究发现，尽管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上升，但母亲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并没有减少（Bianchi 2000；Gauthier et al.，2004）。相反，母亲在进行其它活动时，会花更多的时间

直接与孩子互动，而不仅仅是只是看管（Bianchi，2000）。此类现象在中产阶级人群中最为突出，他们会“通过组织休闲活动和培养深入思索，从而提升孩子的才能”（Lareau，2002）。为儿童能力发展投入更多精力给父母带来的压力促使了私立学校市场的发展以及家庭教育的发展，因为这种独立式的教育能够更好地调整学校课程的设置，从而培养孩子的独特才能（Aurini & Davies, 2005）。因此，生育子女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上升，是导致众多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育儿成本的上升则是由育儿强度增大、双职工家庭的增加与高度经济不确定性所导致。

难以负担的房价

房价和住房的可获得性（包括获得抵押贷款）会对生育率造成影响，尤其是对于第一胎生育率的影响最大（Mulder，2006）。很低的生育率与住房市场管理体制有关，该体制将自有住房高比例和获得抵押贷款的高门槛相结合，在南欧、中欧和东欧很典型（Mulder & Billari，2010）。过去十年里，许多城市的房价飞涨，吸引了大批的移民并带动了经济增长。从 2008 至 2017 年，伦敦、阿姆斯特丹、柏林、维也纳或华沙的房价涨幅远高于周边乡村（欧洲城市报告，2018）。在英国，1980 年至 1990 年代中期出生的“千禧一代”，将近四分之一的收入用于住房，远远超过前几代人（决议基金会，2018: 69）。住房挤压可能对生育率产生负面影响。Clark（2012）的研究表明，对于美国而言，与居住在价格最低地区的人群相比，居住在房价昂贵的大都市地区人群，首次生育时间会推迟三到四年。

家庭结构快速变化与固有规范、价值观和期望不符

生育率还受到年轻一代社会和家庭快速变化的影响，这些变化与固有生活安排、婚姻、父母身份和父母角色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和期望相冲突。例如，东亚地区在婚姻、家庭和养育子女方面持续存在着固有传统观念 (Raymo et al., 2015)。由于该地区很少接受婚外生育，日本、朝鲜、中国台湾或新加坡的生育几乎完全在婚内进行，婚外生育的比例仍然很低，为 2%-4%（Raymo et al., 2015)。此外，婚姻中仍然存在对子女、家庭和亲属一整套固有的

性别期望、压力和义务的规范，这极大地增加了女性的压力和负担（Bumpass et al.，2009）。此外，男女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年轻女性认为男性多以自我为中心、不成熟、缺乏社交技能，对未来伴侣的期望随之发生了变化（Lei, 2017，日本），导致许多女性对传统婚姻缺乏热情（Bumpass et al.，2009），使得不生育和不结婚的人数迅速增加（例如，Jones & Gubhaju, 2010；Raymo et al., 2015），从而带来了持续的低生育率。

社会动荡

社会和政治动荡，常常伴随着经济动荡，并阻碍人们组建家庭或再次生育。从历史上看，社会危机下人群更倾向于晚婚晚育，并导致生育率下降（Caldwell, 2004）。除了物质匮乏和经济不稳定等因素外，社会动荡时期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也迅速发生变化，这可能增加导致人民的“失范感”和“迷茫感”（Philipov，2002）。中欧和东欧地区，随着 1989 年至 1991 年国家社会主义体系的崩溃，大规模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调整使得生育率发生了大幅下降，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向晚育转变（Sobotka, 2011; Billingsley, 2010）。

中欧和东欧地区各国经济转型成功率相差较大，许多东欧国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经历了严重的和长期的经济危机。正如 Perelli-Harris（2008：1163）在乌克兰案例中所述，在“经济贫血”的情况下，人们不愿意承担包括生育在内的额外风险，因为“他们认为已经失去了对环境的控制”，可能想“避免花费抚养孩子所需额外的体力和精力”。

3. 低生育率应对措施：解决思路及方法论相关问题

影响生育决策的潜在相关政策种类繁多，其中许多并未明确设计为家庭政策。从广义上讲，家庭政策包括“政府为家庭所做的一切事情”（Kamerman & Kahn，1978：3，引用自 Neyer & Andersson，2008：701）。医疗保健、教育政策、住房法规、劳动力市场法规、提供辅助生育或税收政策，为养育子女和创造环境提供的条件，可以起到促进或阻碍生育孩子的作用。国家政府并非支持家庭的唯一“行动者”：区域、市政当局和企业往往都有支持家庭生育和利于培育儿童所设置的相关计划或倡议。

从广义上讲，家庭政策随着福利国家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受到国家类型以及福利制度的影响（Esping-Andersen，1990，1999）。社会规范、价值观、主流意识形态、宗教传统、历史经验、公众话语、可用资源及其他国家的案例，形成了各国不同的政策。这些政策组成了“一揽子计划”，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制定形成的，并会时常修订、扩展或改革（见下方专栏 8-10）。这就是为什么现有政策难以独立于其他政策对生育率产生影响。

此外，即使具体政策的时间、范围和目标均得以明确，其对长期生育率的作用大小也会受到采用时期指标进行测量的影响，该类指标广泛用于生育率研究中，用以反映家庭规模和生育时间的变化。当新政策实施时，夫妇可能会决定是否要一个孩子，也可能他们的生育决策是在政策实施之前就已经确定。因此，我们很难从方法学上研究政策对人群生育水平（数量）或生育间隔（进度）的影响。本节将更详细地讨论政策目标和理念困境对生育率的影响，为随后审视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奠定基础。

3.1 国家家庭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国家家庭政策的目标多样，这些目标很难用福利国家制度的既定分类加以概括（Thévenon，2011）。只有一小部分家庭政策明确以提高生育率为目标。相反，大多数政策的目标更宽泛、更分散，包括减少贫困和为家庭、儿童提供更广泛的支持。在评价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时应考虑到目标的多样性。

Thévenon（2011）系统分析区分了家庭支持政策的六个主要目标：

1. 通过向低收入家庭利益分配，以*减少贫困和维持收入*。

2. 通过向家庭分配现金补贴、财政转移、税收优惠和其他福利（例如减费或公共交通津贴），*直接补偿儿童经济成本*。

3. 通过赋予育儿假权利、提供儿童照护、兼职和弹性工作时间制度以及支持在职父母的税收和福利制度，*促进就业*，尤其是母亲就业。

4. 通过促进配偶间平等分担有偿和无偿工作（包括照护儿童），*提高性别平等*。这些政策包括专用的陪产假和鼓励父母共享产假。

5. *支持儿童早期发展*。这些政策包括帮助父母建立支持儿童发展的知识和技能，以及支持儿童早期正式接受托育服务和支持提供高质量托育服务的规则和举措。

6. *提高出生率*。

最后一组政策是我们分析重点的核心。然而，所述政策目标往往是复杂多样的，而鼓励生育主义目标存于更广泛的目标中。各国政府和负责家庭、福利和社会保障部门发布的正式文件中往往未明确规定生育目标（另参见专栏 1）。明确的生育目标相对少见，鼓励生育主义政策往往被描述为“孩次规定”（parity-specific rules），即这些政策只对第二、三或更高孩次提供支持，或支持水平随子女数量的增加而提高。例如，自 1993 年以来，在匈牙利，有三个或以上子女的母亲有资格获得每月固定金额的抚养子女补助，直至最小的子女年满八岁（Spéder 等人，2017）；2019 年 2 月宣布的新政策中，对至少有 4 个子女的女性终身免征个人所得税，或为大家庭提供 7 座汽车补贴（关于匈牙利，2019）。

政府偶尔也会考虑采取限制性政策，限制人们避孕和堕胎。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中欧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State-socialist）”施行了大量相关政策（David，1999；参见专栏 8）。最广为人知的案例是，为提高生育率，罗马尼亚在 1967 年至 1989 年间严格限制堕胎，后来又大幅度限制避孕药、宫内节育器和避孕套的供应（例如，Soare，2013；Klingman，1998；参见下文专栏 8）。这样的限制性政策偶尔会被提及讨论，如今该类政策已不常见。有些国家严格限制堕胎（例如波兰），在学校不提供或仅提供有限的性教育，如此做法是出于与生育目标无关的宗教考虑。

Thévenon 的分类还可进一步扩展至其它涉及帮助家庭的政策和举措，例如支持不孕症治疗的政策。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是纯粹象征性的举措，如向大家庭的母亲颁发勋章（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或宗教和政府颁发的其他象征性举措。[3]

无论是新政策还是现行家庭政策的改革，往往都基于专门委员会、科学家和政府部门的分析（详见如 2018 年《日本白皮书》(日本内阁府 2018 年版)，《摩尔多瓦人口状况分析》(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2016a）或《2012-20 年爱沙尼亚儿童和家庭战略》(爱沙尼亚社会事务部，2011)）。然而，即使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政府目标往往是促进符合其意识形态方向或符合其选民准则和价值观政策的出台。因此，政策往往有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印记，尤其在家庭政策不稳定的国家中。更广泛地说，政策往往受到与家庭和生育相关的主流价值观和规范影响。例如，中欧以及奥地利和德国的女性和男性经常对有小孩的职业母亲表达消极态度（Panova & Buber-Ennser，2016），基于对这些态度的认同，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均向留守在家的父母提供长达三年的产假。因此，政策既确认了现有的规范，又进一步塑造了它们。Neyer 和 Andersson（2008：703）恰当地总结了政策的这一功能："……政策反映了它们试图创造、维持或加强的规范。政策代表所期望或至少支持的行为种类，也通过其规范或象征功能（symbolic function）发挥影响。"

[3] 其中，尤其让人好奇的是 2007 年格鲁吉亚东正教会首领主教伊利亚二世的决定，亲自洗礼父母生育两个以上的孩子，据称这大大增加了 2008 年以来该国的三胎数量（Hakkert，2014：54）。

专栏 1. 政策文件和举措中明确和隐含的生育目标

虽然推行新家庭政策的动机往往是政府希望提高国内的出生率或遏制生育率下降，但只有相对较少的政策文件规定了明确和可测量的生育率目标。常见的做法包括领导人在其演讲、记者招待会和媒体采访时宣布其所期望的生育目标。例如，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土耳其总统 Recep Tayyip Erdoğan 反复敦促女性生育三个及以上子女。[4]更多时候，政客们会提到更替水平的生育率，认为生育率在将来应达到平均每位妇女生育 2.1 个子女。[5]

在官方文件中，生育率目标通常与许多其他目标一起出现，例如扩大或稳定人口规模，但往往也与健康、死亡率、教育和家庭福利相关。在判断其价值时，应该考虑到这一点。有时，这些目标相对模糊，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范围或具体的生育目标。例如，2013 年新加坡政府发布的《*人口白皮书*》指出，政策目标是提高国家的出生率。[6] 同样，《*2017-2030 年格鲁吉亚人口安全政策理念*》(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2016b：5）认为“维持当前的更替生育水平，避免未来生育率下降是格鲁吉亚制定复杂人口政策的关键基石。”《*拉脱维亚 2014-20 年国家发展计划*》(CSCC，2012，第 16 页）声称，“提高出生率对于确保拉脱维亚国家的永存至关重要。”[7] 作为创建欧洲最友好家庭社会的一部分，奥地利家庭部长（*Familienfreundlichkeits-Monitor*）在 2014 年启动的监测家庭友好程度概念中提出了一个更具体更生动的目标，到 2025 年将生育率提高到期望的家庭规模水平（Karmasin，2016）。

如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日本、韩国和俄罗斯联邦所发布的政策文件所述，

---

[4] 例如，在 2014 年 8 月 21 日举行的一场关于解决人口问题的政府会议上，白俄罗斯总统宣布，减少社会福利所节省下来的资源将用于支持家庭。他认为，“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成长并长大，这是一场灾难！两个孩子是必要的。但更倡导生育三个、四个孩子。”（……）“好吧，或许有人会生育五个孩子——我们中有这样的人，感谢他们”（……）。“但生育三个孩子是必要的！”（……）“这个领域永远不会失去关注，至少我在位时。”(Regnum，2014，引用自 Demoskop，2014)。2016 年 6 月 5 日，土耳其总统 Recep Tayyip Erdoğan 在土耳其女性民主协会的一次演讲中曾说“拒绝成为母亲就意味对人性的放弃，”（……）“我建议至少生育三个孩子。”（卫报/法新社，2016）。

[5] 例如，捷克首相在 2019 年 2 月 2 日接受 Lidové Noviny 日报采访时表示，“我们需要提高出生率……不是每名女性生育 1.7 个孩子，而是 2.1 个。我们需要女性在 25 岁生育，而非 30 岁，同时这也是出于健康原因。”（第 11 页，作者翻译）。

[6] 文件做了一个广泛的说明：“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鼓励更多的新加坡人体验家庭和子女带来的欢乐，培养下一代，长大后建设新加坡的未来。”（新加坡政府 2013 年第 24 页）。

[7] 该文件还制定了具体目标，即从 2011 年的 1.88 万人提高到 2017 年的 2.7 万人和 2020 年的 2.8 万人（第 41 页，257 项），到目前为止差距还很大（2017 年观察的出生人数是 2.08 万人）。

在制订明确的生育目标时，时间范围和目标差别很大，白俄罗斯和爱沙尼亚希望在今后 5-10 年里仅仅稳定或稍微提高其生育率，而韩国和俄罗斯联邦的目标是在较长时间内大幅度提高生育率（表 2）。日本政府将努力解决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作为其核心议程。日本政府制定了 2016 年的生育目标，即平均每名女性生育 1.8 个子女的“理想生育率（desirable fertility rate）”[8]，作为首相安倍晋三振兴日本经济和社会举措的“第二支新箭”（内阁府，日本政府 2016 年）。虽然文件未说明何时达到这一生育率水平，但其对判断达到这一水平的依据，以及要达成该目标水平每年将实施的一系列“紧急措施”给出了精准说明（内阁府，日本政府 2016，2017，& 2018）。然而，如表 2 所示，上述所分析国家的生育率大多低于政策规划目标。

表 2 部分包含明确生育目标的政策举措和文件

	发布年份	上年度总和生育率	目标生育率	目标年份	目标年份所达到的总和生育率	2018 年最新总和生育率
白俄罗斯（1）	2011	1.50	总和生育率达到 1.5-1.6	2015	1.73	1.45
白俄罗斯（2）	2016	1.73	总和生育率达到 1.75	2020	...	1.45
保加利亚（3）	2005	1.33	总和生育率达到 1.50	2020	...	1.56
爱沙尼亚（4）	2011	1.72	总和生育率达到 1.71 总和生育率达到 1.77	2015 2020	1.52	1.67 1.67
匈牙利（5）	2019	1.49	总和生育率达到 2.1	2030	...	1.49
日本（6）	2016	1.44	“理想出生率为 1.8”	无目标	...	1.42
韩国（7）	2015	1.21	2020 年总和生育率	2020-45	...	0.98

[8] “理想”生育率的计算基于以下假设，即所有已婚夫妇都能达到理想的家庭规模（平均生育 2.07 个孩子），所有计划在未来结婚的单身人士（即 90%）都能达到理想的家庭规模（平均生育 2.12 个孩子）。然后将所得数字（1.95）根据离婚、丧失亲属和其它因素向下调整（2016 年出生率下降白皮书，第 2 章，图 1-2-5；日本政府内阁办公室（2016 年）。

			达到 1.5，2030 年总和生育率达到 1.7，2045 年总和生育率达到 2.06			
俄罗斯联邦（8）	2007	1.31	自 2006 年以来将总和生育率提高 1.5（即 1.95）	2025	...	1.58
新加坡（9）	2013	1.29	“提高出生率”	无目标	...	1.14

注：官方文件未公布匈牙利的既定生育目标，数据来自负责家庭事务的国务秘书 Katalin Novák 的采访谈话（2019 年 BBC 新闻），此前，总理 Viktor Orbán 在 2019 年 2 月 10 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宣布了一系列提高人口出生率的措施（2019 年关于匈牙利）。目标年份需实现的总和生育率栏内为空白（标注为“.”），即表示尚未达到该年份或尚未获得该年份目标数据。

资料来源：1：2011-2015 年白俄罗斯人口安全概念（2011 年白俄罗斯共和国立法）；2：2016-2020 年白俄罗斯国家医疗卫生和人口安全（白俄罗斯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16）；3：2006-2020 年保加利亚共和国国家人口战略（保加利亚共和国劳动和社会政策部，2007）；4：2012-2020 年儿童与家庭战略（爱沙尼亚社会事务部，2011：第 15 页）；5：详见上述备注；6：2016 年出生率下降白皮书（日本政府，内阁府，2016）；7：社会老龄化和人口老龄化的第三个五年基本计划（2015-2020）（韩国卫生福利部，2015）和 Lee（2015）；8：至 2025 年俄罗斯人口政策概念（俄罗斯联邦总统，2007；俄罗斯总统学院，2015）；9：充满活力的新加坡的可持续人口（《新加坡人口白皮书》）（新加坡政府，2013）。

3.2 评估政策对生育率和生育率变化影响的关键问题

衡量生育率的挑战

大多数政策文件（专栏 1）和评估家庭政策效果的研究都侧重于时期生育指标，特别是总和生育率（TFR）。它是给定时期（通常是自然年/日历年）内按年龄分组的生育率加总得出，因此它可反映该时期的生育率。然而，我们通常将其

误解为对一批（一代）女性实际家庭规模（全部曾生子女数）的反映。它在政策分析中的普遍使用会导致错误的阐释和结论，在评估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率之间的差距时，也可能会导致错误的解释和结论（Sobotka & Lutz，2011）。

时期总和生育率相对不稳定，年度绝对数值变动通常为 0.1 或以上（或约 6%-8%的相对变化）。若将总和生育率严格解释为随不同时期情况变动而产生年度变化的时期性指标，类似于通货膨胀率、失业率或消费者信心指数，则应该不会有问题。然而，将其解释为“每位女性平均生育的子女数”则会给出一个错误的信号，那将意味着它所衡量的是女性的实际家庭规模。总和生育率尤其受生育时机和间隔变动的强烈影响，而这些变化往往导致这一指标出现波动。由于高度发达国家的男性和女性都能很好地获得现代避孕方法，他们可灵活应对不断变化的时期条件，并决定推迟或者提前生育，增大或者缩小生育间隔。当生育被推迟到更高的生育年龄时，由于一些原本在某一特定时期出现的出生率转移至未来，时期生育率就会下降。其结果是，这段时期的生育率可能会远远低于女性的实际家庭规模。与之相对的是，生育年龄向更年轻的年龄段转变，会导致较短时间间隔内出生集中，从而使时期生育率上升。实际上，由于实际家庭规模的变化、短期波动和生育时间变化（进度*效应，tempo effect*）相互作用，时期生育率经常出现上下波动。捷克、俄罗斯和瑞典三个生育率相对不稳定的国家数据显示，总和生育率的波动不仅对任一时期实际生育率水平的评估产生强烈影响，也会强烈影响国家间的比较（图 4a）。1983-2018 年间，三个国家均经历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生育高峰和低谷时期，达到相对高和低或很低生育率水平，捷克和俄罗斯在 1999 年前后达到极低生育率，为 1.1-1.2，俄罗斯和瑞典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达到生育率高点，为 2.1-2.2。相比之下，这三个国家的终身队列生育率却保持稳定或缓慢变动，其中俄罗斯联邦的家庭规模一直最小（图 4b；参见专栏 3、6 和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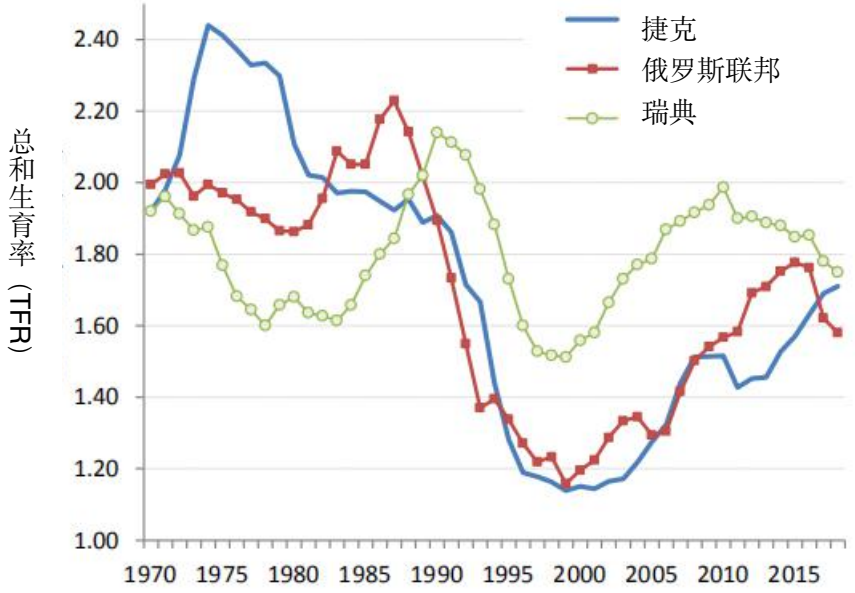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进度效应一直是高度发达国家低生育率和很低生育率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有效避孕手段的普及、教育扩张、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以及价值观和偏好的变化导致生育推迟，高龄生育变得更加普遍（Mills et al.，2011；Sobotka & Beaujouan，2018）。这使得初育年龄从早育到晚育的“延迟转变”持续进行，在过去几十年里时期生育率并不稳定并往往远远低于女性的实际生育水平

（Kohler et al.，2002；Bongaarts，2003；Goldstein et al.，2009; Sobotka，2017）。

时期总和生育率的替代方案有哪些？有两种主要选择。第一种选择为使用在不同出生队列女性在生育期结束时的终身生育率（家庭规模）数据（参见图 4b），该指标能够很好地反映不同代际女性的实际生育行为，不受出生率暂时波动或生育时间变化的影响。第二种选择是采用其它的时期生育率指标，这些指标或提供关于生育率随时期变化更为可靠的资料，或旨在针对生育时间变化对时期总和生育率影响进行调整。然而，这两种选择也都存在缺点。队列指标的计算只有在女性生育期结束，整个生育期的生育行为完全得到反映后才可进行，时间跨越较大。因此，它们不适合跟踪生育率的时期变动以及政策对生育率的短期影响。它们更适合分析家庭规模的长期变化，包括家庭政策可能产生的长期影响。其它的时期生育率指标并不像总和生育率那样容易获得，除此之外，也没有可以被人口统计学家广泛认可的单一的测量指标，也就无从利用这些指标进行国际比较。在某种程度上，研究问题的不同会影响最合适生育率指标的选择（如 Ní Bhrolcháin，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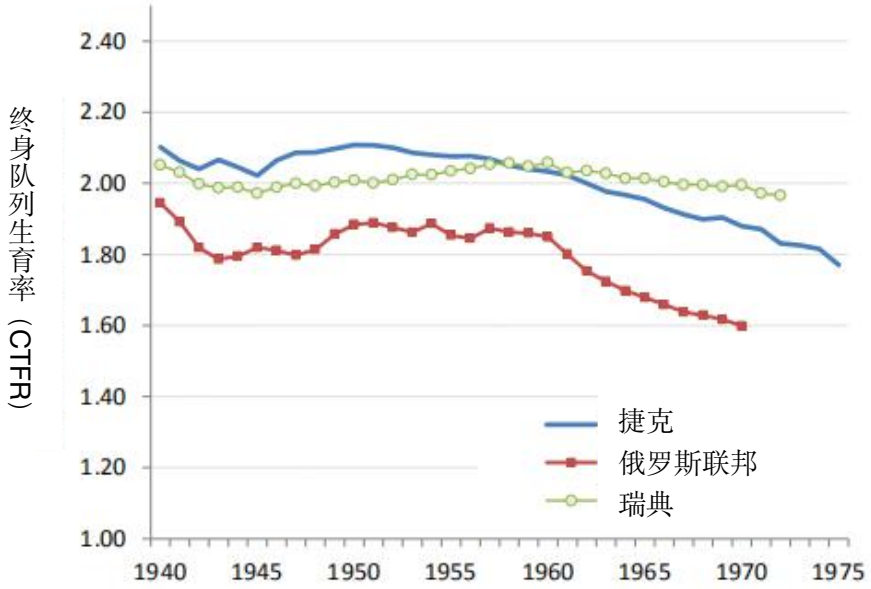
在评估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时，适当考虑个别生育率指标的解释、缺点和局限性至关重要，因为不同的指标往往对生育率随时间（或出生队列之间）变化的方向和大小产生不同的影响。如图 5 中描绘的捷克不同指标所计算的生育率变化曲线所示。这些指标对始于 1968 年和 2001 年两波家庭政策扩张的影响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在这两次政策扩张中，时期总和生育率在随后 5-10 年间均出现上升趋势，表明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生育率（或其他一些因素导致这一时期出现生育率大幅上升）。然而，对进度和孩次调整总和生育率（adjTFRp；参见 Bongaarts & Sobotka，2012）和处于最佳生育年龄妇女的终身队列生育率变动的分析显示，2000 年以后的总和生育率出现上升趋势，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向早育（和生育间隔较短）的转变，而并非由于家庭规模的大幅增加（图 5；另参见专栏 8）。换言之，在新的家庭支持政策出台的同时，家庭规模也出现了小幅增长，生育时间也出现了暂时性的转变，使得该时期的总和生育率大大高于同时期的队列家庭规模。包括俄罗斯和瑞典在内，其它许多时期总和生育率波动的国家也有类似实例（参见专栏 3）。因此，在可行情况下，我们将在讨论和分析政策引起的生育率变化时考虑比常规总和生育率范围更广的生育率指标。

图 4a 捷克、俄罗斯和瑞典的总和生育率（1970-201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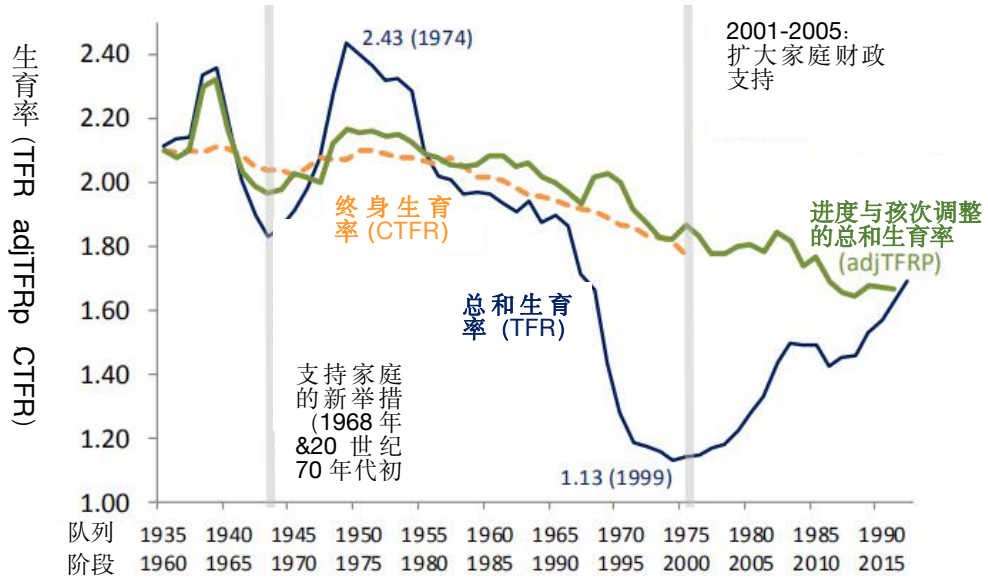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人类生育数据库（2019）、欧盟统计局（2019）、俄罗斯联邦统计局（2019）和国家统计局

图 4b 捷克、俄罗斯和瑞典的终身队列生育率（1940-1975 年间出生的女性）



资料来源: 人类生育数据库 (2019) , 1940-50 年出生的俄罗斯女性数据来自欧洲委员会 (2006) 。

图 5　1960-2018 年捷克总和生育率（TFR）、进度与孩次调整的总和生育率（adjTFRp）和终身队列生育率（CTFR）（1935-1975 年间出生的女性）



注： 图中所示队列生育率移动了 25 岁，反映了 1960-1990 年代的平均生育年龄。例如，将 1980 年的时期生育率与 1955 年出生的女性家庭规模（队列生育率）进行比较，1955 年的女性队列于 1980 年正处于生育高峰期。1971-75 年出生的女性终身生育率于 2016 年前的年龄别生育率 ，再加上 2016 年之后占比较小的生育率估计值计算获得。

资料来源：人类生育数据库（2019 年），欧盟统计局（2019 年）和自身计算。感谢 Kryštof Zeman 提供的进度与孩次调整后总和生育率（adjTFRp）。

衡量和对比政策的难点：一揽子政策（政策包）与单一政策

衡量和对比政策具有挑战性。一系列令人困惑和复杂的政策可能会潜在地影响生育决策。因此家庭政策逐渐形成更广泛的“一揽子计划”（Fagnani & Math，2008；Thévenon，2011；Luci-Greulich & Thévenon，2013），这通常与福利国家的一般特征有关（Esping-Andersen，2009；参见下文专栏 9）。此外，政策改革和扩张往往涉及重新设计整个一揽子计划，而非重新设计单个政策措施，这使政策分析更加复杂。

然而，政策研究往往局限于一种类型的政策，很少有针对所有政策支持的综合指标（Gauthier，2007）。除将一揽子政策划分为更大范围的类别外，研究人员

还试图总结整套政策。这既可通过构建政府政策总支出的汇总指标进行衡量（例如，OECD，2011，2019），也可通过构建全面政策绩效的综合指数来实现，如 Matysiak 和 Węziak-Białowolska (2016) 提出的“工作和家庭和谐条件指数 (Index of conditions for work and family reconciliation)”。

Gauthier（2007）强调了在政策对比中存在的一些挑战。在获得现金福利的情况下，这些挑战包括基于过去就业、收入、子女人数、家庭状况、年龄和其他因素的不同资格标准、不同的补偿水平（例如，以收入状况为基础的福利（means-tested benefits）和福利上限）、雇主提供的福利或特定地区的福利。为了解决这些局限性问题，一些研究构建了现金支持和其他政策相关措施的比较措施，具体包括年龄、子女人数或子女出生顺序、不同的就业和家庭结构（包括单亲父母），以及不同的收入标准（最常用的是收入中位值）（例如，OECD，2011）。这些复杂的衡量措施是理解政策如何适用于不同家庭的关键，但在用于比较分析模型时，需要简化为综合指标。

政策还可根据父母和家庭的需求和经历、预算情况和政府优先事项变化，在长时间内进行反复的扩张或修订。例如德国家庭政策的长期扩张（专栏 10）以及日本不断整合和扩张促进生育政策（参见图 6 和专栏 7）。家庭政策的这些变化常常使我们很难确定一个具体的用以分析其影响的决定性的日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Neyer 和 Andersson（2008）提出一种识别“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的想法——时间点，即当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时，与以往政策取向出现背离的时间点。这些“关键时刻”即可作为分析政策影响的聚焦点。

评估政策的影响

虽然衡量生育变化是一项挑战，但分析与家庭相关的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则更具挑战性 (McDonald, 2002; Gauthier, 2007; Neyer & Andersson, 2008; Hakkert, 2014)。这也是即使很多研究侧重于分析同一政策对生育率干预的影响，但研究结果仍存在巨大差异的关键原因（参见相关俄罗斯的专栏 6）。

政策可能会在不同时间段内发挥作用。一些家庭政策只有短期效果，生育高峰和生育萧条 (baby booms and busts) 主要由生育时间和间隔的变化引起。例如，

在澳大利亚、魁北克和西班牙（后来停止实施）颁布的诸如“婴儿补贴”计划等一次性财政激励措施，可能只有短期效果（Thévenon & Gauthier，2011）。其他政策可能对长期生育决定至关重要，但可能不会立竿见影率。例如，支持性别平等和工作与家庭相协调的政策不太可能导致生育高峰，但对于支持长期生育计划和扩大家庭规模来说，这些政策会起到重要作用。

在出台、修订或终止政策的任何时期，许多其它因素都会同时影响生育率。因此，要准确分析个别政策的影响，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因此，精确分析单一政策的影响，同时考虑到过去的生育趋势、适当的时滞性和其他因素（Neyer & Andersson，2008）是相当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优秀的研究案例是那些仅针对影响国内某些地区，或非预期针对影响生育率而实施且目标人群明确（例如针对分娩后某一时期的女性）的政策。类似情况最适合分析政策效果，因为它们可以进行“自然实验”，即对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地区或人群受到政策变化影响的两个类似区域或人群的生育发展情况开展对比，因此这些情况最适合分析政策影响（参见，例如 Lalive & Zweimüller 于 2009 年进行的关于奥地利和德国产假改革研究；Štastná & Sobotka，2009；Cygan-Rehm，2015，Farré & Gonzales 于 2019 年开展西班牙实施陪产假的研究以及 Cohen 等人于 2013 年开展的有关以色列儿童福利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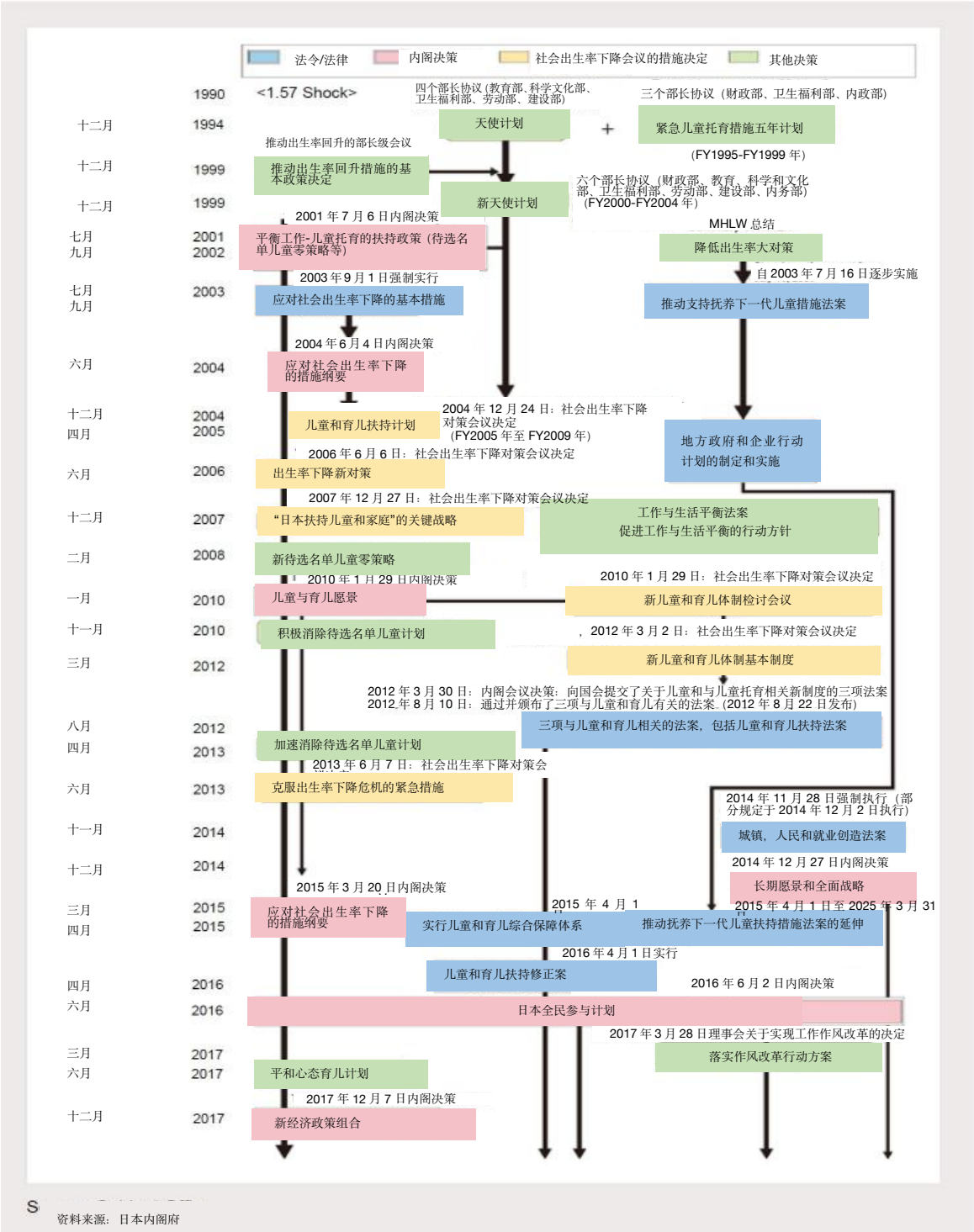
使政策评估更加复杂的是政策效果因个人层面的特征而异，如社会经济地位（Cygan-Rehm，2015；Billingsley et al，2018）。在这种情况下，在汇总层面上进行的分析很可能会导致错误结论。法国和英国的生育率是这种生态学谬误的很好实例。政策效果惊人的相似可能会让人认为地处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两个国家在抚育儿童的家庭政策和条件上几乎相同。然而，正如 Ekert-Jaffé等人（2002）所做的那样，当我们进行更仔细地观察时，会发现英国的生育率两极分化非常严重：会因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显著差异，许多成功的女性专业人士没有子女或只生育一个子女，而很多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拥有更大的家庭规模并在年轻时成为母亲。总的来说，英国的无子女女性比法国多，但由于英国的大家庭规模数量较多，因此这一现象并未反映在汇总女性人群的生育率水平上。该研究的作者认为，法国广泛家庭政策的关键效应在于它们有能力“消除按社会阶层划分的生育率差异”（第 502 页）。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家庭政策的主要影响可能不是推高总体生

育率水平，而是对某些社会群体的生育率产生超出其他群体的影响。

最后，家庭政策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或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即对生育率产生的影响与最初设想不同。例如，旨在为双职工父母提供支持的政策，可能会无意中刺激父母在生育前先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从而推迟其为人父母的时间。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的休假福利即是如此，它与生育前一年的工作经验和收入挂钩。其结果就是推迟生育，尤其是在经济不稳定和失业率高的时期（Santow & Bracher, 2001）。Billingsley 等人（2018）对 21 个国家个体水平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无论是支持全职母亲的传统家庭政策，还是支持母亲参加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政策，都与首次生育推迟相关联。与之相反，推迟生育也会对最终家庭规模产生负面影响。出于这个原因，亟需一套全面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揽子政策”，以达到上述情况下刺激尽早孕育下一个子女的目的。

图 6　1990 年以来日本提高人口出生率家庭政策和计划的发展时间表

图 1-2-4 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活动历史



资料来源：《2018 年日本出生率下降白皮书》*(摘要)* 中图 1-2-4（第 2 章）（内阁府，日本政府，2018）

4. 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回顾与说明

本节将讨论评估政策对生育率影响的核心问题。我们将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进行了梳理，特别关注那些在文献中被充分涵盖或可以用现有数据进行分析的国家和政策干预。我们试图反映上述方法论问题和考量因素。我们的图表和分析特别关注激进的政策转变后的生育率变化，这与 Neyer 和 Andersson（2008）的“关键节点”的观点一致。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将超越传统的时期生育率指标，分析政策对生育时间和队列生育的影响。最后，虽然我们讨论了一些可能限制个人生殖权利的政策，但我们不支持或提倡任何限制生殖选择和自由的措施，而是强调其负面的社会后果。

首先，我们勾勒出高度发达国家在政策和政策支出方面的主要差异。然后，我们着眼于具体的政策和政策工具，梳理相关文献，提供经验性证据，并着重强调特别有利于促进生育决策和儿童发展的政策。我们还为在过去二十年间经历了家庭政策大幅扩张的部分国家提供数据分析和解释说明。最后，我们讨论了“一揽子政策”更广泛影响的证据，并总结了以往对于生育政策影响的主要发现。

4.1 国家间政策取向和政策支出的主要差异

高度发达国家在家庭相关政策上的总开支以及这些开支在现金福利（特别是儿童津贴和育儿假津贴）、服务（儿童托育、幼儿教育和家庭服务）以及税收支持（为有子女家庭提供免税、信贷和津贴；OECD，2011）之间的分配方式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图 7 显示了按更大区域分组的部分 OECD 国家的这些差异和长期趋势（2001 至 2013 年）。在很低生育率的东亚和南欧两个地区，政府在扶持家庭方面的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相对较小（尽管东亚的家庭支出有大幅增加）。在中欧（以奥地利、德国和捷克为代表），政府在家庭上投入了更多资源，大部分支出为现金资助。中等低生育率地区的情况则复杂得多。北欧国家和大多数西欧国家（尤其是法国，也包括英国）在家庭上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占其 GDP 总量的 3%-4%；其中大部分支出直接用于服务，特别是提供儿童托育服务。西欧国家对家庭支持方面的资源配置也存在差异，荷兰在家庭资金支出（2013 年为 1.8%）更少，尤

其是在现金福利方面，低于 OECD 国家 2.5%的平均水平。在中欧和东欧地区，前社会主义国家则更加多样化，它们的支出模式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得更快。一些中欧国家在家庭方面的支出较高，尤其是在现金福利方面，例如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也有类似支出模式），但其他国家，如拉脱维亚和波兰，2013 年对家庭的支出则较低。在欧洲以外，加拿大和美国政府对家庭的支出非常低，而澳大利亚则提供相对充裕的现金福利，这与中欧国家类似。东南和东欧的非经合组织国家没有关于家庭支出方面的可比数据。其中许多国家的家庭政策都经历了动态演变，白俄罗斯、拉脱维亚、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的家庭政策部分受鼓励提高人口出生率的议程推动，主要支出形式为现金福利；立陶宛、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政府则采用更传统的现金福利与服务相结合的方式（Frejka & Gietel-Basten，2016 年；俄罗斯联邦相关内容参见专栏 6）。

随着时间推移，大多数国家用于家庭的支出趋于增加或保持稳定，最大的增长往往集中于扩大儿童托育服务和其他服务上（如韩国的儿童托育支持大幅跃升，奥地利、德国和西班牙的增幅显著）。

这些数据不包括所有与家庭相关的支出——例如提供儿童保健、住房资助或提供辅助生殖服务——但它们很好地说明了国别间的差异、更广泛的区域分组以及随时间的变化趋势。除了简单的区域分组之外，Thévenon（2011）对 OECD 国家关于家庭支持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以可比较的“一揽子”家庭政策为标准，在更大范围的国家集群中进行分组。根据他的研究和其他研究，国家和地区可以划分如下：

- *北欧各国*，为有年幼子女的双职工父母以及父亲参与照料提供持续和强有力的支持（参见关于瑞典的专栏 9）。
- *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主要通过现金补助提供支持，特别是针对低收入家庭。
- *南欧、日本和韩国*的政策比较有限，带薪育儿假较短，向家庭提供的现金资助有限，公共儿童托育服务提供较少。
- *欧洲大陆各国*，包括三个主要讲德语的国家（奥地利、德国和瑞士）、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法国，这些国家的家庭支持力度历来相对较高，但主要与支持传统的劳动分工和为有子女的家庭提供经济支持有关。这种“保守”的政策模

式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修订，逐步转向更有力地支持女性就业和工作-家庭平衡（参见关于德国的专栏 10）。比利时和法国一直走在这一转变的前列，自 20 世纪 60 -70 年代以来，开展了全面的公共儿童托育支持（Anttonen & Sipila, 1996；Vandenbroeck，2003；另见关于法国的专栏 9）。

- *中东欧国家*（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的家庭政策一直在进行不同方向的改革和变化，但支持孕产和有偿就业相结合的政策仍然相对不发达。政策要么明确支持家庭主义，为 3 岁以下儿童提供非常有限的托育服务，并制定大量育儿假计划（捷克，匈牙利；另见专栏 5），要么根本不为家庭提供任何支持（波兰和斯洛伐克）（Javornik，2014）。相比之下，斯洛文尼亚、托育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家庭政策更支持工作-家庭平衡并提供更广泛的早期儿童托育服务（Javornik，2014；Szalewa & Polakowski，2008）。

上述分类忽略了许多国别间的细微差别，同时对政策随时间变化的展现非常有限。经过一些简化，各国政策的时间趋势可归纳为三大类：

1）家庭政策主要和全面扩张的一系列措施，包括经济福利、对大家庭的支持，以及支持儿童托育服务、母亲就业、更灵活地兼顾职业生涯与为人父母。这些重大变化的动机是对低生育率的关注，这是东亚国家的典型情况，尤其是日本和韩国（参见专栏 7），在较小程度上亦是一些中欧和东欧国家，特别是爱沙尼亚（参见专栏 4）和匈牙利的典型特征。Lee（2018）和 Adema 等人（2017）记录了韩国最近大规模扩张的家庭政策，包括采用和扩大家庭福利、采取措施支持母亲就业、缩短工作时间并为父亲提供大量陪产假。在日本，政府一直致力于扩大家庭和提高人口出生率的政策，也涉及公司计划及区域和地方倡议（参见专栏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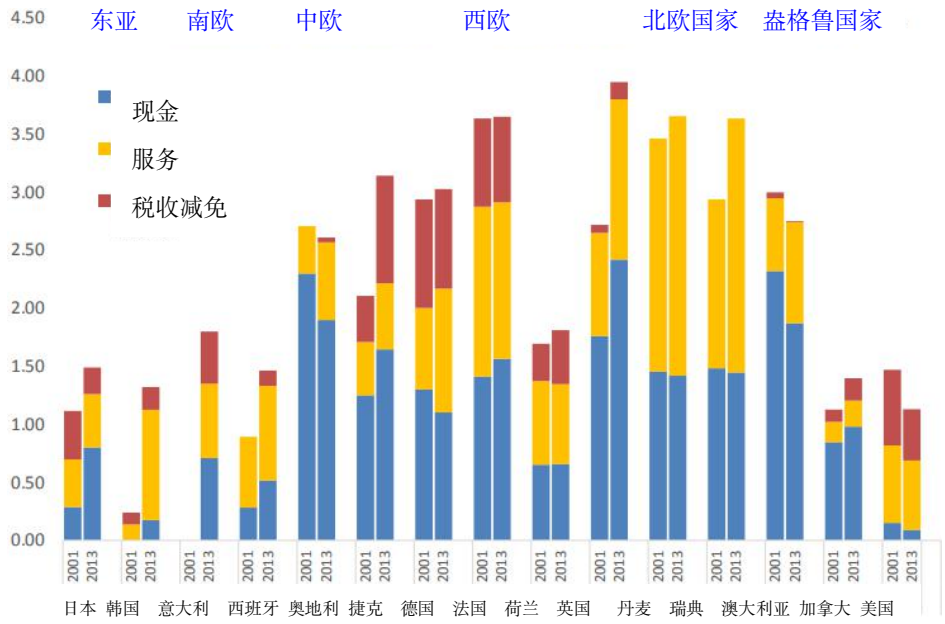
2）向支持父母就业以及职业和家庭生活相结合转变。许多国家实施了新政策来解决父母双方、特别是母亲所面临的就业与家庭冲突的新政策。德国和奥地利的政策改革包括扩大儿童托育服务、提供更好的薪酬和更灵活的育儿假，以及支持父母从事非全日工作（参见专栏 5 和专栏 10）。爱沙尼亚制定了充裕的育儿假计划，育儿津贴等相当于休假前的工资（参见专栏 4）。

3）以现金福利为中心的政策扩张。这一发展趋势在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许多国家都很典型，各国政府认可鼓励生育主义及干预措施。例如，俄罗斯自

2007 年以来实行的孕产资本计划（参见专栏 6），波兰自 2016 年起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的父母提供免税福利的“家庭 500+”计划，白俄罗斯、保加利亚、拉脱维亚、匈牙利、俄罗斯和乌克兰建立的各种家庭支持计划。在包括拉脱维亚的一些国家，新政策还旨在增强“传统”家庭和鼓励婚姻（Abolina，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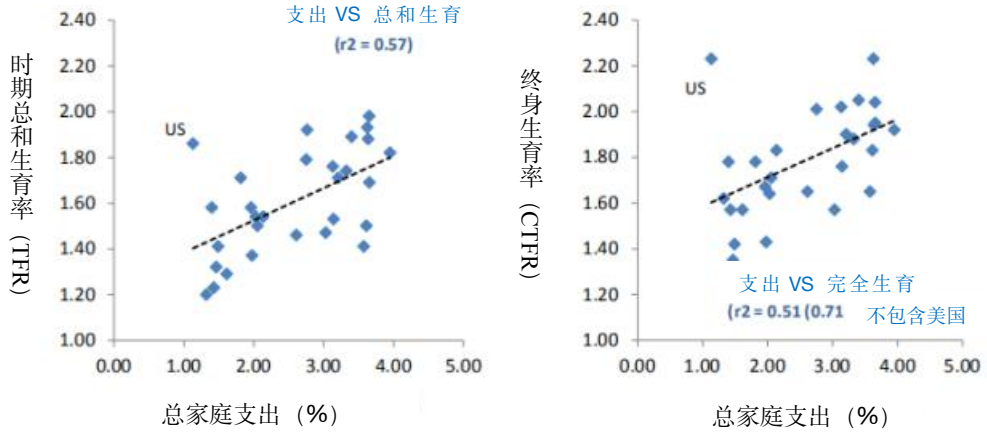
富裕国家的家庭支持水平与生育率是否相关？我们已对 OECD2007-2013 年家庭公共支出数据、2014 年阶段生育率指标以及 1976 年出生女性的终身生育率（现有最新队列数据）进行研究。数据显示，家庭支出与所分析的每个生育指标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图 8）。总支出和具体服务支出与生育率指标之间均存在相关性。美国是一个例外，分析结果为低家庭支出和相对高的生育率相关。然而，受当时的生育率受到金融危机或扩大/削减家庭预算未对生育率产生影响的作用，2007-2013 年美国家庭支出的变化与 2008-2014 年总和生育率变化之间并无显著关联性。

图 7，2001 年和 2013 年部分的 OECD 国家政府对家庭的支出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进行详细说明（占国家 GDP 水平百分比）



资料来源：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家庭数据库（2019），表 P.F.1.1.A

图 8，2013 年家庭政策支出、2014 年总和生育率与 1976 年出生女性终身生育率（CTFR）的相关性



资料来源：家庭支出：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家庭数据库（OECD，2019），表 P.F.1.1.A；生育率：人类生育率数据库（2019），欧盟统计局（2019），欧洲人口数据表（VID，2018），各国统计局。

4.2 儿童托育覆盖范围、可获得性和费用

高质量和可得的公共儿童托育服务，特别是 3 岁以下儿童的托育服务，从支持工作家庭互相平衡以及儿童发展角度来看至关重要。这是支持双职工家庭生育决策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

实证研究显示，可及的儿童托育服务对生育率有积极影响（Baizán，2009；Goldsteinet al.，2017；Hilgeman & Butts，2009；Kalwij，2010；Luci-Greulich & Thévenon，2013；Rindfuss et al.，2010；Rindfuss et al.，2007；Rovny，2011）。儿童托育服务的供给不仅影响生育时间，还影响整个家庭规模。例如，Luci-Greulich 和 Thévenon（2013）预估，OECD 各国儿童托育入园率每增加 10 个百分点，则进度调整总和生育率增加 0.08，这与 Rindfuss 等人（2010）对挪威的低方案预测结果相当（参见专栏 2）。Kalwij（2010）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儿童托育补贴每增加 10%，西欧的终身生育率将增加 0.4%。提供儿童托育服务更有可能影响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加活跃的高学历女性的生育行为（Baizán et al.，2016；Haan & Wrohlich，2011；Kravdal，1996）。Baizán 等人（2016）估计，在所分析的 15 个欧盟国家中，将 0-2 岁儿童的托育覆盖率从 10%左右提高到 50%，将使受过高等教育女性的完全家庭规模（终身生育率）从每名女性平均生育略高于 1.4 个子女增加至 1.9 个子女。若提高儿童托育覆盖率，低教育程度女性的终身生育率将小幅上升，从每名女性平均生育 1.8 个子女上升至 2.0 个子女。

对父母和准父母而言，能否提供儿童托育服务并不是生育决策的唯一重要因素。儿童托育质量、费用和开放时间均为能够刺激生育的“良好儿童托育体制”的其他重要因素。只有当父母能够确定日托对其孩子是有益的（或至少是无害的），他们才会决定使用儿童托育设施。确保高质量的照料也是儿童发展的关键。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儿童托育质量进行评估：每位教师负责的孩子数量、群体规模、教师教育水平、课程设置和安全性（Plantenga & Remery，2009）。2015 年进行的国际学校评估项目（PISA）调查结果显示，早期儿童托育项目中，儿童与工作人员比率较低，以及早期儿童托育充裕的投入预算，均与儿童 15 岁时在校优异表现相关（OECD，2017b）。旨在通过玩耍教给孩子新技能并对各种教育活动（发展语言技能、计算能力、读写能力、创造力、社会技能、信息通信技术技能、道德和公民价值观，或提高对体育活动和健康重要性的认识）同等重视的均衡课

程（balanced curriculum），同样是儿童托育质量的重要内容（OECD，2017b）。为所有儿童托育机构制定共同条例和建立国家质量监测体制，可进一步帮助确保高质量的早期儿童托育并帮助（儿童）顺利过渡到学校教育。瑞典和挪威是投资于儿童托育发展、高度重视儿童托育质量的典型国家。这很好地解释了两国儿童托育入园率异常高，以及挪威儿童托育入园率与生育率间的正相关关系（专栏 2）。

儿童托育机构提供的服务应根据父母的不同需求和情况进行调整。例如，法国提供多样化的儿童托育服务，专门照顾不同年龄和需求的儿童：1 岁以下儿童的托育所、1-3 岁的托育所、3-5 岁的幼儿园和学龄儿童的学后看护。儿童托育可由市政府组织的传统日托中心提供，也可由经过认证的照护者、公司托育所和幼儿园（通常由上市公司运营）以及提供数小时不规律临时护理的收容中心提供（OECD，2006b）。同样，开放时间也应与父母的工作时间相适应。长期以来，德国幼儿园开放时间过短被认为是女性参与全职劳动力市场的重要障碍之一，也是生育率低的原因之一（Hank & Kreyenfeld，2003）。

父母承担的儿童托育费用是公共儿童托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因国家而异。研究表明，降低儿童托育费用可能对生育率产生积极影响（DiPrete et al.，2003）。在儿童托育得到大量补助的瑞典，2001 年儿童托育费用的减少导致了 18 个月内出生率增加了 3-5 个孩子/每千名妇女（即 4-6%）（Mörk et al.，2009）。

儿童托育体系的扩大需要时间和投资。儿童托育服务不仅可由国家和市政当局经营，也可由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或私人机构经营。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私营机构对儿童托育服务提供支持和资助也是有效的途径，尤其是在无法轻易扩大公立儿童托育服务的情况下。例如，维也纳（奥地利）市政当局实施对私营和非政府儿童托育设施提供补助的政策，并规定其应遵守与公立机构相同的最低质量标准。近年来儿童托育扩张规模最大的国家和地区之一是在韩国，政府在儿童托育方面的开支从 2000 年 GDP 的 0.1%上升至 2014 年的 0.9%，这一开支的大幅增加使得儿童托育服务也得以大幅增加（Adema et al.，2017）。儿童托育设施数量快速增长，特别是那些由私人公司和家长协会经营的儿童托育机构，目前该类机构占全国儿童托育机构的 85%。因此，2005 年至 2014 年，0-2 岁儿童托育入园率从 9%上升到 36%，3-5 岁儿童托育入园率从 31%上升到 91%（Adema et al.，2017）。

专栏 2. 挪威学龄前儿童托育：高质量、接近全覆盖以及提高生育率

直至 1970 年，挪威只有少数儿童参加日托，3-4 岁儿童入托率为 5%，1-2 岁幼儿入托率仅为 1%。之后儿童托育的覆盖范围迅速扩大：截至 1997 年，1 至 5 岁儿童中入园率为 60%，2016 年入园率达到 91%。覆盖范围扩大最为显著的人群是 1 至 3 岁的儿童，2000 年儿童入园率为 37%， 2016 年已经超过 80%。与此同时，挪威学前儿童托育的质量也在同步提高。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高质量儿童托育服务的迅速普及对挪威生育率的下降起到减缓作用。Rindfuss 等人（2010）的一项模拟研究表明， 若儿童托育的可及性保持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接近于零的水平，则 1957-1962 年出生队列的女性在 35 岁时平均只生育 1.5 个子女。而其实际终身生育率已超过平均每名女性生育两个子女，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 1973 年之后儿童托育服务的迅速扩张。该研究还表明，大幅提高儿童托育服务的可获得性对生育率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可获得性每提高 10%（以绝对值计算），平均每名女性将多生育约 0.10-0.12 个子女（图 9）。扩大儿童托育服务对防止二孩生育和三孩生育率的下降尤为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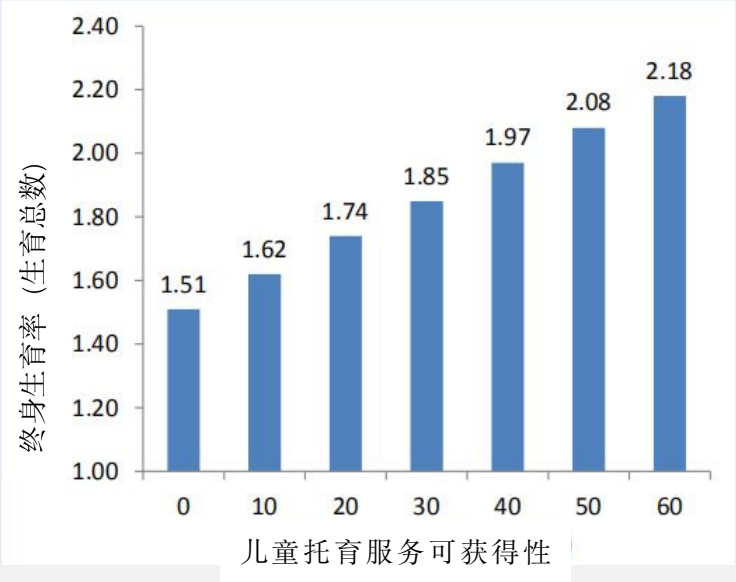
提升儿童托育覆盖范围和质量的驱动力

21 世纪初，挪威就提升儿童托育质量达成了广泛的政治共识。历届政府都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逐步增加儿童托育方面的公共支出。1998 年至 2012 年间，儿童托育方面的公共支出几乎翻了一番，达到 GDP 的 1.4%。额外的财政资源不仅用于创建新幼儿园，还用于增加对现有日托中心的补贴。2000 年间，政府承担了大约 55%的幼儿园运营费用，截至 2012 年，该比例上升至 85%。因此，父母幼儿园托育支出大幅下降，实际花费更易负担：目前，挪威儿童托育费约占（父母）平均工资收入的 10%，同比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为 25%。此外，低收入家庭还能从地方政府获得额外的财政支持。2009 年挪威颁布的法律规定，所有 1 岁及以上儿童均有权利进入幼儿园，再次重申实现全面儿童托育覆盖的政治承诺。

显然，如此大规模的儿童托育扩张给挪威政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第一项挑战即是新设施建设与新员工培训的需求。针对这一挑战，公私混合体制对不断增长的需求做出了极其有效地回应。过去，公立幼儿园在获得政府资助方面享有特权，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事实证明，私立幼儿园设施对于实现儿童托育的全覆盖是必不可少的补充，目前挪威对公立和私立儿童托育机构的补贴几乎相同。托育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有助于缓解高素质员工短缺的问题。每个幼儿园配有一位校长（管理人员）、多名教学教师和助理教师，其中校长和教学教师必须拥有三年制主修幼儿教师教育的高等教育学历。

儿童托育体系的扩张与托育质量的投资同步进行。挪威有非常严格的资质标准的相关规定，其中规定了工作人员的必要资质、最小师生比和课程。规定和标准受内部（由内部人员进行自我评价和/或同行评审）和外部（地方政府检查）的定期监测和质量控制。质量控制体系侧重于三个方面：服务质量监测、员工素质监测和儿童发展和成果监测。

图 9 根据 0-5 岁儿童儿童托育服务可获得性水平，对 1957-62 年间出生队列的挪威女性的终身生育率（截至 35 岁）进行模拟



资料来源：表 1，Rindfuss 等人（2010）。

*本专栏基于以下研究：*Engel 等人（2017）；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1999），Rindfuss 等人（2010），以及挪威统计局（2018）。

4.3 育儿假制度

有幼儿的父母可申请各种休假。产假直接适用于母亲，且通常时间很短（最多六个月），在孩子出生前后休假，以保护母亲和孩子的健康。父亲也可在孩子出生前后享受陪产假，以便父亲有时间陪伴新生儿并适应其新角色。父母双方在其产假或陪产假结束后可享受育儿假。父母在产假、陪产假和育儿假期间通常因为没有时间工作而得到相应补贴。但是，各国在休假时间和应享补贴的权利内容差别很大，有些国家提供固定假期福利，而其他国家则依据父母在生育前的收入确定假期福利（参见专栏 3-5）。此外，育儿假福利可以普及，也可以根据就业情况或满足特定收入标准的条件而定。

理论上，育儿假应与妇女和夫妇的生育决策正相关，因为育儿假允许父母在不必终止雇佣合同的情况下，从工作中休息一段时间来照顾他们的孩子。育儿假为父母提供重返工作岗位的保障，降低了他们未来就业的不确定性。此外，育儿假津贴还可补偿在休假期间的收入损失。当育儿津贴同样也支付给生育前无工作的父母时，这可以让他们更好地照顾子女，无需承受找工作或陷入贫困的压力。然而，长假会导致人力资本的贬值，降低父母的收入潜力和未来的晋升机会（例如， OECD2011；Budig et al., 2012；De Henau et al., 2011；Evertsson & Duvander, 2011；Pettit &Hook，2005）。休假计划对父母职业生涯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改变父母的生育决策，导致生育推迟；同时还可能会阻碍一些夫妻达到理想的家庭规模。因此，育儿假改革必须考虑育儿假计划对伴侣生育决策、职业生涯和家庭幸福产生的多种后果。

无论是在时间期限还是津贴水平上，育儿假津贴越丰厚，则夫妻越想要生育子女。例如，Matysiak 和 Szalma（2014）对匈牙利和波兰女性的生育行为进行比较，在这两个国家，父母的育儿假曾经时长相近，但在津贴条件上有很大差异。他们发现，与波兰女性相比，匈牙利女性在产假期间更有可能生育第二个子女，因为她们在产假期间获得更多与收入相关的福利，而波兰女性往往会更快重返工作岗位。在挪威，现金支付育婴津贴的出台导致二孩出生率出现上升趋势（Aassve & Lappegård，2009）。现金支付育婴津贴是固定的，允许父母在抚养子女的育儿假结束后，继续在家照看子女两年（直至子女三岁生日）。这项津贴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由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所推动的，她们是该计划的主要受益者。芬兰也

有类似发现，获得固定家庭托育津贴女性的三孩出生最高，该津贴最多补贴至子女三岁生日时（Vikat，2004）。

然而，现在尚不清楚更丰厚的育儿假津贴主要影响的是生育时间，还是会同时影响完整的家庭规模。很少有研究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这表明育儿假津贴对终身生育率的影响相当小，甚至微不足道。例如，Luci-Greulich 和 Thévenon（2013）估计，在 OECD 国家，若将带薪产假延长 100 天，进度调整总和生育率将增加 0.06。与此同时，Kalwij（2010）表明，将西欧的产假和产假津贴提高 10%，可将无子女率降低 3.2%，但对终身生育率无影响。Baizan 等人（2016）在对欧盟 15 个国家的带薪产假研究后，亦发现其不会对终身育率产生影响。

由于育儿假期的长度和应享权利的变化可能导致生育时间发生的意想不到的变化，因此育儿假改革应谨慎执行。这一政策最著名的实例是，1980 年瑞典将育儿假从 15 个月延长至 24 个月，这促使许多女性在产假结束前生下第二个子女，从而推动了暂时性的生育高峰（见表 3）。1990 年奥地利也实施了类似的政策改革，将育儿假从 12 个月延长到 24 个月。当时育儿假权利以最低就业期限为条件，女性只有在实际育儿假期间（外加短时间“过渡期”），或在返回工作岗位后工作至少 20 周后生育，才能重新获得另一次产假权利。由于在 1990 年以后的育儿假期间生育下一个子女变得更加可行，许多女性利用这一机会在恢复工作前便生育第二个或第三个子女。育儿假的延长显然减少了第二和第三次生育间隔。然而，它是否将对终身生育率产生影响仍存在争议：Lalive 和 Zweimueller (2009) 发现这一政策改革对生育存在长期影响，而Štastná和 Sobotka（2009）得出结论，它对第二孩和第三孩递进生育率无任何影响。

专栏 3. 瑞典“速度津贴（speed premium）”：长期成功？

瑞典有着带悠久的带薪育儿假的传统，假期福利由父母的休假前的收入决定。自 1980 年以来，休假的父母若在 24 个月内再生育下一个孩子，便有资格获得同样的假期津贴。1986 年，上述最大生育间隔延长至 30 个月，这使得父母更易将生育孩子的时间紧密结合起来，并在下次生育后享受不间断的休假和相同的假期福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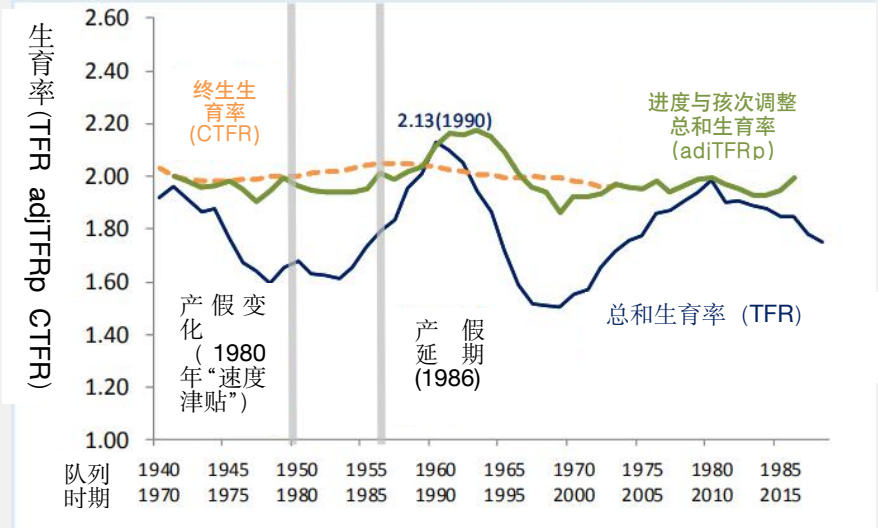
由于许多父母，尤其是母亲，在第一个子女出生后会相应得选择收入较低的非全职工作，因此，这种“速度津贴”（Andersson et al.，2006）导致育儿假津贴大幅增加。在“速度津贴”确立后不久，时期生育率开始上升，从 1983 年的 1.61 跃升至 1990 年的 2.14。此后，生育率下降的速度与之前的飙升速度一样快；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总和生育率（TFR）在出现再次反弹前，降至 1.5 的水平（参见图 10）。

时期总和生育率（TFR）的上升是由进度效应引发的吗？即是由那些无论如何都会出生的孩子加速出生所带来的吗？20 世纪 80 年代的生育率上升确实主要是由进度变化带来的，特别是生育间隔的缩短，第一次生育后 30 个月内的第二次出生率相对急剧上升（Andersson et al.,，2006）。相较之下，计算进度与孩次调整总和生育率，增长要小得多（平均每名妇女增加了约 0.2 个子女），在出台“速度津贴”政策时，处于最佳生育年龄女性的终身生育率只发生了很小的变化（图 10）。“速度津贴”对生育率的积极影响很快便消失殆尽。20 世纪 90 年代，反方向的进度效应作用于生育率，也即经济衰退引发首次生育推迟，使得生育率急剧下降。

瑞典生育率由于其波动巨大的发展趋势，常常被描述为 "过山车"式的生育率，这种生育率波动与该国的经济发展周期密切相关。由于育儿假津贴基于收入所设定，因此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衰退时期，就业率和收入急剧下降时，生育率往往会随之迅速下降。为了应对劳动力市场恶化的前景，瑞典人倾向于推迟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生育，直到具备更有利的经济（和金融）条件。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也清楚显示出“速度津贴”政策在提高生育率方面的局限性，并揭示了瑞典产假福利对生育率影响的顺周期效应（procyclical nature of the

effects）。通常来说，与过去工资挂钩的休假福利往往会在经济繁荣时期加速生育率，而在经济低迷时期则会抑制生育率。

图 10 1970-2018 年瑞典的总和生育率（TFR）、进度与孩次调整总和生育率（adjTFRp）和队列终身生育率（CTFR）（1940-74 年间出生的女性）



注：30 年间的队列数据反映了平均生育年龄。在较高的生育年龄的终身生育率中（42 岁以上），有一小部分组别的数据是估计值。

资料来源：人类生育数据库（2019），瑞典统计局（2019）和本报告计算。进度与孩次调整后总和生育率（adjTFRp）由 Kryštof Zeman 计算。

*本专栏基于以下研究：*Andersson（2004）；Andersson 等人（2006），以及 Neyer 和 Andersson（2008 年）

专栏 4. 设计全面、普遍和充裕的产假：以爱沙尼亚为例

在爱沙尼亚，低生育率伴随移民迁出共同导致了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头十年出现的大量人口流失。面对人口方面的挑战，爱沙尼亚已将北欧国家综合政策为榜样，开始着手扩张家庭政策。爱沙尼亚于 2004 年开始实行带薪育儿假的重点改革，废除之前为期三年、对收入损失补偿很低的育儿假，取而代之为津贴相当于生育前一年全额工资的育儿假（Puur & Klesment，2011，Frejka & Gietel-Basten, 2016）。之后，带薪假期从 2004 年的 11 个月延长至 2006 年的 14 个月和 2008 年的 18 个月，其中前 70 天仅向母亲提供。自 2008 年起，子女出生间隔很近（在 30 个月内）的父母可保留同样的休假福利，而在此期间无须重返劳动力市场（Puur & Klesment，2011），这一政策类似于瑞典的“速度津贴”(参见专栏 3)。休假津贴上限额度非常高，是平均收入水平的三倍(2018 年为每月 3089 欧元；Pall，2018)。

爱沙尼亚将相对较长的假期和全额工资相结合，甚至比北欧国家产假福利更充裕。北欧国家产假制度要么时间较短但有全额工资（丹麦 32 周，挪威 46 周，冰岛 9 个月），要么时间较长但津贴相当于产假前 70%-80%的工资水平（芬兰、瑞典、挪威有较长的假期；Blum et al.，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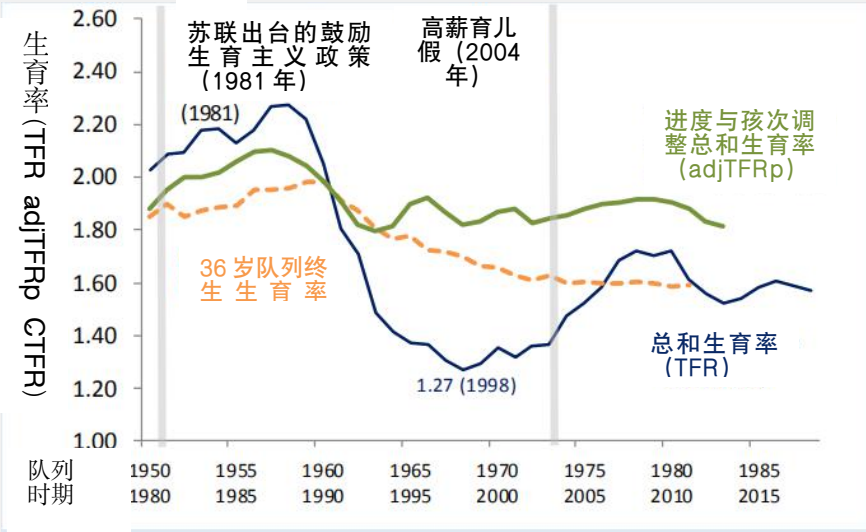
爱沙尼亚近期的改革旨在使现有体制更加灵活，更容易与持续就业相结合，并增加父亲在假期中的参与度（Biin，2017）。自 2018 年起，育儿假可一次性或分阶段使用，直至子女三岁生日。父母可继续工作，并在子女出生后享受父母津贴，但一旦父母的收入超过最高津贴水平的一半，津贴就会减少（Pall，2018）。政府议程的下一个目标是向提供父母综合津贴转变，其中包括一段专为母亲提供的假期，一段父母共享假期，以及一段专门为父亲提供的 30 天假期，整个福利期延长至 605 日历天（超过 20 个月）（Pall，2018；Biin，2017）。

爱沙尼亚的公立儿童托育服务在 20 世纪 90 年代呈现下降趋势后也逐渐增加（Puur & Klesment，2011；Põldma，2014）。2016 年 0-2 岁儿童幼儿园入园率为 28.5%（OECD，2019 年），高于 2000 年的 20.4%（UNICEF，2018）。目前入园率接近欧盟的平均水平，仅次于斯洛文尼亚，在中欧和东欧提供早期儿童托育服务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育儿假福利的扩大和儿童托育服务的增

加，2003 年至 2009 年间，政府用于家庭现金福利的支出快速增长，从占 GDP 的 1.2%上升至 2.1%，随后又降至一个较低水平。

时期总和生育率（TFR）在产假延长后持续上升：从 2003 年（第一次产假延长前）的 1.37 跃升至 2010 年的 1.72，在 2010-2013 年经济衰退开始后才有所下降。相较而言，进度与孩次调整总和生育率在 2003 年后仅略有上升，而队列生育率已明显趋于稳定（图 11）。因此，家庭政策的扩张减缓了队列生育率的下降，也有助于其之后保持稳定，但对时期生育率持续增长的贡献似乎相当有限。

图 11 1980-2018 年爱沙尼亚的总和生育率（TFR）、进度与孩次调整总和生育率（adjTFRp）以及 36 岁队列终身生育率（CTFR）（1950-81 年间出生的女性）



注：队列生育率数据仅计算到 36 岁，不含有小部分超过该生育年龄的生育数据。队列生育率跨度涉 30 年。

资料来源：人类生育数据库（2019）和本报告的计算。进度与孩次调整后总和生育率（adjTFRp）由 Kryštof Zeman 计算。

总而言之，提供产假对生育率影响效应的证据不一，极有可能是因为这些影响受许多因素制约，而且各国的假期规定也存在很大差异。尽管实证研究未提供

明确证据表明产假对生育的积极影响，但研究家庭的学者们一致认为，需要用带薪育儿假来弥补孩子出生和进入托育体制之间的时间，并允许父母中断就业而无需终止就业合同（Billingsley & Ferrarini，2014；Ruhm，2000；Thévenon & Solaz，2014）。尽管较长假期可能是一些父母的首选，但同时亦会对女性的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关于产假的最佳期限并未达成集中共识。在现实中，最佳休假期限受多种因素影响，如职业类型、职场职位、兼职工作的可能性、外部儿童托育机会，包括由祖父母照料以及个人偏好等。因此，各国越来越多地采用灵活的产假计划，提供多种休假期限（福利水平也有所不同），允许父母分批休假或与全职兼职工作相结合（参见专栏 4 和专栏 5）。灵活多样选择的育儿假使父母有可能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案。例如，期限相对较短但带薪福利的产假，对那些不想或不能长期休假的在职父母来说最为方便，而期限较长但津贴较低的产假（通常是固定津贴），更适合那些愿意与年幼子女待在家里更长时间或无法获得日托设施及其他儿童托育服务支持（如由亲人提供）的父母。

专栏 5. 育儿假使用的灵活性

家庭政策一直在努力匹配日益灵活的家庭和工作生活。育儿假计划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实例。育儿假计划旨在利用更灵活的方式鼓励父母分担照护子女。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推行育儿假计划，以允许父母在固定津贴或收入不同的情况下，选择福利较高但期限较短的产假或低薪但期限较长的产假。此类计划允许父母选择最适合其工作条件、外部托育服务可获得性或个人喜好的育儿假方案。例如，**捷克**父母可以在 7 至 48 个月的产假期间按月收到共计 22 万捷克克朗（按照 2019 年汇率，约合 8500 欧元；自 2020 年起提高至 30 万捷克克朗或 11600 欧元）的休假津贴（假期时间越长，每月津贴越低，最高津贴为休假前工资或 32,640 捷克克朗）。只要他们被视为子女的主要照顾者，即使他们继续工作，仍有权享受津贴（若其子女在 2 岁以下，则每月使用公共托儿服务不得超过 46 小时）。父母双方可以同时休育儿假，但在任何时候都只有一方有权领取福利津贴。父母可以轮流接受津贴，且没有次数限制。或者父母可休为期 12 个月的育儿假，并依其每日收入的 70%领取固定津贴（但不得超过每月 1,400 欧元）。

邻国**奥地利**也已出台类似的育儿假制度。在 456 天至 1063 天（分别对应 14 个月和 35 个月）期间，父母可获得共约 15,500 欧元的福利津贴。育儿假条例鼓励父母双方共享假期，以促进父亲的参与度。若父母双方均未达到 61 天的休假期限，那么在 365 天至 851 天（即 12 至 28 个月）期间，休假福利津贴总额将减少至 12400 欧元。在领取福利津贴时，父母每年最多能拿到 16200 欧元或相当于其上年收入 60%的津贴。他们还可以选择休 12 个月依据收入确定津贴的产假（若父母双方至少休 2 个月的假期，则为 14 个月），休假津贴为上一次净收入的 80%（最高为 2000 欧元）。共享育儿假的父母可以轮换两次（因此，假期最多可分为三段休，每个时段至少持续两个月），且除第一次交替前的一个月外，无法同时休假。若父母平均分配假期（至少是 60：40 或更平均的比例），双方还有权获得 1000 欧元的“合作伙伴奖金”（*Partnerschaftsbonus*）。

德国也有类似计划，但除此之外，它还提供了在育儿假期间重返兼职工作的可能性，并保留享有兼职育儿假福利津贴的权利，直至子女 2 岁生日为止。

重返劳动力市场但仅从事兼职工作的父母，可以得到占他们收入损失 65%的补偿津贴。**芬兰**和**挪威**的育儿假和育儿假福利为一年左右，并且和收入高度相关。此外，两国还向那些希望与子女待在家里更久的父母提供固定金额的现金津贴（例如，挪威在儿童两岁生日之前实行现金照护计划（Cash-for-care scheme），芬兰在儿童三岁生日之前实行家庭托育假）。相比之下，**瑞典**的产假制度为父母提供了很大的时间灵活性。每位父母都有资格享受 240 天的产假福利（其中 195 天与收入相关，为工资的 77%，另外 45 天为固定津贴），可分为全职、半全职、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时间工作，直至子女 12 岁生日（Duvander & Haas，2018）。

本专栏主要基于以下报告及其中的国别章节：国际休假政策网络，2018 年，*第 14 届国际休假政策及相关研究综述*（Blum et al，2018）。

育儿假应与提供公共托育服务保持一致，以便为有年幼子女的父母提供持续的公共支持。换句话说，父母结束育儿假重返工作后，应有使用日托体制的可能。瑞典即是将这两种体制完美结合的优秀实例。其根据父母双方的参与程度、假期长度、假期在子女一生中的分配情况、假期期间的就业水平以及在子女 12 岁生日前使用假期的可能性，提供一种待遇优厚且极其灵活的产假制度（参见专栏 3 和 9，Gunnarsson et al，1999；Duvander & Haas，2018）。意大利则是反例代表。该国为 3 岁及以上儿童提供方便的全职托儿服务，但对 3 岁以下幼儿的服务非常有限。与此同时，每位父母仅享有 6 个月的育儿假。这意味着，许多 0-2 岁孩子的父母要么依靠祖父母，要么选择昂贵的私人托儿服务（通常是托育员和保姆），要么终止其工作。因此，想要（或必须）继续工作的意大利年轻人可能更倾向于推迟生育，直至祖父母退休，或等到他们经济状况良好，能够负担私人儿童托育服务后。

4.4 支持父母双方共享育儿假

育儿假计划最初仅针对母亲。当前鼓励父母双方共享育儿假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降低了母亲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因此也鼓励她们拥有更大的家庭（规模）。此外，采用面向父亲的育儿假计划旨在让男性从工作中短暂休息，并从小就与子

女建立更牢固的亲子关系。完成此目标的第一步即是允许男女双方共享育儿假。这一看似性别中性的政策是在女性作为主要照料者而男性视为承担家庭生计者的背景下推出的，因此对父亲休假几乎未产生任何影响（Brandth & Kvande，2009）。第二步是引入个性化育儿假权利不可转让（给配偶）的方案（“非用即失”方案）。北欧国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率先采用这种个性化的育儿假方案，从而使男性休假大幅增加。在瑞典，目前 90 天的育儿假是为父亲保留的，获得育儿假的人群中男性占 45%。虽然父亲的育儿假仍比母亲少得多（占总休假天数的 26%），但可观察到他们的休假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2000 年父亲休假天数占总休假天数的 14%）（OECD，2019）。在过去 20 年间，对男性休假采取激励措施的一些国家中，使用育儿假的父亲人数也呈上升趋势（另参见专栏 5 中奥地利实例和专栏 10 中德国实例）。这些激励措施包括父母双方均享有不可转让的育儿假权利，或在父母双方都使用休假时给予额外休假。根据 OECD 数据，在丹麦、德国、比利时和葡萄牙，获得育儿假的男性比例略高于 30%（OECD，2019）。

关于实行育儿假权利对生育影响的实证证据仍然很少，而且男性的休假时间可能仍然太短，不足以产生影响。尽管如此，来自北欧国家的研究表明，休育儿假的父亲在重返工作岗位后更愿意照顾子女（Duvander & Jans，2009；Haas & Hwang，2008 年）且共享育儿假的夫妻更有可能（或更早）生育第二个子女（Duvander & Andersson，2006；Duvander et al，2010）。然而，应该指出的是，休育儿假的父亲可能原本就更注重家庭，这可能导致在这些研究中高估育儿假使用的影响。[9]

4.5 财政激励

实行财政转移补助旨在支持有受抚养人（包括子女）的家庭。它可以降低贫困风险、抵消与子女相关的一些费用、改善家庭的财务状况并为子女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由于它们降低了生育子女的直接成本，因此也被视为一项有助于父母实现其生育愿望的家庭政策措施。

不同家庭获得不同类型的财政转移补助。定期提供家庭福利、税收减免和税

[9] 如果父亲更多地参加陪产假和育儿假，使得女性更积极地投入到他们的事业中，或者父亲更加意识到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则可能对生育产生不利影响。这是 Farré和 Gonzales（2019）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2007 年，西班牙实行两周带薪陪产假后，父亲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儿童托育工作中来，这导致母亲的劳动力参与率略有上升，但之后男性再次生育的愿望也有所降低。

收抵免，同时一次性支付“生育奖金”、生育补助和其他转移补助。直接减税的税收抵免和家庭津贴通常旨在惠及低收入家庭，尤其是受收入制约的家庭。降低税收标准的税收减免，在更高税率下提供更高的福利津贴，因此对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在职父母更有利。

大多数实证研究发现，定期现金转移补助对阶段性生育率产生小而积极的影响。例如，据 Azmat 和 González（2010）估计，西班牙对有 3 岁以下子女的在职母亲实行额外税收抵免，并增加家庭税收抵免，从而导致每千名女性生育 3 个子女的概率增加（即 5%）。2009 年阿根廷政府启动了一项全国扶贫计划，该计划每月向失业父母提供最低工资 13%左右的现金转移补助，之后也出现了与西班牙类似的影响（Garganta et al.，2017）。在匈牙利，儿童相关福利支出每增加 1%，时期总和生育率将提高 0.2%（Gábos et al.，2009）。在以色列，2003 年以后儿童的每月补贴减少，这一现象在三孩及以上儿童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这被认为是与包括 35 岁及以上育龄妇女在内的各人口子总体生育意愿的降低有关（Cohen et al.，2017）。

然而，很少有研究证实现金转移补助对生育决策、以及对无生育夫妇生育计划具有长期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即使存在影响，现金转移补助的效果可能也十分的微弱。现金转移补助通常可能会影响人们的生育时间，但较难影响生育数量变动，即可能使人们的生育时间提前，但却不会因此而扩大生育规模。Luci-Greulich 和 Thévenon（2013）在对 18 个 OECD 国家进行研究后估计，现金福利支出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份额每增加 1 个百分点，进度调整后的总和生育率（***adjTFRp***）就会增加 0.02。与此同时，Kalwij（2010）发现，现金转移补助对西欧国家的终身生育率没有影响，而 Baizán 等人（2016）的研究则表明其仅对高学历人群存在积极影响。Brewer 等人（2012）对英国福利改革的效果进行了评估，该改革实行工薪家庭税收抵免，并增加对失业家庭的经济资助，这一举措使将孩均财政支持增加了 50%。结果发现，仅在改革后的一年内财政开支增加显著提高了生育率，而后续年份的变化则不明显，这进一步表明上述改革主要对生育进度产生较大影响。

除定期现金转移补助外，政府还会提供在孩子出生前后发放的“生育补贴”，但这种一次性的小额补助不太可能大规模地影响生育行为。过去一些国家实行了

这样慷慨的生育补贴政策，并使终身生育率有了些许提高，但该举措财政成本很高，且通常难以持续很长时间，在澳大利亚、加拿大魁北克和西班牙均最终叫停。上述举措还导致生育时间出现了重大变化。1988 年，加拿大魁北克省实行的生育津贴规定，第一孩生育和第二孩生育将一次性支付 500 加元（按照实时汇率为超过 400 美元），三孩及以上胎次的生育分 8 个季度支付 375 加元。这些金额在随后的几年里不断增加，到 1997 年计划终止时，父母在一孩生育后得到 500 加元，在二孩生育后得到 1000 加元（分两次支付），三孩以及上生育的父母将得到 8000 加元（分 20 个季度支付）。该计划对生育率提振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对高孩次生育的影响最为显著。据 Milligan（2005）估计，受此政策影响，当地的时期生育率整体增长了 12%，三孩及以上生育率增长了 25%。新生儿生育津贴也对终身生育率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该计划的经济成本相当昂贵——在 8 年的时间里，共花费了 14 亿加元，这意味着魁北克省政府为每个在无此计划便不会出生的孩子身上花费了大约 15472 加元(相当于今天 25,000 加元) (Milligan, 2002)。

2004 年，澳大利亚在该国时期生育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后不久，便建立了类似的生育补贴计划，其后于 2014 年废止。具体补助是一次性支付 3,000 澳元（按照实时汇率约 2,200 美元），2006 年增加到 4,000 澳元，2008 年增加到 5,000 澳元。据 Drago 等人（2011）估计，生育补贴对生育意愿和出生率提振具有微弱的影响，使出生率上升约 3.2%，这意味着额外生育一个子女的边际成本为 126,000 澳元（超过 90,000 美元）。由 Parr 和 Guest（2011）进行的另一项研究发现，该计划根本未产生任何影响。此外，澳大利亚的经验表明，生育补贴和类似计划的实行也可能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在生育补贴政策发布后相隔较短时期方开始实施的澳大利亚，大约 4% - 6%应在六月出生的孩子被延迟至七月初（Gans & Leigh，2009）。大多数生育是通过推迟剖腹产或引产程序改变出生时间的，这可能对新生儿的健康造成影响，同时也可能对医院的正常运转产生影响。

自 2007 年以来，俄罗斯建立了一项向二孩及以上孩次生育的母亲提供财政转移补助的体制，即“孕产资本（maternity capital）”计划。其政策设计、发展变化和对生育率的影响参见专栏 6。

其他国家和地区实行类似的但补贴较少的生育刺激计划表明，这些政策可能

会对一些社会群体的生育率产生影响——尤其是贫困人口和受教育程度较低人群——例如，通过奖励生育而阻止其终止妊娠（可参见专栏 6 中关于俄罗斯的证据）。这些政策甚至可能带来终身生育率一定程度的上升，但其总体影响是较小的。2000~2003 年，在意大利东北部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地区，政府推出了二孩生育补贴 3000 欧元、三孩及以上生育补贴 4600 欧元的政策（Boccuzzo et al.，2008），该补贴只向收入低于某一特定标准的女性发放。这一时期的出生人数增长了 2-3%，且增长主要集中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的低教育程度女性人群中。与此同时，流产率大幅下降。在 2007 年实行 2500 欧元短期生育补贴的西班牙也有类似的发现（González，2013）。

总体而言，资金转移补助可能对个体的生育决策起到支持作用，但对终身生育率的影响相对较小。这是由于财政转移补助，即使是慷慨的财政转移补助，也只能覆盖儿童抚育费用的一小部分。此外，财政转移补助的影响通常对受教育程度低、低收入或失业人士的生育率影响最大，对他们来说，公共转移补助具有更高的价值。区分不同收入家庭的慷慨货币激励措施（包括补贴高收入家庭）可能带来更大效果，但同时也意味着更高的成本支出。

专栏 6. 俄罗斯联邦的“孕产资本”计划和生育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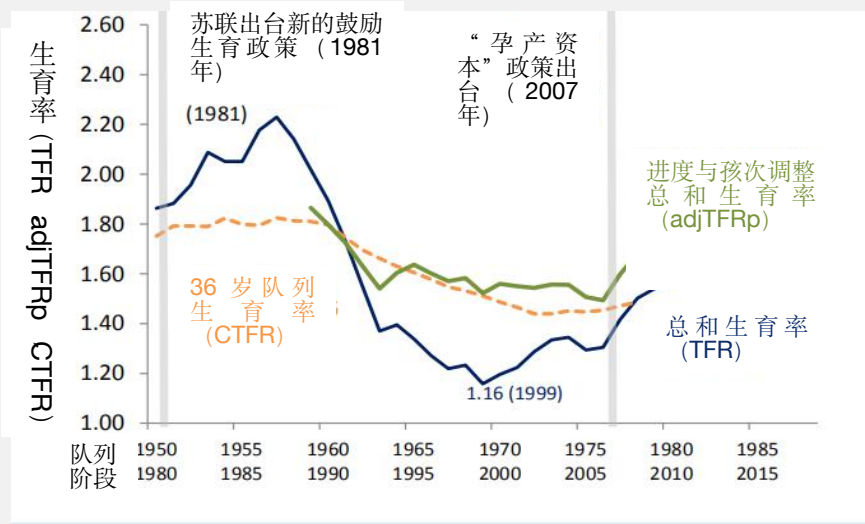
俄罗斯 2006 年通过了《关于国家支持有子女家庭的额外措施》，并自 2007 年 1 月起出台了明确的鼓励生育政策（俄联邦总统国家行政学院，2015）。由于许多俄罗斯女性只生一个子女（图 3），且独生子女家庭在该国已成为一种常态，因此这些政策旨在刺激人们生育二孩和三孩。其核心政策是建立“孕产资本”，即由俄罗斯联邦养恤基金会向第二次、第三次或多次生育的母亲一次性转移支付津贴（每个母亲只能得到一笔津贴，而不管她有多少个子女）。该福利可用于特定用途，如购买和装修住房、偿还抵押贷款、子女教育，也可作为母亲的养老金（俄罗斯联邦养恤基金会，2019）。该项目本应是短期性的，原计划持续至 2016 年，但目前已被延长。补助津贴的最初数额定在 250 000 卢比，自 2015 年以来，其现值固定在 45.3 万卢比（按 2019 年 4 月汇率折合为 6900 美元）。由于这项计划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俄罗斯许多家庭面临的财政和住房困难，因此很受欢迎。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联邦计划已由许多地区计划进行补充，旨在在此基础上为三孩甚至多孩家庭提供特定的生育补贴（Zakharov，2018）。这些地区生育补助计划的规模和范围各不相同，可以作为观测的试验样本。

随着政策的出台，俄罗斯时期总和生育率（TFR）开始上升，从 2006 年的 1.28 上升至 2016 年的峰值 1.79（图 12）。然而，由于父母们决定更早地生育子女，以在政策终止之前充分利用该计划，因此这种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生育时间转变造成的（Elizarov & Levin，2015；Frejka & Zakharov，2013）。尽管如此，在政策出台后的六年中，生育进度调整的总和生育率亦出现上升趋势，其中二孩和三孩的生育率增长态势尤为强劲：2006~2012 年，进度与孩次调整后的总和生育率（adjTFRp）增长了 0.21（图 12 和图 13）。这项政策还成功地阻止甚至略微扭转了 1957 年以后出生女性的队列生育率的下降趋势。

关于“孕产资本”计划对生育率影响的评价存在巨大差别。Biryukova 等人（2016）报告称，在对人口和社会经济因素进行控制以后，2007 年 9 月至 2011 年夏季，二孩及多孩次生育概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据 Slonimczyk 和 Yurko（2014）估计，考虑到经济条件的变化，“孕产资本”计划的实行导致平

均家庭规模增加了 0.15。Elizarov 和 Levin（2015）的研究显示，这项政策通过提高 30 岁以上妇女的二孩和三孩生育率而“达成了政策目标”。俄联邦总统国家行政学院（2015）的报告称，受政策预期效应的影响，2007 年中期的月出生数据大幅上升，其重点影响的是减少流产数量，因为更多妇女决定足月妊娠分娩。相比之下，一些研究报告称若有任何影响，则影响也很小（例如 Zakharov，2016）。Miljkovic 和 Glazyrina（2015）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固定效应模型对俄罗斯七个联邦地区的生育率数据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该政策使总和生育率微弱地增长（具有统计学的显著意义），增幅为 0.04。Frejka 和 Zakharov（2013）利用队列数据得出结论，该政策的主要作用是降低生育年龄和缩短生育间隔，从而提高时期生育率，而非终身队列生育率。该政策的影响因个体社会地位而异，且主要对低收入家庭的生育率产生影响（Biryukova et al，2016；Slonimczyk & Yurko，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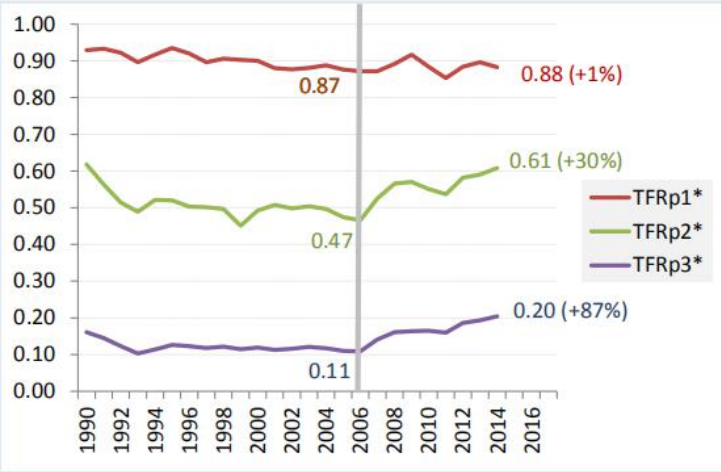
图 12 1980-2018 年俄罗斯总和生育率（TFR）、进度与孩次调整总和生育率（adjTFRp）以及 36 岁队列终身生育率（CTFR）（1950-78 年间出生的女性）



注：队列生育率数据仅计算到 36 岁，排除了小部分超过该年龄的生育数据。队列生育率涉及 30 年跨度，反映了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出生的女性在生育三胎时的平均年龄。

资料来源：人类生育数据库（2019），Zakharov（2018，第 7 章），Rosstat（2019）和自身计算。进度与孩次调整总和生育率（adjTFRp）由 Kryštof Zeman 计算。

图 13 1990-2014 年间俄罗斯按出生顺序的进度与孩次调整总和生育率（adjTFRp）



资料来源：人类生育数据库 (2019)。进度与孩次调整总和生育率 (adjTFRp) 由 Kryštof Zeman 计算。

4.6 劳动力市场状况

配偶的生育决策不仅受家庭政策的影响，还受劳动力市场政策和条件的影响。劳动力市场主要从两个途径对生育率产生影响。首先，工作的可获得性和稳定性很重要：对男性和女性来说，在为人父母之前有一份工作以积累资源，并在以后的生活中支持其家庭和子女至关重要。高失业率和雇佣合同高度不稳定国家的生育率较低（Adserà，2004 & 2011；Comolli，2017；另参见第 2.2 节）。其次，父母能够将工作与家庭生活相结合至关重要。诸如提供儿童托育服务和育儿假权利等协调政策对平衡工作与家庭有所助益，但在工作模式僵化和工作时间长的国家，尤其是在东亚，这些政策可能效用不大（参见上文关于日本和韩国的专栏 7 和第 2.2 节）。

当子女还小的时候，兼职工作使许多父母更易兼顾工作和照顾其年幼子女。在这方面，兼职工作有助于配偶的生育决策。一些研究确实发现兼职工作对生育，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来说具有积极影响。（Baizán et al，2016；D'Addio & d'Ercole，2005）。然而，兼职工作的类型和质量至关重要：若兼职工作在工作保

护、社会福利或时薪方面比全职工作差，则不会刺激生育（Del Boca & Pasqua, 2005；McDonald & Belanger，2016）。在一些劳动力市场僵化、高度分割的国家中，由于在兼职工作一段时间后很难将其转换为全职工作，因此，兼职工作也不太可能对生育率产生积极影响。此外，以全职夫妻家庭为主的国家中，减少工作时间可能并非可取选择，在国家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崩溃后，中欧和东欧的情况亦是如此 (Cipollone et al., 2014；Hobson et al., 2011；Kanjuo-Mrčela & Cernigoj Sadar, 2011）。

工作灵活性不仅可以通过兼职工作来实现，还可通过给予父母更多工作自主权来实现。根据家庭义务调整工作时间的可能性减少了工作与家庭间的冲突（Byron，2005；Hill et al.，2010），并对配偶的生育意愿产生积极影响（Begall & Mills，2011；Harknett et al.，2014）。由于新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普及，工作时间的灵活性越来越大，这使得雇员可以在家中或在标准工作时间之外进行工作，尽管这样可能延长工作时间。此外，公司可以采用灵活的工作时间表，如弹性时间（允许雇员设定起始和结束时间，以及超出雇主既定的一周核心工作时间以外的工作时间）或工作时间银行（一种允许在某时段内积累更多工作时间而在其他时段减少工作时间的工作时间记录系统）（Plantenga & Remery，2010）。

在讨论兼职工作时，往往从允许女性减少工作时间以兼顾有偿工作和儿童照料的角度出发。最近，越来越多的人指出，由于这使得男性很难参与到儿童养育中（Hook，2010；Thébaud，2010）且迫使女性失业（Cha, 2010 & 2013），因此男性从事有偿和长时间工作也会对生育造成不利影响。Baizán 等人（2016）在对包括 15 个欧盟国家和挪威的研究中发现，男性长时间工作对中等和高学历夫妻终身生育率具有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中尤为突出：研究人员估计，在男性每周平均工作 38 小时的国家，女性的终身生育率为 1.8；而在男性平均每周工作 45 小时的国家中，女性的终身生育率为 1.45 左右。因此，加强工作时间规定以减少加班时间，缩短工作时长，并为男性（不仅是女性）出台更灵活的工作时间，可能使夫妻更容易生育子女，尤其是在有长工作时间文化的国家中。

专栏 7. 大力推行家庭政策却生育率影响不明：以日本和韩国为例

日本是二战后亚洲第一个迅速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和教育发展的国家。这些力量使日本一跃成为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经历长期经济停滞（“失落的年代”）前，于 1990 年达到大国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最高水平。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其生育率开始下降，这一现象比亚洲其他任何国家出现的都早，下降速度更快，甚至超过了大多数富裕国家。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时期总和生育率（TFR）曾一度低于每名女性生育 2 个子女，在 70 年代中期便永远低于该阈值。随后，生育率下降速度放缓，但生育率持续下滑，总和生育率（TFR）在 90 年代中期降至 1.5 以下，并于 2002-2005 年短暂降至 1.3 以下的“极低”水平（图 14 和图 15）。

由于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日本和德国是全球人口年龄中位数最高的国家，超过 47 岁），伴随日益增多的老年人口照料问题、劳动力萎缩以及随之到来的人口总量缩减等挑战，生育率的下降引发了严重的担忧。由于低迁入率，这些挑战在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尤为严重。这些担忧促使政府长期大力发展支持家庭、婚姻和生育的政策（Matsukura et al.，2007）。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已逐渐实行和扩大一系列广泛的政策倡议和计划。这一做法使传统主要以现金补贴和税收减免为基础的男性负担家计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取而代之的是施行当今许多经济发达国家采用的典型的多元政策措施的做法。这种扩张亦反映在家庭总支出上，从 1990-91 年家庭支出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0.36%增至 2015 年 1.31%，几乎翻了两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家庭数据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9），但仍低于 OECD 的平均水平（1.97%）。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系列涉及扩大儿童托育服务的政策计划开始实施：从 1994 年的天使计划开始，许多计划和倡议均旨在扩大儿童托育服务，支持创建新的托育中心和公司儿童托育项目，减少等待名单上的儿童数量，降低父母的儿童托育费用，并支持课外托育项目（Matsukura et al.，2007；Tsuya，2015，内阁府，日本政府 2018）。目前，公立儿童托育服务的入园率仍然低于 OECD 国家中

0-2 岁儿童的平均水平(22.5%对 33.2%, 2006)，但 3 岁儿童的入园率已超过 OECD 平均水平。日本于 1992 年出台了为期 12 个月且无任何收入补贴的产假规定；1995 年以来，此规定不断修改，带薪产假得以实现，补贴水平和休假灵活性亦普遍提高。目前，休假补贴为假前月工资的 50%。不同政策均旨在增加男性休假率，同时让他们参与儿童照料活动。自 2010 年起，若父母双方均选择休产假，则休假期延长至 14 个月。然而，很少有日本男性使用产假（2016 年男性使用产假的比例为 3.1%（内阁府，日本政府 2018)），签订兼职劳动合同的雇员，由于工作日有限且受雇少于 12 个月均无法享有休假权利，这对决定在首次生育后减少工作时间，并选择二胎生育的母亲来说是一巨大障碍。此外，日本政府对于不遵守规定的雇主并无法律制裁。一些小型企业仍然没有关于产假的具体规定，这可能会限制雇员使用产假（Tsuya，2015）。

其他现行的家庭政策措施包括自 2000 年以来不断拓展的儿童福利政策，以及一系列非传统的措施和政策。自 2016 年日本政府通过“全民动态参与计划”以来，许多新举措相继出台，其中包括解决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措施和计划，内含实现平均每位女性生育 1.8 个子女的“理想生育率”目标(内阁府，日本政府，2018：第二章)。实施“工作方式改革”计划，以改善非正式工作人员的工作条件，并限制雇员的工作时间（在日本，工作时间过长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910] 这一政策同时还为促进结婚(尤其是由企业、城镇和地区实行的方案)、扩大儿童托育服务、免费提供儿童托育服务和高等教育、增加母亲就业和男性参与儿童托育、以及通过鼓励不同地区和企业方案出台共建“关爱儿童的友好型社会”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内阁府，日本政府，2018）。

由于日本的家庭扩张政策已经持续近 30 年，除 1990 年为扩张政策起点，以及 2016 年大量出台一系列举措外，很难确定具体的政策转折点。对生育政策效果的评估结果好坏参半。从表面上看，日本的家庭政策在支持生育方面基本上是无效的：时期总和生育率保持较低水平（2018 年为 1.43)，终身生育率处于全球最低水平行列（图 2)；无子女率达到 28%，除中国香港外，在全球处于最高水平（Sobotka，2019)，2018 年报告的活产婴儿数量（估计为 92.1 万）创历史新低，而要达到理想的 1.8 个的家庭生育规模的目标似乎仍遥不可及。然而，这些

9 为遏制日本臭名昭著的过度工作文化，一项新的劳动改革于 2019 年 4 月 1 日生效，该政策规定大公司雇员每月加班时间不得超过 45 小时（日本时报，2019）。

看似令人沮丧的数字也可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时期总和生育率已从 2005 年 1.26 的纪录低点回升，终身队列生育率已停止下降，无子女的情况亦基本稳定（图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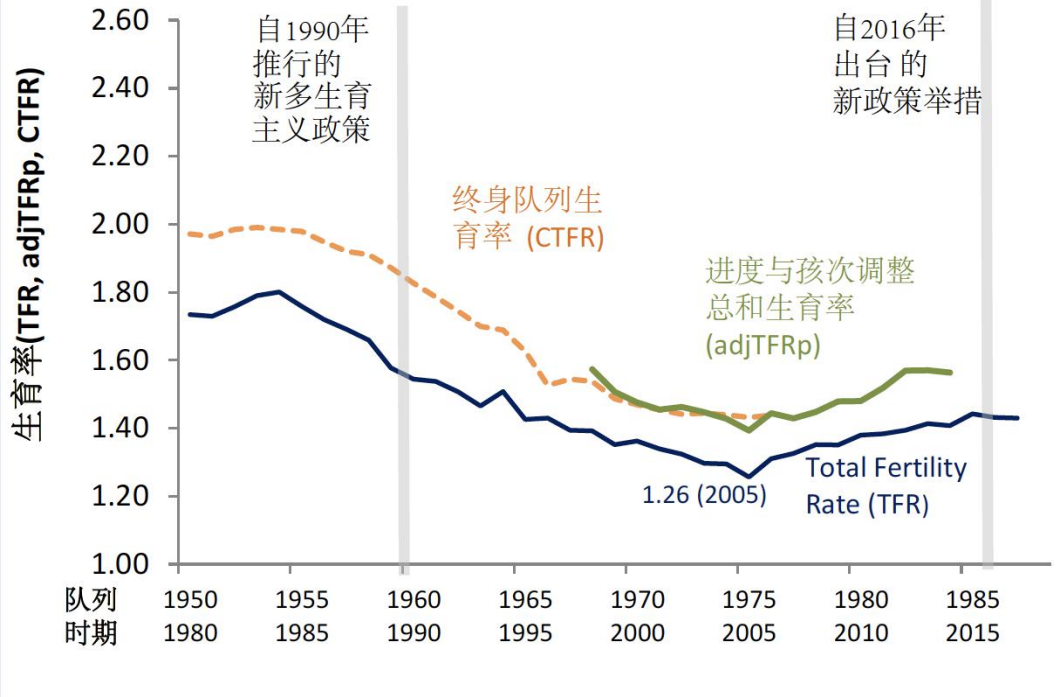
最重要的是，截至 1980 年，日本生育率一直处于亚洲最低水平，但自 2006 年以来，日本生育率一直高于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其他富裕国家水平（图 15）。相比之下，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生育率进一步下降，2018 年的总和生育率在 0.98-1.14 之间，处于世界最低水平（该水平是各国最低水平或接近历史最低水平）。韩国生育率变化至“超低”的趋势最令人瞩目，与日本相似，韩国已出台大量家庭政策改革，包括扩大儿童托育服务、延长带薪产假，以及努力控制工作时间过长现状（Adema et al.，2017；Lee，2018；卫生福利部，2015）。到目前为止，这些改革并未对生育率产生明显影响，2018 年总和生育率（TFR）跌至历史最低点 0.98，为全球最低水平。[10][11] 现在即对韩国家庭政策的长期影响作出明确评价为时尚早。国家各种政策改革对生育的影响可能存在相对滞后性，但有可能在未来推动生育率呈逐步上升趋势。

然而，在日本以及后来韩国出台的强化家庭政策措施，因为一些深层原因似乎未能有效地解决该区域生育率极低的情况。最重要的是，由于根深蒂固的父权文化、传统的劳动分工、紧张的工作压力和竞争激烈的教育体系，女性可能并未从这些政策中充分受益（Kim，2018；Brinton，2019）。工作时间长、缺乏弹性且经常超时工作，这些情况与主要由女性承担育儿和其他家庭责任发生了冲突（另见上文第 2.2 节）。在所有 OECD 国家中，东亚国家的性别分工最不平等（OECD，2017a）。

这些难题因工作合同的日益不稳定进一步加剧，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加之“教育热”给孩子们带来了学校考试及进入高水平大学的巨大压力，同时也给父母带来了高昂的时间和金钱成本（Lee & Choi,2015； Ma,2014&2016；Anderson&Kohler，2013），想要子女在如此竞争激烈且昂贵的教育体系中脱颖而出的父母，可能仅会选择生育一个子女（Tan et al.,2016）。目前，仍需采取更多措施以限制超额工作时间，改善兼职和固定期雇员的社会权利和休假待遇。

10 更引人注目的是，韩国的婴儿活产数量从 1983 年的 77 万下降到 2018 年的 33 万左右，而 2018 年的时期总和生育率保持在 2 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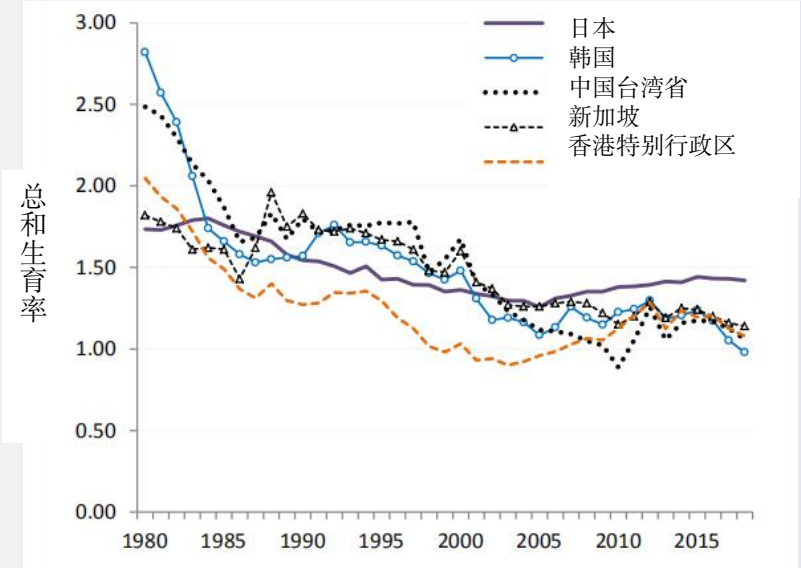
图 14 1960-2017 年日本总和生育率（TFR）、进度与孩次调整总和生育率（adjTFRp）以及终身队列生育率（CTFR）（1930-76 年间出生的女性）



注：图中所示队列生育率数据涉及 30 年跨度，反映了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 10 年代的平均生育年龄。1971-1976 年间出生女性的终身生育率显示，生育率在 2016 年时达标，估计有小部分是在 2016 年之后才得以实现。

资料来源：人类生育数据库（2019）和本报告计算。Kryštof Zeman 计算的进度与孩次调整总和生育率（adjTFRp）。

图 15 1980-2018 年日本、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总和生育率（TFR）



资料来源：人类生育数据库（2019），国家和地方统计局。

4.7 辅助生殖

政府政策通过两种渠道影响辅助生殖（AR）的使用。第一，根据儿童数量和女性年龄、女性婚姻和家庭状况以及女性已接受辅助生殖治疗的次数等标准，对辅助生殖提供补贴，并就可以获得补贴服务的资格制定条例。其次，通过建立更大范围的监管框架以规定可接受辅助生殖（AR）的人群以及可行的治疗方案，其中包括卵子捐献、冷冻保存、代孕等，并且许多国家禁止或限制单身女性、50岁以上女性和女同性恋伴侣使用辅助生殖（AR）（Präg & Mills，2017；ESHRE，2010 & 2017）。

辅助生殖（AR）的成本和可获得性影响其利用情况，从而也对出生率产生影响（Connolly et al.，2010）。自 21 世纪初以来，一些研究认为，关于辅助生殖（AR）的规定应纳入欧盟和各成员国的国家战略，以扭转生育率下降和减慢人口老龄化进程（Grant et al.，2006；Hoorens et al, 2007；Ziebe & Devroey，2008）。在发达国家中，以色列因其广泛的辅助生殖（AR）支持为人瞩目。该国采用以辅助生殖（AR）为重要支柱之一的鼓励生育主义政策。以色列的辅助生殖（AR）治疗不仅可得到高额补贴，享有广泛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世俗和宗教当局的支持。[11][12] 辅助生殖（AR）已经成为个别女性和夫妻生育选择的一部分（Sperling，2010；Birenbaum-Carmeli，2016）。

辅助生殖（AR）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每项评估结果都不尽相同。例如，Hoorens 等人（2007）提出，若英国的辅助生殖水平提升到与丹麦同等水平，那么英国的总和生育率绝对值将增加 0.04（或 2.4%）。由欧洲人类生殖和胚胎学会收集的数据显示，2014 年欧洲使用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儿童比例差异巨大（De Geyter，2018：表Ⅲ），从塞尔维亚的 0.2%到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 2%，再到奥地利、捷克、希腊、丹麦和西班牙的约 6%。整个欧洲平均为 2.1%，略高于美国的 1.8%。计算辅助生殖（AR）总和生育率，在塞尔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和爱尔兰，为 0.00-0.01，在意大利、德国、整个欧洲和美国为 0.03，在法国为 0.05，在斯洛文尼亚和捷克为 0.09，在丹麦为 0.11，在以色列为 0.13

11 在以色列，18-45 岁女性，无论其家庭地位或性取向如何，都有权享受“不受限制的资助治疗，直至与现任伴侣生下两个子女为止”（Birenbaum-Carmeli，2016：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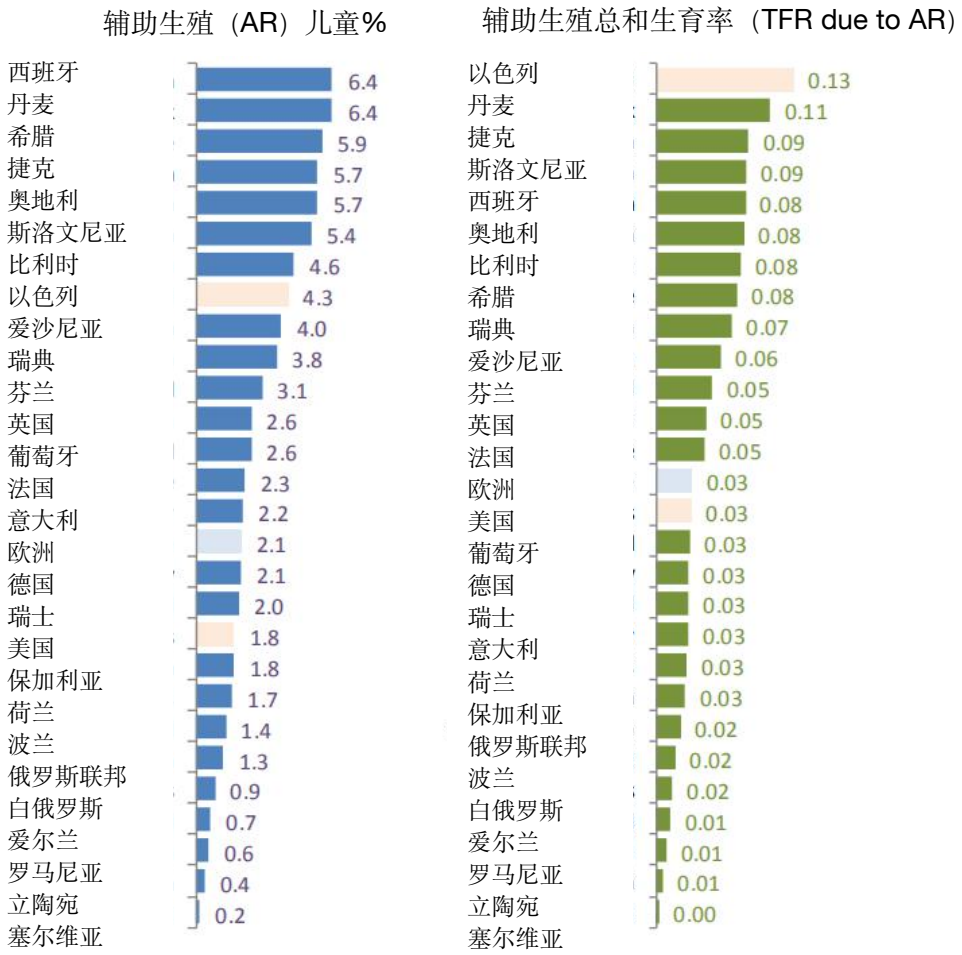
（图 16）。以色列的高值是由于在辅助生殖（AR）后的高儿童出生比例以及该国的高生育率（每名女性的总和生育率（TFR）和队列生育率大于 3），这在任何其他高度发达国家都是无法比拟的。在将辅助生殖相关总和生育率(AR-related TFR)处于 0.03 平均水平左右的国家和处于 0.08-0.11 高水平的国家进行对比后发现，充裕的政策补贴和提高广泛使用生殖辅助（AR）的可及性是具有一定“粗”效用的。

然而，这些粗略的估计并不能测算出辅助生殖对生育率的“净影响”，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一些辅助生殖使用者可能会自然怀孕（Eijkemans et al，2008；Van Eekelen et al，2017），或者说，没有考虑到一些辅助生殖使用者怀有双胞胎或三胞胎的“额外”分娩。控制上述因素的研究发现，辅助生殖对生育率的影响较小。据 Sobotka et al（2008）估计，使用辅助生殖对 1970 年间出生的丹麦女性终身生育率的“净效应”为 0.036-0.057，而“粗效应”为 0.068。Habbema et al（2009 年）在假设模型中对辅助生殖的潜在影响做出了更高估计，该模型指向三年不孕或一年不孕后所有选择辅助生殖的不孕女性。三年后，完全接受辅助生殖治疗使总和生育率增加了 0.08 个子女/妇女，而一年后，完全接受辅助生殖治疗使总和生育率增加了 0.04 个子女/妇女。由于费用高昂，妇女多胎分娩的数量大幅增加，从健康和医学角度来看是存在问题的。在德国，一项政策“实验”表明，辅助生殖费用确实会影响人们治疗不孕症。2004 年，德国的医疗保健系统法改革规定，所有接受补贴的辅助生殖治疗和药物的共同支付比例为 50%，从而导致辅助生殖周期和辅助生殖活产数急剧下降，同时也阻断了之前辅助生殖使用的上升趋势（图 17；另参见 Connolly et al，2009）。从 2002 年起用了近十年时间，辅助生殖的出生人数才达到改革前的水平（不包括 2003 年预期改革引起的激增），时至今日，若辅助生殖治疗仍得到充分补贴，辅助生殖的使用无疑会更高。

总而言之，可及的辅助生殖可能会对生育率有很小的积极影响。当考虑到自然怀孕、非意愿生育以及并非所有女性和夫妻双方都愿意接受有压力的辅助生殖手术时，辅助生殖最多能够提高 0.05 的总和生育率（或 4%）。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推迟生育年龄，新辅助生殖技术，如“卵子冷冻”应运而生，辅助生殖的重要性在未来女性持续推迟生育年龄的趋势下可能会增加，而且生育年龄越大辅助生殖技术的效果越明显。同时，正如一些研究通常指出的那样，若男性精子质量和

数量长期持续下降，辅助生殖的重要性也会随之增加（例如，Levine et al，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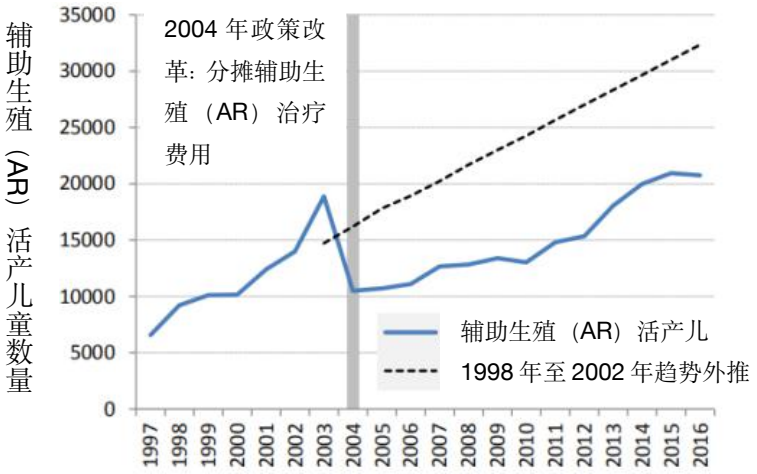
图 16 2014 年欧洲部分国家、以色列和美国通过辅助生殖治疗受孕的活产儿比例和辅助生殖对总和生育率（TFR）的贡献估计



注：以色列数据是 2013 年的数据，美国数据是 2015 年的数据。辅助生殖治疗是指为了生殖而采取的一切干预措施，包括体外受精和体外胚胎培育（Zegers-Hochschild et al，2017）；不包含宫内受精。一些国家的数据还包括对其他国家女性进行的辅助生殖测试。

资料来源：辅助生殖治疗后出生儿童的比例：De Geyter（2018：表 3）；Birenbaum-Carmeli（2016）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2017）。辅助生殖总和生育率：基于上述资料和欧盟统计局（2019）以及人类生育数据库（2019）的数据自行计算。

图 17：德国辅助生殖活产儿童数量（1997-2017 年）:利用 1998-2002 年的趋势进行简单外推的观察和预测结果



资料来源：*德国试管婴儿注册中心 2017 年年报*（Blumenauer et al，2018），趋势外推是基于我们计算得出的简单线性外推。

专栏 8.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中欧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鼓励生育主义政策和生育率

中欧和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在支持家庭和提高生育率方面有很长的政策和干预历史。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许多人从农村搬到城市，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在兼顾就业、儿童托育和家务方面面临巨大挑战，大部分地区生育率很低或处于下降趋势。该地区大多数国家都深受家庭性别角色、孕产和性别分工的传统观点和期望影响。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各国政府开始出台各种旨在鼓励生育的措施，包括提供儿童托育服务、延长产假、为新婚夫妻提供儿童福利专项贷款、提前有子女女性的退休年龄、为有子女的家庭优先分配住房等（David，1999；Sobotka，2011）。这些政策往往还包含一些限制，例如对未在一定年龄结婚的单身人士额外征税（如在保加利亚和苏联），或在将人工流产作为一项广泛使用的节育方法的地区限制流产（David，1999；Frejka 1983；Stloukal，1999）。这些国家的家庭和鼓励生育主义政策影响不一。我们回顾了罗马尼亚、**前民主德国（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三个国家的政策干预效果相关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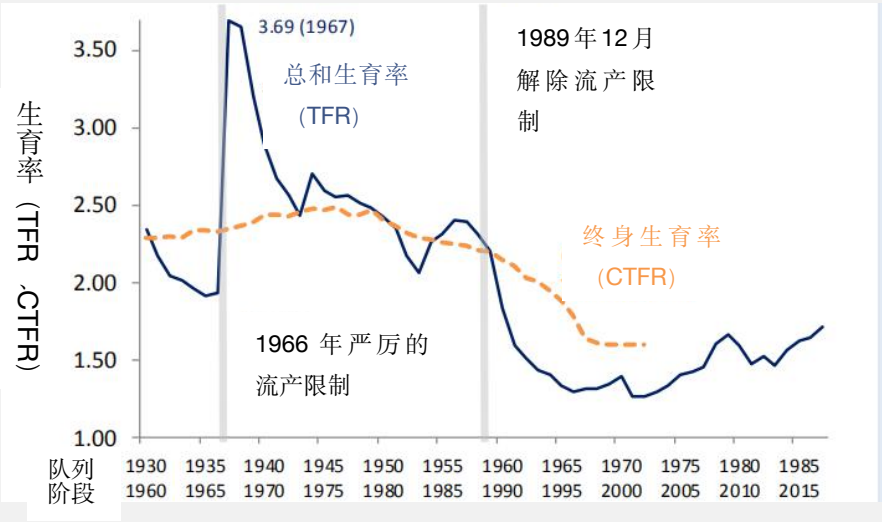
此处回顾的政策——罗马尼亚除外——与今天不同国家正在实行和涉及的一些措施类似，但它们是在完全不同政治体制背景下实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征是一党执政，基本充分就业，收入和社会状况差异较小，僵化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政治自由匮乏（Sobotka，2004）。因此，这些研究发现不能“应用”于现在的市场经济国家，但它们为过去那些相对有力的政府干预究竟会对生育产生哪些影响提供了有用的见解。对历史证据的回顾，也使我们能够超越短期变化，从受这些政策影响最大的一代女性角度来了解家庭政策的长期影响。

多生育主义政策在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的罗马尼亚最为强硬。那时的罗马尼亚由 N. Ceauşescu 执政，他长期痴迷于人口增长（Soare，2013）。自 1966 年 11 月以来，曾广泛使用的人工流产手术受到严格限制。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进一步限制了避孕药的进口和销售（Baban 1999；Klingman，

1998）。上述极端法律的实施确实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并出现短暂的生育高峰，即生育率大幅上升，之后便出现下降态势。在外部严苛的限制和时期条件的变化下，时期总和生育率从 1966 年的 1.93 跃升至 1967 年的 3.69，随后迅速下降，最终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于 2.0-2.7 间上下浮动。此外，在 1900-1920 年间出生的女性中，终身队列生育率一直呈迅速下降趋势，而在受限制流产法影响最大的 1930 年后出生女性中，生育率出现逆转态势。因此，对于 1930 年至 1946 年间出生的女性，每名妇女的终身生育率从 2.29 个子女增加至 2.46 个子女（图 18）。

多生育主义政策为母亲和儿童以及全体家庭的健康和福祉带来高昂且持久的代价，包括由非法流产导致的高产妇死亡率、大量被遗弃在孤儿院里的儿童（Baban，1999），以及对流产禁令实施后出生的大批女性和男性在教育和劳动力市场造成的不利影响（Pop-Eleches，2006）。

图 18 1960-2017 年罗马尼亚总和生育率(TFR)和终身生育率(CTFR) (1930-71 年间出生的女性)



注：图中所示队列生育率数据涉及 30 年跨度。例如，将 1980 年的生育率与 1980 年出生女性的家庭规模进行比较，这些女性受到当时多生育主义政策的影响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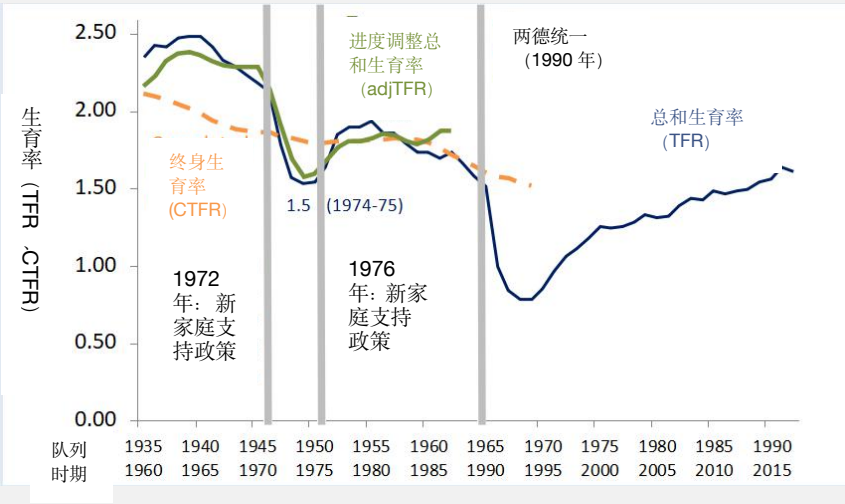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总和生育率（TFR）：Gheţău 1997 年，欧盟统计局（2019）和自身计算。终身队列生育率：Gheţău 1997 年和 2011 年人口普查（CFE 数据库 2019）。

东德（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家庭政策以一套更为标准的措施和奖励为基础。自 1972 年以来，东德的政策明确指向提高生育率，人口目标被纳入政府的政治议程（Kreyenfeld，2004）。在 1972 年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家庭的措施。包括为年轻夫妻提供结婚贷款、扩大儿童权益、延长产假以及为生育三个及以上子女的母亲减少工作时间（Kreyenfeld，2004，表 1）。单身母亲有权获得额外福利，例如在没有儿童托育场所情况下可享有一年带薪假期。同时，流产合法化，且免费提供避孕药具。上述政策措施实施的结果却造成生育率持续下降至很低的水平，总和生育率在 1974 年到 1975 年降至 1.54，这是当时全球最低水平之一（图 19）。由于新出台的多生育主义政策与随后的生育率下降伴随出现，因此使东德成为政策预期相反的特殊案例。新出台政策的另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是结婚率的长期下降和婚外生育的持续增加，部分原因是由于政策为单身母亲提供的额外福利（Salles，2006）。

1976 年，又一轮扩张家庭政策出台，包括为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母亲提供一年的带薪假期、减少工作时间，以及延长产假。在随后几年间，生育率有所上升，尤其是二孩和三孩生育。评价这些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使用的衡量标准。1976 年以后，传统的和进度调整生育率指标均明显增加，随后稳定在较高水平上。在 1950 年至 1957 年间出生且从新出台政策中受益最多的女性中，终身队列生育率停止下降，甚至略有上升（从 1.79 到 1.83）（图 19）。东德生育率最初也以与西德相似的速度下降，新出台政策实施后开始偏离西德的趋势。与此同时，其生育率直至 1971 年才恢复至正常水平，且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东德的生育率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中一直处于最低水平，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该情况尤甚。两项研究对 1976 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家庭政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评估。Monnier（1990）对 1976 年以前年龄别队列生育率趋势变化进行了模拟，并比较了在 1944-1955 年间出生女性于 1980 年和 1984 年模拟和实际生育率。分析结果显示，政策主要对生育时间造成影响，而对这些队列的家庭规模影响较小，其中 1953-1955 年最年轻女性出生队列除外，其每位妇女的平均生育数提高了 0.1-0.2。Büttner 和 Lutz (1990) 使用年龄-时期-队列模拟方法预测了在无新政策情况下 1977-1987 年的时期总

和生育率并得出相应结论，政策使该时期总和生育率（TFR）提高了 15%-18%，或绝对值提高了 0.19-0.25（1980 年除外，政策在当年的影响更大）。有趣的是，这一差异与东德和西德于 20 世纪 50 年代和 20 世纪 60 年代初出生的女性终身生育率差距大致相符。

图 19 1960-2017 年东德（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和生育率（TFR）、进度调整总和生育率以及终身队列生育率（CTFR）（1935-69 年间出生的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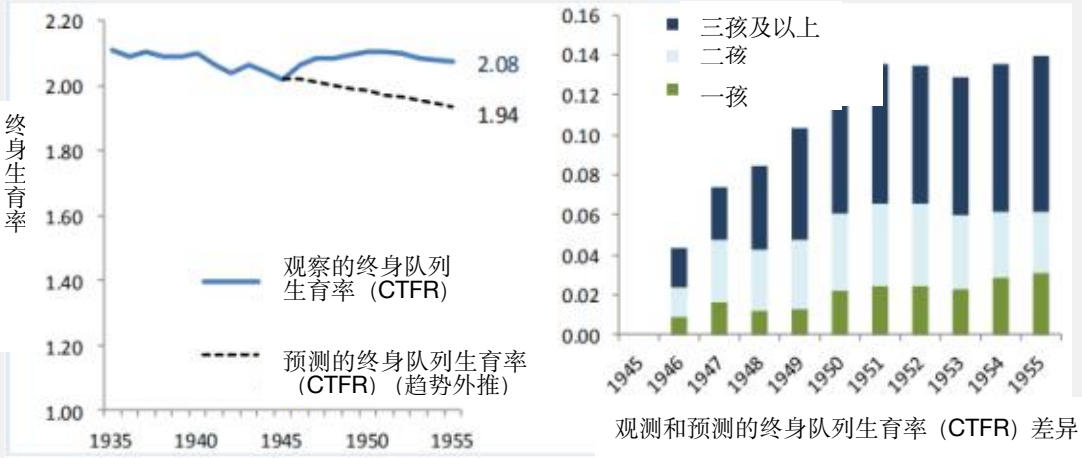
注：图中所示队列生育率数据涉及 25 年跨度，反映了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的平均生育年龄。例如，将 1980 年的生育率与 1955 年出生且处于生育高峰期的女性的家庭规模进行比较。进度调整总和生育率是 Bongaarts 和 Feeney（1998）研发的方法计算的指标；图表显示了平滑波动的三年移动平均值。

资料来源：人类生育数据库（2019），德国联邦统计局（2019）

与东德几乎处于同一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也实施了一系列支持家庭的措施。1968 年至 1973 年期间，产假延长，育儿津贴增加——尤其是二、三孩——并对两岁以下儿童的母亲提供延长带薪产假。自 1973 年以来，30 岁以下的新婚夫妻有资格获得低息贷款，在子女出生后，贷款即被部分抵消（Heitlinger，1979；Frejka，1980）。此外，积极开展住房建设，特别是在较大的城镇和城市，迅速发展大型公寓。这些措施相当重要，家庭支持政策约占政府总支出的 10%。时期总和生育率（TFR）开始上升，尤其在生育率低于斯洛伐克的捷克（见上图 5）。

1968 年以苏联为首的入侵破坏了该国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影响了该国人口，这一状况给政策影响的评估蒙上了阴影。许多人纷纷退出社会和公共活动回归家庭生活，由此可能带来了生育率的提高（Kučera，2008）。政策对生育的影响主要是由于生育提前和生育间隔缩短。在对捷克 1968 年低谷到 1974 年高峰期的生育率进行比较后，不难发现这一点：传统总和生育率（TFR）从 1.83 跃升至 2.43，增幅为 0.60，而进度与孩次调整总和生育率（adjTFRp）增幅较小，仅为 0.20（从 1.97 升至 2.17；见上图 5）。Frejka（1980）的分析表明，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队列生育率也受到了影响，特别是 20 多岁的女性，其二孩和三孩的比例更高。图 20 为根据出生于 1938-1945 年间受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多生育主义政策影响最大的女性生育率观测值，所做的 1946-1955 年的简单趋势外推的队列生育率。与观测到的队列生育率进行比较后发现，多生育主义措施使每名女性平均多生育 0.14 个子女（即提高了 7%），其中三胎及以上生育率贡献最大（图 20）。

图 20 捷克 1935-55 年间出生女性终身队列生育率（CTFR）的观测趋势和预测趋势（左图）以及两种方法间的差异（按出生次序，右图）



注：假设的 CTFR 预测是基于对 1938- 1945 年出生队列生育率趋势的线性外推，分别计算了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生育。

资料来源：根据人类生育数据库（2019）数据进行的计算。

总而言之，中欧和东欧的多生育主义政策干预措施常常是大起大落出台，

而这些干预措施导致了暂时的婴儿潮。出生人数和时期总和生育率的明显波动往往在政策出台几年后开始减弱。这些波动很大程度上受出生时间变化影响——向生育提前和生育间隔缩短转变——但其对生育率水平产生了真正的影响，正如进度与孩次调整总和生育率的适度增加和之前下降的队列生育率趋于稳定或略微上升所示。我们以前民主德国和捷克为例对这些适度的影响加以说明，政策效应体现为平均每名妇女生育孩子数提升 0.10-0.25 个。20 世纪 80 年代，出台相关政策推动生育率增长的**俄罗斯**也发现了类似的证据 (Zakharov, 2016；另参见上图 11)。只有诸如罗马尼亚出台的严厉反堕胎限制和其他限制性措施，以严重侵犯个人人权和生殖权利为代价，暂时取得了较大的生育效果。

4.8 政策组合：评估“一揽子”家庭政策对生育率的总体影响

上述实例表明，家庭政策通常会影响生育率，虽然这些影响往往较小，更多的表现在时期总和生育率的短期指标和生育时间及生育间隔的变化中，对队列生育率（家庭规模）则无持久影响。基于不同国家、数据、方法和研究设计、指标和假设以及所研究的人口群体得到的关于政策影响的结论并不一致。上述专栏 6 中对俄罗斯 “孕产资本”政策影响的各种评估即是最好的典型实例。

*总而言之，在现有的文献综述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持续提供公共儿童托育服务*对终身生育率产生积极影响，其中对受高等教育女性的影响最大。此外，在下列情况中，提供儿童托育服务最有可能带来积极影响：

1.高质量儿童托育服务令父母相信其将对子女产生有益影响；

2.各年龄阶段儿童托育服务均可得，尤其是 3 岁以下幼儿，但同样适用于放学后需要照料的学龄儿童；

3.开放时间与父母工作时间一致，为全职父母、上早班或下班较晚的父母提供儿童照料；

4. 不会给父母带来高成本。

*产假计划*的影响差异较大，这可能是由于在产假权利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

包括休假期限、灵活性、父母间共享休假的选择、休假福利水平和普遍性，以及应享权利的条件。若其津贴优厚，产假可能将对生育率产生积极影响。产假计划应与公共儿童托育服务的供给相协调，以缩小孩子出生和接受公共儿童托育服务之间的差距。灵活的产假计划使得父母可根据需要调整其产假期限（专栏 5）。个性化的产假权利使得父亲能够根据“非用即失”规则充分利用产假假期，并促进伴侣之间进行更平等的养育分工。除对生育率的影响外，产假计划对促进新生儿福祉亦至关重要，让母亲在分娩后得到康复，让父母在不终止劳动合同情况下得以休息，让父母与新生儿间建立亲密关系。

*财政激励*往往对生育产生积极影响，但对终身生育率的长期影响则相对较小：如前所述，其影响很小且主要对低教育水平和低收入人群产生影响。财政转移对提高生育率的作用有限，因为它们只能覆盖儿童养育成本的一小部分。充裕的现金激励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效果，但同时也意味着政府需付出很高成本——因此，现金激励机制往往被取消或修改，尤其是在经济紧缩时期。由于女性和夫妻试图在该类政策终止前充分利用相关优惠，则可能会改变生育时间。生育率同时还受*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影响。在劳动力市场僵化，即毕业或离职后难以就业的国家，通常生育率较低。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对家庭最友好，一方面就业更加容易，另一方面父母可以调整工作时间以完成家庭义务。尽管兼职工作鼓励兼顾有偿工作和家庭生活，但在小时工资、社会保障权利和培训机会方面，兼职工作应提供与全职工作类似的条件。此外，劳动力市场应适应男性角色的变化，允许父亲休产假、减少工作时间或进行灵活的工作安排。上述权利似乎仍旧更多面向女性，而男性仍被视为工作表现不受家庭状况影响的“理想工作者”。即使在性别高度平等的瑞典也是如此（Haas & Hwang，2019）。

提供有补贴且可广泛可及的*辅助生殖服务*对生育率有较小的积极影响。社会和文化对辅助生殖（AR）的接受度高，例如以色列或北欧等典型国家国家，其不孕夫妻中辅助生殖（AR）的使用率也更高。

单一的政策措施不太可能提高生育率，特别是当它们基于过时的关于家庭和性别角色假设建立政策模式时更是如此。相反，我们需要一整套连续的、相互兼容的家庭、劳动力市场和健康政策。这些政策应反映过去几十年间家庭和社会的变化，包括逃避婚姻、转向晚育、新家庭形式多样化、高等教育扩张——尤其是

在女性群体中——以及女性和男性所追求的新职业和休闲愿望。新政策还应回应新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许多国家年轻男女间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性、飙升的住房花费，以及男女生育选择和偏好的多样性。简而言之，政策应回应民众的多样化需求，而并非仅取决于决策者的意识形态。且随着时间推移，政策还应该保持相对稳定。

各国根据其经济状况、文化和家庭价值观、性别规范和性别关系、劳动力市场、宗教和意识形态影响、实际人口变化趋势和许多其他因素，采取不同路径来制定家庭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国家已经成功地制定了全面和有效的家庭政策。专栏 9 对瑞典和法国这两个案例中现代家庭政策成功发展的演变和主要特征进行介绍。专栏 10 展示了家庭政策组合在德国的最新沿革，该国的家庭政策直到最近还倾向于支持父母间传统的性别角色划分。

专栏 9. 瑞典和法国的现代“一揽子”家庭政策的漫长发展道路

几十年来，瑞典致力于制定一套连续的一揽子政策。瑞典的现代福利和家庭政策基础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已奠定，当时社会学家 Alva Myrdal 等主要改革派推动纳入以儿童为中心的观点、生殖权利和两性平等的政策（Myrdal，1941 年）。20 世纪 70 年代初，为应对妇女劳动参与率不断提高和生育率下降的问题，政府向父母提供了延长产假的权利和执行现金转移。政府在女性社会角色变化方面亦作出相关应对措施，逐步扩大儿童托育服务的覆盖范围。人们认识到，双薪家庭模式可对家庭产生许多积极的影响，因为这种情况下子女将有机会在更富裕家庭中成长，并接受高质量学前教育（Wells & Bergnehr，2014）。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瑞典就已经出台育儿假（取代只针对母亲的产假），并开始扩大公共儿童托育服务。1979 年政府给予学龄前儿童的父母减少 25% 工作时间的权利（Wells & Bergnehr，2014）。育儿假是带薪的，且福利与休假前父母的收入挂钩。这一制度旨在鼓励女性在生育子女之前确立其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并鼓励男性充分利用育儿假。由于该政策可能会导致延迟生育，瑞典政府采取激励措施，鼓励父母将生育子女间隔时间拉的更近（参见专栏 3）。在产假权利和兼职工作权利出台的同时，1 至 6 岁儿童的公共儿童托育服务也逐步扩大。公费儿童托育机构的数量从 1965 年的 1.2 万个增加到 1980 年的 13.6 万个，截至 2002 年已增加至 73 万个（Earles，2014 年）。20 世纪 90 年代，政府开始加大儿童托育扩张力度，出台了每个 1-6 岁的儿童入园轮候时间不超过 3 个月的托育权（Earles，2014 年）。自 2008 年起，父母也可选择自己照顾子女，并为此获得家庭照护津贴（Ferrarini & Duvander，2009）。

瑞典是最早认识到必须支持父亲争取照顾子女权利的国家之一。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瑞典就已出台父亲使用育儿假的权利，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将其个性化，逐步扩大休假比例中为父亲保留的部分（Duvander & Johansson，2012）。这项政策符合在公共和私人领域提高两性平等的理念，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这一直是瑞典家庭政策模式的基础。最后，瑞典雇主对雇员的家庭

义务有较高的认识（Den Dulk et al.，2014）。瑞典公司有灵活的工作时间，且经常允许人们在家工作，公司会议也不会安排在清晨或下午下班前（Hobson et al.，2011；Wells …& Bergnehr，2014）。

法国亦制定了一套连贯的一揽子家庭政策。相较于瑞典家庭政策模式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两性平等，法国政策主要集中于改善家庭和儿童福利方面（Gauthier 1996）。因此，法国的家庭政策模式是建立在向家庭提供充裕的现金转移以及广泛的儿童托育服务的基础上。公共儿童托育服务的最初目标是致力于保障儿童的机会平等。后来，允许女性参与劳动的目标才变得越来越重要。法国的现金转移具有多生育主义特征，主要针对大家庭（Martin，2010）。税收减免是构成法国家庭政策体制的基石之一。应税收入可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加而减少（Letablier，2003）。此外，法国还向两个及以上子女的父母提供全面家庭津贴、针对贫困家庭的特殊津贴和住房津贴（Thévenon，2016）。

法国家庭享有极为发达的儿童托育服务系统所提供的服务。法国儿童托育服务扩张背后的理念，深深植根于一种广泛的共识，即国家要对儿童的福祉负责，包括照料在内。多样性是法国儿童托育系统的特点之一，它满足了父母和孩子的多样化儿童托育需求。儿童托育服务可由市政当局组建的传统日托中心提供，也可在由经认证的托育人员、企业和幼儿园提供的家庭日托中心（通常由上市公司运营）以及以小时计的提供不定时临时照护收容中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6b）提供。法国家庭支持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工作时间较短，每周标准工作时间为 35 小时。虽然缩短周工作时间主要是为了减少失业和促进工作分担，但这项改革的第二个目标是促进工作与家庭平衡（Letablier，2003 年）。该政策确实使实际工作时间缩短、父母间工作时间差距缩小，同时亦对双方全职参与劳动提供了支持（Letablier，2003）。

瑞典和法国一贯而慷慨的家庭政策组合，根据社会变化和人口需要适时调整，这通常被视为是两国相对高生育率（Björklund，2006；Thévenon，2016）以及瑞典生育率教育水平差异低（Jalovaara et al.，2018）的重要原因。它们可以作为其他国家进行家庭政策改革以应对政策需要变化和生育率下降挑战的范例。专栏 10 对德国家庭政策改革实例进行了相关讨论。

专栏 10. 德国现代家庭政策之旅

过去的二十年间德国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从最初认为女性，特别是母亲的劳动力参与是对家庭的威胁，演变到到积极支持性别角色不那么严格的现代家庭形式。与瑞典和法国（参见专栏 9）相似，西德（或 1990 年以前的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曾施行一套连续的一揽子家庭政策，但与这两个国家不同的是，德国的家庭政策旨在支持传统的男性养家的模式。包括儿童福利、广泛而低薪的育儿假、在已婚夫妻家庭进行税收分割（本质上是对男性养家进行经济奖励），与双职工家庭不相匹配的开放时间短且服务质量差的儿童托育服务。这种家庭政策模式，虽然相当慷慨且连续性强，但并未回应女性希望更多地参与劳动的意愿。相比之下，在德国东部，即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双职工家庭模式有着悠久的传统：育婴所和幼儿园随处可见，女性在子女三岁之前就会重返全职工作岗位（另参见专栏 8）。

母亲有限的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导致了德国生育率的下降。面对持续的低生育率，各方达成了政治共识，认真改革德国的政策模式，使其更能适应社会性别的变化。2007 年，德国在大力借鉴瑞典家庭政策模式后，出台了新的一揽子家庭政策。该政策在工作和家庭之间起到了很好的调和和平衡作用，同时若父母愿意，他们可以提供居家照护。此政策还鼓励父亲更多地参与育儿工作，增加育儿假中的父亲使用的占比（Geisler & Kreyenfeld, 2019）。

使母亲重返劳动力市场的第一步始于 1996 年，规定三至六岁（即直到达到学龄）儿童幼儿园入学的法定权利。21 世纪前 5 年，德国通过法律，逐步强制**扩大全日制学校和**三岁以下儿童**托儿设施的规模**。允许在职父母从所得税中扣除育儿费用（最多 4000 欧元）。自 2007 年起，他们还享有 12 个月的**由收入确定的育儿假福利津贴**，津贴为假前工资的 67%（每月上限为 1800 欧元）。这包括八周的产后假期，津贴为假前收入的 100%（预计在生育前还将使用另外六周的全额替代工资津贴）。若父母双方都参与为期至少两个月的带薪育儿

假，则假期可延长至 14 个月。这项政策旨在鼓励父亲更多地参与育儿工作。对比 2008 年和 2015 年，父亲的休假比例从 21%稳步上升至 36%。

通过为父母双方创造灵活的休假和就业条件，使用育儿假的父亲人数增速加快：自 2015 年起，父母可以在**兼职基础上**使用长达 36 个月**育儿假**。在此情况下，父母双方可以同时兼顾兼职工作和子女照料。收入损失，即全职和兼职工作之间的工资差异，可补贴 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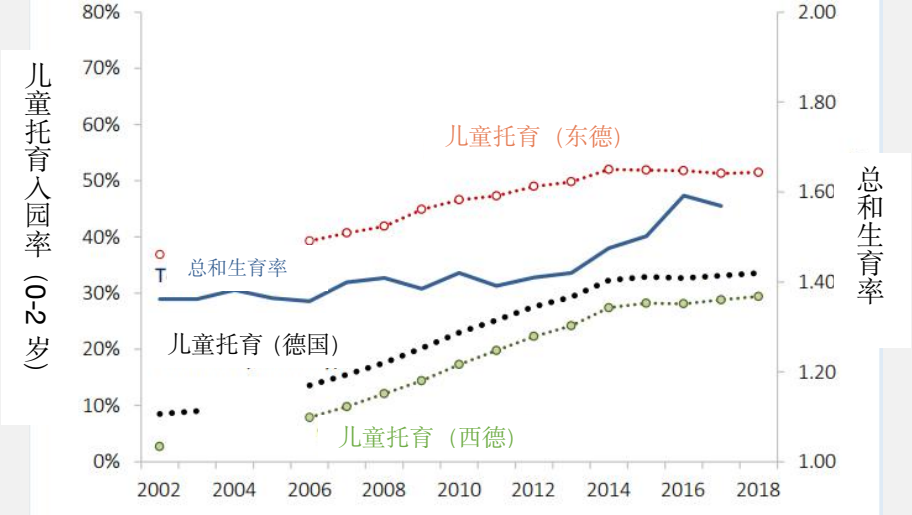
家庭和工作生活结合越来越灵活与儿童托育服务的进一步扩大，尤其是 3 岁以下儿童的儿童托育服务进一步扩大密切相关（图 21）。自 2013 年起，父母就**可以合法要求其一周岁以上子女获得机构的儿童托育服务**。学费因联邦州（BundeslBundesländer）而有所差异，但通常取决于父母的收入，并且越来越多的由州政府补贴；在一些地方，所有费用均由当地政府支付。因此，机构式儿童托育越来越受欢迎，超过 90%的 3 至 6 岁儿童每天至少有一部分时间在幼儿园。虽然东西德统一已近 30 年，但德国东西部儿童托育人数的差异仍然很大（图 21）。在东部，儿童进入日托机构的年龄更小，待在那里的时间也比西部儿童的时间长，在西部，大多数儿童只有在三岁时才会去非全日制的幼儿园。此外，对 0-2 岁儿童的儿童托育服务仍然落后于需求，尤其是在德国西部地区。2017 年，3 岁以下儿童的父母中有 45%表示希望让他们入园上学，而实际入学儿童仅占 33%（BMFSFJ, 2018）。

除促进儿童托育措施外，每个有子女的家庭均有权为每个子女领取**儿童津贴**（*Kindergeld*），直至其 18 岁生日（如果子女仍在接受教育，则延至 25 岁生日）。目前，对于第一个孩子和第二个孩子，每月的补贴金额略低于 200 欧元，而对于第三个孩子，补贴会稍高一些，且随后每多一个子女，补贴都会有所增加。此外，收入超过一定标准的父母有权获得税收补贴。同时，还有为单亲父母和低收入父母提供的额外资助（以收入状况调查为基础的津贴）。

自 2007 年以来，德国的家庭政策已经逐渐向北欧国家的一揽子政策靠拢。与此同时，德国时期总和生育率保持稳定，在 2013-2016 年间呈现一定程度的增长趋势（图 21）。这些趋势可归因于不同因素，包括新移民的高生育率（Pötzsch2018），但政策改革提高了高学历女性在晚育年龄的生育率（Bujard & Passet, 2013; Wang, 2018）。

本专栏主要基于 Radenacker et al.的报告（2014）。

图 21 2002-2018 年德国 0-2 岁儿童公共儿童托育覆盖率（虚线）和总和生育率



资料来源：2002-2003 年和 2018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及德国联邦统计局（不同出版物）；2006-17 年数据：BMFSFJ（2018：图 4）。时期总和生育率（TFR）：人类生育数据库（2019）及欧盟统计局（2019）。

较之有些国家实行涵盖多种政策工具并解决家庭多种社会需要的一揽子家庭政策，一些国家主要集中于扩大单一的政策措施。例如，东欧国家最近扩大了对家庭的财政扶持。这些政策包括俄罗斯的扩大的现金转移支付（孕产资本，专栏 6）、匈牙利家庭福利扩大和大家庭税收减免，以及波兰的“家庭 500+”计划。这些政策对一些家庭需求作出回应，因为资金紧缺已经成为该地区组建家庭的重要障碍之一（Marczak et al., 2018）。然而，较高的现金转移不太足以对生育决策起到支持作用。这些政策很可能会有助于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经济资源有限的人群。但是这些政策对于其他人群，即那些需要兼顾儿童托育和有偿工作、以及难以获得合适住房的人们的影响不大。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受过高等教育的母亲很少愿意长期有职业断层，因此上述政策对其支持较小，且子女出生后，由于父亲可能无法拒绝雇主提出的长时间、不灵活的工时要求，因此上述政策对父亲的支持也同样较小。

5. 政策对生育的影响：结论性讨论和未来研究展望

5.1 家庭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政策的不稳定性和财政的可持续性

家庭政策的朝令夕改和经常性取消会使其无法预测、不可靠且令人困惑，极可能对生育率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在对家庭提供相对慷慨资助的国家也是如此。Spéder (2016) 记录了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崩溃后匈牙利家庭政策出现的上述转变。在1990年至21世纪头十年，历届政府都试图在家庭政策上留下其意识形态印记，但同时也需要解决预算限制问题，尤其是在 1995 年和 2009 年大幅削减福利的财政紧缩时期。尽管匈牙利在家庭支出方面保持较高水平，但政策的变化和政策方案的取消已对那个时期的生育率产生了负面影响（Spéder, 2016; Aassve et al., 2006）。预算削减常常使全国性政策按照收入调查结果实行或以其他标准为条件，这会使福利水平降低，或使得某些专项计划被完全取消。在 2008 年之后的经济衰退期间，当时许多国家政府均采取了这种财政削减政策以减少不断膨胀的预算赤字。（参见 2014 年 OECD 表 1.2 中的政策变化列表）。例如，由于经济形势迅速恶化，西班牙从 2007 年 7 月开始实施的为每对新生儿父母发放 2500 欧元的“生育津贴”政策，在短短几年后的 2011 年 1 月便取消了。

明确的生育政策未必最具影响力

支持儿童和家庭的政策显然至关重要，但与家庭无直接关系的其他因素和政策常可能对生育决策产生更大的影响。在年轻男女处于相当大的经济不确定性的国家中，正如过去十年间南欧的情况，即使国家开始大规模扩张其家庭政策，也不太可能看到生育率出现大幅上升趋势。更具政策挑战性的是苛刻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传统的性别规范和与儿童在受教育进程中取得优异成绩承受的巨大压力相互混杂，类似情况在东亚国家，尤其是韩国，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e.g., Rindfuss et al., 2004; Anderson & Kohler, 2013; Raymo et al., 2015; Myong et al., 2018）。在这种状下，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可能需要更大范围的制度改革，要应对劳动力市

场规则、文化、教育体制和性别不平等带来的挑战。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尽管韩国政府在 21 世纪头 10 年执行大量旨在延长产假、扩大家庭福利和儿童托育覆盖的改革，但仍出现生育率下降至极低水平的现象。（Tsuya, 2015; Adema et al., 2017; Lee, 2018）。

政策兼容性

虽然家庭政策最好被视为更广泛的“一揽子计划”，但这一一揽子计划可能并不平衡，因为现有的政策是由长期以来的倡议、改革和变革造成的，而这些倡议、改革和变革往往是由不同的部委或负责机构在没有太多协调的情况下提出的。一些纸面上看起来很好的政策，如果与其他政策措施配合不好，效果可能不大。不同的政策要素如何结合在一起并与更广泛的社会制度相联系，可能比政策支持的总体水平更为重要（McDonald，2002）。在极端情况下，旨在强迫生育行为而不是增强生育内在动机的政策干预最终可能会降低人们的自主意识，使他们的生育能力越来越依赖于外部刺激（Botev，2015；另参见专栏 8 中欧和东欧的历史政策）。

不连贯的政策措施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儿童托育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如今，许多国家提供了灵活的育儿假，允许父母在子女出生后选择一段时间留在家中照顾子女。然而，有限的公共儿童托育服务和缺乏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可能导致这种选择的价值有限。例如，捷克有一项产假计划，为父母在家陪伴子女的时长以及伴侣间如何分享假期方面提供相当大的灵活性（专栏 5），然而大多数家庭选择了传统的解决方案：母亲休很长时间的育儿假，通常持续至子女三岁生日。对妇女来说，较早重返就业岗位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三岁以下儿童的公共儿童托育服务提供得非常少，捷克性别薪酬差距是欧洲最高国家之一，并且劳动力市场更倾向于全职工作（Sobotka，2016）。

政策（无）目标性

在许多国家，家庭政策因家庭中子女的数量或出生顺序而异。这通常是由于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子女的大家庭成本较高，贫困程度较高（OECD，2011）。但这些政策也可能有明确的人口目标，如俄罗斯旨在鼓励父母生育第二胎的“孕产

资本”政策（专栏 6）。然而，由于组建家庭的主要障碍之一是有限的住房供应和负担能力，这些政策丝毫不能影响首次生育的提高。因此，在计划组建家庭女性和男性的生命早期阶段，往往更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如“孕产资本”。

此外，政策也可能与未来父母对生育障碍和壁垒的感知有所偏离，也可能忽视特定人群（未婚夫妇、单亲父母、同性伴侣、经济处于弱势的家庭）。东亚国家的家庭政策是这一局限性的实例，其政策要么侧重于为已婚女性和夫妻提供福祉和服务，要么旨在支持未婚女性结婚。另一个例子是德国现行的有利于已婚夫妇收入分配的税收政策。这一政策体系支持性别分工，歧视未婚夫妇，这与近四十年来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化是不相容的，例如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加，大量就业，以及逃避婚姻。

道德考量因素：反映家庭多样性和生育权利的家庭政策

现代家庭政策必须具有非强制性，应充分支持个人生殖权利，并允许人们作出知情的生殖决策。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2018：7）强调，179 个国家政府通过了 1994 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他们一致认为，所有夫妇和个人都应掌握信息和手段，自由和负责任地决定子女的数量、生育间隔和生育时间。过去实施的一些政策侵犯了个人的生殖权利，例如限制现代避孕方法的信息和提供（参见专栏 8 中罗马尼亚实例）。目前，许多国家与家庭有关的政策接受关于家庭和生活安排的规范标准，只向特定家庭提供支持，例如向已婚或异性夫妇提供资助，因此政策对于某些人口群体仍存在歧视性。这种标准在有关补贴和提供辅助生殖的条例中较为常见（Berg Brigham et al,，2013）。随着家庭变得越来越多样化，选择标准既歧视了部分个人和夫妇，也减少了政策对于他们生育决策的潜在影响。过去就业的规则是另一个选择性问题的实例。在韩国，只有在国家就业保险基金投保的就业女性才可享受产假计划和其他一些福利。约有三分之一的就业女性不符合条件，她们通常从事非正规或兼职工作（Adema et al., 2017：18-19）。

我们的报告涵盖了关于家庭政策、家庭政策的发展、跨国多样性及其对生育率影响的大量实证证据。然而，政策也具有主观和高度象征性特点。通过制定家庭政策，政府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政府关心家庭和他们的福祉。从理论

上讲, 这种象征性的表述可以使规模相对较小甚至具有象征意义的政策在心理上变得尤为重要，并取得“超预期效果”。

家庭政策的具体设计和变化同时也提供了有关理想的、规范的和预期的行为线索。归根结底，家庭政策的效果和成功，无论大小，部分取决于这些政策是否以及如何被家庭接受、支持和使用，以及政策是否符合他们的期望。正如 Neyer 和 Andersson 所指出的（2008：703-704）：

“【家庭政策】总是作用于两个层面：事实层面和感知层面。家庭政策对实际行为的潜在影响取决于人们对政策的看法，以及它对他们当前和未来生活进程的影响。（……）因此，研究家庭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需要考虑家庭政策的规范性或象征性内涵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对应关系。”

致谢

非常感谢 Michael Herrmann 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其他同事对于本报告的支持和在报告初稿起草阶段给予意见和反馈。同时感谢 Kryštof Zeman 与我们分享了他计算的进度与孩次调整总和生育率（adjTFRp）。

参考文献

Aassve, A., F. C. Billari, and Z. Spéder. 2006. “Societal transition, policy changes and family formation: Evidence from Hungary”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2(2), 127-152.

Aassve, A. and Lappegård, T. 2009. Childcare cash benefits and fertility timing in Norway.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5(1), 67-88.

Āboliņa, L. 2015. Family Policies: Latvia (2015). PERFAR. Population Europe Resource Finder and Archive. Accessed in April 2019 at https://www.perfar.eu/policy/family-children/latvia .

About Hungary. 2019. Prime Minister’s Viktor Orbán’s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About Hungary*, 11 February 2019. URL: http://abouthungary.hu/state-of-the-nation-address/ (accessed 3 March 2019).

Acker, J. 1990. Hierarchies, jobs, bodies: A theory of gendered organisations. *Gender & Society*, 4(2), 139-158.

Adema, W., Clarke, C., Shin, E. K., and Thévenon. O. 2017. *Family benefits in Korea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Paris: OECD, Social Policy Division.

Adserà, A. 2004. Changing fertility rat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impact of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7(1), 17-43.

Adserà, A. 2005. “Vanishing children: From high unemployment to low fertility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95(2), 189-193.

Adserà, A. 2011. Where are the babies? Labor market conditions and fertility i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7(1), 1-32.

Adserà, A. 2017. Education and fertility in the context of rising inequality.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2017(15): 63-92.

Anderson, T. and H.-P. Kohler. 2013. Education fever and the East Asian fertility puzzle: A case study of low fertility in South Korea.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9(2): 196-215.

Andersson, G. 2004. Childbearing developments in Denmark, Norway, and Sweden from the 1970s to the 1990s: A comparison. *Demographic Research*, Special Collection 3(7), 155-176.

Andersson, G. , J. Hoem, A.-Z. Duvander. 2006. Social differentials in speed-premium effects in childbearing in Sweden. *Demographic Research*, 14(4), 51-70.

Anttonen, A. and Sipila, J. 1996. European social care services: Is it possible to identify models?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6(2), 87-100.

Anson, J. and Ajayi, A.A. 2018. Israel’s fertility: a continuing enigma. Ch. 10 in Gietel-Basten, S. et al. (eds.) *Family Demography in Asi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pp. 153-170.

Aurini, J. and Davies, S. 2005. Choice without markets: homeschooling in the context of private edu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6(4), 461-474.

Autor, D., Kearney, M. S. and Katz, L. F. 2006.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U.S. Labor Marke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96(2), 189-94.

Autor, D.H. and Dorn, D., 2009. Inequality and specialization: the growth of low-skill service jobs in the United States.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15150.

Azmat, G. and González, L. 2010. Targeting fertility and female participation through the income tax. *Labour Economics*, 17(3), 487-502.

Baban, A. 1999. "Romania". In.: H. P. David (ed.) *From abortion to contraception. A resource to public policies and reproductive behavior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from 1917 to the present*.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ecticut, pp. 191-221.

Baizán, P. 2009. Regional child care availability and fertility decisions in Spain. *Demographic Research*, 21, 803-842.

Baizán, P., Arpino, B. and Delclòs, C. E. 2016. The effect of gender policies on fertility: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ducation and normative context.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32(1), 1-30.

Balbo, N., Billari, F.C. and Mills, M. 2013. Fertility in advanced societies: a review of research.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9(1), 1-38.

Barbieri, P., Bozzon, R., Scherer, S., Grotti, R. and Lugo, M. 2015. The rise of a Latin model? Family and fertility consequences of employment instability in Italy and Spain. *European societies*, 17(4), 423-446.

Basten, S., Sobotka, T. and Zeman, K. 2014. Future fertility in low-fertility countries. Ch. 3 in Lutz, W., Butz, W.P. and K.C., S. (eds.) *World Population and Human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9-146.

BBC News, 11 February 2019. Hungary tries for baby boom with tax breaks and loan forgiveness. URL: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47192612 (accessed 15 February 2019).

Beaujouan, É. and Berghammer, C. 2019. The Gap Between Lifetime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Completed Fertility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Cohort Approach.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advanced online access; https://doi.org/10.1007/s11113-019-09516-3

Beaujouan, É. and Sobotka, T. 2019. Late childbearing continues to increas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Population & Societies* 562 (January 2019); URL: https://www.ined.fr/fichier/s_rubrique/28820/562.ang.web_1.en.pdf .

Begall, K. and Mills, M. 2011. The impact of subjective work control, job strain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on fertility intentions: a European comparis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7(4), 433-456.

Berg Brigham, K., Cadier, B. and Chevreul, K. 2012. The diversity of regulation and public financing of IVF in Europe and its impact on utilization. *Human Reproduction*, 28(3), 666-675.

Berghammer, C. 2014. The return of the male breadwinner model? Educational effects on parents' work arrangements in Austria, 1980–2009.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28(4), 611-632.

Berrington, A. 2004. Perpetual postponers? Women's, men's and couples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subsequent fertility behaviour. *Population Trends* 117 (Autumn 2004), 9-19.

Bianchi, S. 2000. Maternal employment and time with children: Dramatic change or surprising continuity? *Demography*, 37(4), 401-414.

Biin, H. 2017. Estonia: Reform of the parental leave and benefit system to better reconcile work and family life. European Commission, *ESPN Flash Report* 2017/62 (July 2017).

Billari, F. C. 2018. A 'Great Divergence' in fertility?" In Poston, D. L. Jr. (ed.) *Low Fertility Regimes and Demographic and Societal Change*. Springer: Cham, pp. 15-35.

81Billingsley, S. 2010. The post-communist fertility puzzle.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9(2), 193-231.

Billingsley, S., Neyer, G. and Wesolowski, K. 2018.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policies on womens childbearing: A longitudinal micro-data analysis of 21 countries. *Stockholm Research Reports in Demography* 2018:19.

Billingsley, S. and Ferrarini, T. 2014. Family policy and fertility intentions in 21 European countr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6(2), 428-445.

Birenbaum-Carmeli, D. 2016. Thirty-five years of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in Israel. *Reproductive Biomedicine & Society Online*, 2, pp.16-23.

Biryukova, S., Sinyavskaya, O. and Nurimanova, I. 2016. Estimating effects of 2007 family policy changes on probability of second and subsequent births in Russia.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Research Paper* No. WP BRP 68/SOC/2016.

Björklund, A. 2006. Does Family Policy Affect Fertility? Lessons from Sweden.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9(1), 3-24.

Blum, S., Koslowski, A., Macht, A and Moss, P. 2018 *14th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eave Policies and Related Research 2018*. International Network on Leave Policies & Research. URL: https://www.leavenetwork.org/leave-policies-research/reviews-2018/ (accessed in January 2019).

Blumenauer, V., Czeromin, U., Fehr, D., Fiedler,K., Gnoth,C., Krusel, J.-S., Kupka, M. S., Ott, A., and Tandler-Schneider, A. 2018. D·I·R Annual 2017 – The German IVF-Registry. *Journal Reproduktionsmed Endokrinol_Online* 2018; 15(5–6), 216-249.

BMFSFJ. 2018. Kindertagesbetreuung Kompakt. Ausbaustand und Bedarf 2017. [Daily Childcare. Coverage and Demand 2017]. Berlin: The Federal Ministry for Family Affairs, Senior Citizens, Women and Youth (BMFSFJ). https://www.bildungsserver.de/onlineressource.html?onlineressourcen_id=59574

Boccuzzo, G., Caltabiano, M., Dalla Zuanna, G. and Loghi, M. 2008. The impact of the bonus at birth on reproductive behaviour in a lowest-low fertility context: Friuli-Venezia Giulia (Italy), 1989-2005.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2008(Vol. 6), 125-147.

Bongaarts, J. 2002. The end of the fertility transition in the developed world.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8(3), 419-443.

Bongaarts, J. and Feeney, G. 1998. On the quantum and tempo of fertili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4(2), 271-291.

Bongaarts, J. and Sobotka, T. 2012. A demographic explanation for the recent rise in European fertili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8(1), 83-120.

Botev, N. 2015. Could Pronatalist Policies Discourage Childbearing?.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1(2), 301-314.

Brandth, B. and Kvande, E. 2009. Gendered or gender-neutral care politics for father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24, 177-189.

Brewer, M., Ratcliffe, A. and Smith, S. 2012. Does welfare reform affect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the UK.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5(1), 245-266.

Brinton, M. 2019. Sharing burdens a remedy for falling birthrates. *East Asia Forum Quaterly* 11(1): 3- 5. https://press-files.anu.edu.au/downloads/press/n5214/pdf/book.pdf

Budig, M. J., Misra, J. and Boeckmann, I. 2012. The motherhood penalty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importance of work–family policies and cultural attitudes. *Soci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 State & Society*, 19(2), 163-193.

Bujard, M. and Passet, J. 2013. Wirkungen des Elterngelds auf Einkommen und Fertilität. *ZfF–Zeitschrift für Familienforschung/Journal of Family Research*, 25(2), 212-237.

Bumpass, L.L., Rindfuss, R.R., Choe, M.K. and Tsuya, N.O. 2009.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low fertility: the case of Japan.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5(3), 215-235.

Büttner, T. and Lutz, W. 1990. Estimating fertility responses to policy measures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6, 539-555.

Byron, K. 2005.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its antecedent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67(2), 169-198.

Cabinet Office, Government of Japan 2016. *A 2016 Declining Birthrate White Paper (Summary)*. URL: https://www8.cao.go.jp/shoushi/shoushika/whitepaper/measures/english/w-2016/index.html (accessed 20 March 2019).

Cabinet Office, Government of Japan 2017. *A 2017 Declining Birthrate White Paper (Summary)*. URL: https://www8.cao.go.jp/shoushi/shoushika/whitepaper/measures/english/w-2017/index.html (accessed 20 March 2019).

Cabinet Office, Government of Japan 2018. *A 2018 Declining Birthrate White Paper (Summary)*. URL: https://www8.cao.go.jp/shoushi/shoushika/whitepaper/measures/english/w-2018/index.html (accessed 20 March 2019).

Caldwell, J.C. 2004. Social upheaval and fertility decline.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29(4), 382-406.

Canning, D. 2011. Review Essay: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Studies*, 65(3), 353-361.

CSCC. 2012.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of Latvia for 2014–2020.* Riga: Cross-Sectoral Coordination Centre (CSCC). URL: *https://rio.jrc.ec.europa.eu/en/library/national-development-plan-latvia-2014-2020*

CDC 2017. *2015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National Summary Report.* Atlanta (GA):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US Dep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FE database. 2018. *Cohort Fertility and Education database*. URL: http://www.cfe-database.org .

Cha, Y. 2010. Reinforcing separate spheres: The effect of spousal overwork on men's and women's employment in dual-earner househo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5(2), 303-329.

Cha, Y. 2013. Overwork and the persistence of gender segregation in occupations. *Gender & Society*, 27(2), 158-184.

Chen, D.L., 2011. Can countries reverse fertility decline? Evidence from France's marriage and baby bonuses, 1929–1981.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18(3), 253-272.

Cipollone, A., Patacchini, E. and Vallanti, G. 2014. Female labour market participation in Europe: novel evidence on trends and shaping factors. *IZA Journal of European Labor Studies*, 3:18, 1-40.

Clark, W.A. 2012. Do women delay family formation in expensive housing markets? *Demographic Research* 27(1): 1-24.

Cohen, A., Dehejia, R. and Romanov, D. 2013. Financial incentives and fertilit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5(1), 1-20.

Comolli, C.L. 2017. The fertility response to the Great Recession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ructural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perceived economic uncertainty. *Demographic Research* 36(51), 1549-1600.

Connolly, M.P., Griesinger, G., Ledger, W. and Postma, M.J. 2009. The impact of introducing patient co-payments in Germany on the use of IVF and ICSI: a price-elasticity of demand assessment. *Human Reproduction*, 24(11), 2796-2800.

Connolly M.P., Hoorens, S., and Chambers, G. M. 2010.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Human Reproduction Update* 16(6), 603-613.

Cooke, L. P. and Baxter, J. 2010. "Families" in international context: comparing institutional effects across western societ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2(3), 516-536.

Council of Europe. 2006. *Recent Demographic Developments in Europe 2005*. Str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 Publishing.

Cygan-Rehm, K. 2016. Parental leave benefit and differential fertility responses: Evidence from a German reform.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9(1), 73-103.

D'Addio, A. C. and d'Ercole, M. M. 2005. Trends and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 rates in OECD countries: The role of policies, *OECD Soci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Working Paper* No.27.

David, H. P. (ed.). 1999. *From Abortion to Contraception. A Resource to Public Policies and Reproductive Behavior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from 1917 to the Present*.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Davies, A. R. and Frink, B. D. 2014. The origins of the ideal worker: The separation of work and h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Market Revolution to 1950. *Work and Occupations*, 41(1), 18-39.

De Geyter, C., Calhaz-Jorge, C., Kupka, M.S., Wyns, C., Mocanu, E., Motrenko, T., Scaravelli, G., Smeenk, J., Vidakovic, S. and Goossens, V. 2018. ART in Europe, 2014: results generated from European registries by ESHRE. *Human Reproduction*, 33(9), 1586-1601.

De Henau, J., Meulders, D. and O'Dorchai, S. 2011. Maybe baby: Comparing partnered women's employment and child policies in the EU-15. *Feminist Economics*, 16, 43-77.

Del Boca, D. and Pasqua, S. B. 2005. Labour supply and fertility in Europe and the US. In: Boeri, T., Del Boca, D. and Pissarides, C. (eds), *Women at Work.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A Report for the Fondazione Rodolfo Debenedett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1-153.

DellaPergola, S. 2009. Actual, intended, and appropriate family size among Jews in Israel. *Contemporary Jewry*, 29(2), 127-152.

Demoskop. 2014. По мнению Лукашенко, "тот, кто имеет одного ребёнка - это просто безумец!" Demoskop Weekly No. 607-608; http://www.demoscope.ru/weekly/2014/0607/panorm01.php#1 .

Den Dulk, L., Groeneveld, S. and Peper, B. 2014. Workplace worklife balance support from a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 In Hobson, B. (ed), *Worklife balance: the agency and capabilities ga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53-173.

Diprete, T. A., Morgan, S. P., Engelhardt, H. and Pacalova, H. 2003. Do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costs of children generate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fertility rates?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2(5), 439-477.

Drago, R., Sawyer, K., Shreffler, K. M., Warren, D. and Wooden, M. 2011. Did Australia's baby bonus increase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births?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30(3), 381-397.

Duvander, A.-Z. and Andersson, G. 2006. Gender equality and fertility in Sweden.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39(1-2), 121-142.

Duvander, A.-Z. and Haas, L. 2018. Sweden. In Blum, S., Koslowski, A., Macht, A. and Moss, P. (ed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eave Policies and Research* 2018. URL: https://www.leavenetwork.org/fileadmin/user_upload/k_leavenetwork/country_notes/2018/FINAL.Sweden2018.pdf (accessed in March 2019).

Duvander, A.-Z. and Jans, A.-C. 2009. Consequences of father s parental leave use: evidence from Sweden. *Finnish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2009, 49-62.

Duvander, A.-Z. and Johansson, M. 2012. What are the effects of reforms promoting fathers' parental leave use?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2(3), 319-330.

Duvander, A.-Z., Lappegård, T. and Andersson, G. 2010. Family policy and fertility: fathers' and mothers' use of parental leave and continued childbearing in Norway and Sweden.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0(1), 45-57.

Earles, K. 2014. Swedish family policy –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Nordic welfare state model.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45(2), 180-193.

Eijkemans, M.J.C., Lintsen, A.M.E., Hunault, C.C. Bouwmans, C.A.M., Hakkaart, L., Braat, D.D.M. and Habbema, J.D.F.. 2008. Pregnancy chances on an IVF/ICSI waiting list: a national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Human Reproduction* 23(7), 1627–1632.

Ekert-Jaffé, O., Joshi,H., Lynch, K., Mougin, R., and Rendall, M. 2002. Fertility, timing of births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in France and Britain. *Population-E 57*(3), 475-508.

Elizarov, V. and Levin, V. 2015. Russian Federation Ageing Project. Family Policies in Russia: Could Efforts to Raise Fertility Could Slow Population Ageing?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WPS 7419,*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Engel, A, W. S. Barnett, Y. Anders, M. Taguma. 2017.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Policy Review – Norway. OECD Publishing.

ESHRE. 2010.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edically assisted reproduction in the EU: Regulation and technologies. Final report. European Society of Human Reproduction and Embryology (ESHRE). URL: https://ec.europa.eu/health/sites/health/files/blood_tissues_organs/docs/study_eshre_en.pdf (accessed in April 2019).

ESHRE. 2017. Regulation and legislation in assisted reproduction. *ESHRE Fact Sheets 2*; European Society of Human Reproduction and Embryology (ESHRE). URL: www.eshre.eu/- /media/sitecore-files/Press-room/Resources/2-Regulation.pdf (accessed in April 2019).

Esping-Andersen, G.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Cambridge.

Esping-Andersen, G. 1999.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sping-Andersen, G. 2009. *The Incomplete Revolution. Adapting to Women's new Rol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Esping-Andersen, G. and Billari, F. C. 2015. Re-theorizing family demographic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1(1), 1-31.

European Cities Report. 2018. Assessing residential property market conditions across Europe's big cities. Knight Frank LLP.URL: https://content.knightfrank.com/research/635/documents/en/european-cities-review-2018 - 5810.pdf (accessed in January 2019).

Eurostat. 2018. Data on fertility rates by age and period total fertility rates. Eurostat online database, theme "Population and Social Conditions". Accessed in February 2019 at http://ec.europa.eu/eurostat/data/database.

Evertsson, M. and Duvander, A.-Z. 2011. Parental leave - possibility or trap? Does family leave length affect Swedish women's labour market opportunitie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4), 435- 450.

Fagnani, J. and Math, A. 2008. Policy packages for families with children in 11 European countries: Multiple approaches. In *Childhood: Changing Contexts*.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pp. 55-78.

Fahlén, S. and Oláh, L.S. 2018. Economic uncertainty and first-birth intentions in Europe. *Demographic Research*, 39(28), 795-834.

Farré, L. and Gonzalez, L. 2019, Does Paternity Leave Reduce Fertility?.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12023*. URL: https://ssrn.com/abstract=3318797

Ferrarini, T. and Duvander, A.-Z. 2009. Swedish Family Policy controversial reform of a success story.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Nordic countries, 3/2009. URL: https://library.fes.de/pdffiles/bueros/stockholm/06527.pdf

Feyrer, J., Sacerdote, B. and Stern, A.D. 2008. Will the stork return to Europe and Japan? Understanding fertility within developed n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2(3), 3–22

Fisher, K. and Robinson, J. 2011. Daily life in 23 countri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01(2), 295-304.

Frejka, T. 1980. Fertility trends and policies: Czechoslovakia in the 1970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6(1), 65-93.

Frejka, T. 1983. Induced abortion and fertility: A quarter century of experience in Eastern Europ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9(3), 494-520.

Frejka, T., Hoem, J.M., Sobotka, T. and Toulemon, L. 2008. Childbearing trends and policies in Europe. *Demographic Research, Special Collection* 7, Vol. 19(8): 1-1178.

Frejka, T. and Gietel-Basten, S. 2016. Fertility and family polic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fter 1990. *Comparative Population Studies* 41(1, 2016), 3-56.

Frejka, T. and Sobotka, T. 2008. Fertility in Europe: Diverse, delayed, and below replacement. *Demographic Research*, *Special Collection* 7, 19(3), 15-46.

Frejka, T. and Zakharov, S. 2013. The apparent failure of Russia's pronatalist family polici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9(4), 635-647.

Gábos, A., Gál, R. I. and Kézdi, G. 2009. The effects of child-related benefits and pensions on fertility by birth order: A test on Hungarian data. *Population Studies*, 63(3), 215-231.

Gans, J. S. and Leigh, A. 2009. Born on the first of July: An (un)natural experiment in birth timing.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3(1), 246-263.

Garganta, S., Gasparini, L., Marchionni, M. and Tappatá, M. 2017. The effect of cash transfers on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Argentina.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36(1), 1-24.

Gauthier, A. H. 1996. *The State and the Famil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amily Policies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Gauthier, A.H. 2007. The impact of family policies on fertility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6, 232-346.

Gauthier, A.H., Smeeding, T.M. and Furstenberg, F.F. 2004. Are parents investing less time in children? Trends in selected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0(4), 647-672.

Geisler, E. and Kreyenfeld, M. 2019. Policy reform and fathers' use of parental leave in Germany: The role of education and workplace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9(2), 273- 291.

Gheţău, V 1997. Evoluţia fertilităţii în România de la transversal la longitudinal. [Fertility trends in Romania. From period to cohort analysis]. *Revista de Cercetări Sociale* 1/1997: 1-85.

Goldin, C. 2006. The quiet revolution that transformed women's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fami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2), 1-21.

Goldin, C., Katz, L. F. and Kuziemko, I. 2006. The homecoming of American college women: The reversal of the gender gap in colleg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 133-156.

Goldscheider, F. 2000. Men, children and the future of the family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Futures*, 32(6), 525-538.

Goldscheider, F., Bernhardt, E. and Lappegård, T. 2015. The Gender Revolution: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hanging family and demographic behavi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1(2), 207-239.

Goldstein, J. R., Sobotka, T, and Jasilioniene, A. 2009. The end of lowest-low fertili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5(4), 663-700.

Goldstein, J. R., Koulovatianos, C., Li, J. and Schröder, C. 2017. Evaluating how child allowances and daycare subsidies affect fertility. Centre for Financial Studies, *CFS Working Paper Series* 568.

González, L. 2013. The effects of a universal child benefit on conceptions, abortions and early maternal labor supply.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5(3): 160-188.

Goos, M., Manning, A. and Salomons, A. 2014. Explaining job polarization: Routine-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offshor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8), 2509-26.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2013. A sustainable Population for a dynamic Singapore (Population White Paper). Singapore: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Talent Division, Prime Minister's Office. URL:

https://www.strategygroup.gov.sg/media-centre/population-white-paper-a-sustainablepopulation-for-a-dynamic-singapore (accessed 3 March 2019).

Grant, J., Hoorens, S., Gallo, F. and Cave, J. 2006. Should ART be part of a population policy mix?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the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impact of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RAND Europe Documented Briefings*. URL: https://www.rand.org/pubs/documented_briefings/DB507.html

Guardian/AFP. 2016. Turkish president says childless women are 'deficient, incomplete'. *The Guardian (Agence France-Presse)* 5 June 2016; URL: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jun/06/turkish-president-erdogan-childlesswomen-deficient-incomplete (accessed in January 2019).

Gunnarsson, L., Martin Korpi, B. and Nordenstam, U. 1999.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Policy in Sweden*. OECD: Background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OECD Thematic Review.

Haan, P. and Wrohlich, K. 2011. Can child care policy encourage employment and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a structural model. *Labour Economics*, 18(4), 498-512.

Haas, L. and Hwang, C. P. 2008. The impact of taking parental leave on fathers' participation In childcare and relationships with children: Lessons from Sweden. *Community, Work & Family*,
11(1), 85-104.

Haas, L. and Hwang, C. P. 2019. Policy is not enough – the influence of the gendered workplace on fathers' use of parental leave in Sweden. *Community, Work & Family*, 22(1), 58-76.

Habbema, J.D.F., Eijkemans, MJC, Nargund, G., Beets, G., Leridon, H., and te Velde, E.R.2009. The effect of in vitro fertilization on birth rates in western countries. *Human Reproduction* 24(6), 1414-1419

Hays, S. 199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Hakkert, R. 2014. *Population Policies in Low-Fertility Contexts: Elements to Consider in Policy Dialogue with Governments*. Report, UNFPA Regional Office for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Hank, K. and Kreyenfeld, M. 2003.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child care and women's fertility decisions in Western German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5, 584-596.

Harknett, K., Billari, F. C. and Medalia, C. 2014. Do family support environments influence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20 European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30(1), 1-33.

Hays, S. 199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eitlinger, A. 1979. *Women and State Socialism: Sex Inequality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zechoslovakia*.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Hilgeman, C. and Butts, C. T. 2009. Women's employment and fertility: A welfare regime paradox.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8(1), 103-117.

Hill, E. J., Erickson, J. J., Holmes, E. K. and Ferris, M. 2010. Workplace flexibility, work hours, and work-life conflict: Finding an extra day or two.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4(3), 349-358.

Hirschman, C. 1994. Why fertility chang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994), 203-233.
Hobson, B., Fahlen, S. and Takacs, J. 2011. Agency and capabilities to achieve a work-life balance: A comparison of Sweden and Hungary. *Soci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 State & Society*, 18(2), 168-198.
Hook, J. L. 2010. Gender inequality in the Welfare State: Sex segregation in housework, 1965–2003.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5(5), 1480-1523.
Hoorens, S., Gallo, F. Cave, J.A.K. and Grant, J.C. 2007. Can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help to offset population ageing? An assessment of the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impact of ART in Denmark and UK. *Human Reproduction* 22(9), 2471-2475.
Human Fertility Database. 2019. Period total fertility rates and age-specific fertility rates, cohort data on women by the number of children ever born.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Demographic Research (Germany) and Vienna Institute of Demography (Austria). www.humanfertility.org , accessed in
January 2019. Jalovaara, M., Neyer, G., Andersson, G., Dahlberg, J., Dommermuth, L., Fallesen, P., ans Lappegård, T. 2018. Education, gender, and cohort fertility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Online first); https://doi.org/10.1007/s10680-018-9492-2.
Japan Times. 2019. Japan debuts legal cap on long work hours under labor reform law, but for now only big firms affected. *Japan Times* / Kyodo, 1 April 2019. URL: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9/04/01/business/japan-debuts-legal-cap-lng-workhours-labor-reform-law-now-big-firms-affected/#.XOQEbCBS9aR (accessed 5 April 2019).
Javornik, J. 2014. Measuring state de-familialism: Contesting post-socialist exceptionalism.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4(3), 240-257.
Jones, G.W. and Gubhaju, B. 2010. Factors influencing changes in mean age at first marriage and proportions never marrying in the low-fertility countri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5(3), 237-265.
Kalwij, A. S. 2010. The impact of family policy expenditure on fertility in Western Europe. *Demography*, 47(2), 503-519.
Kamerman, S.B. and Kahn, A.J., 1978. *Family Policy: Government and Families in Fourteen Count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an, M. Y., Sullivan, O. and Gershuny, J. 2011. Gender convergence in domestic work: Discerning the effects of interac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barriers from large-scale data. *Sociology*, 45(2), 234-251.
Kanjuo-Mrčela, A. and Cernigoj Sadar, N. 2011. Social policies related to parenthood and capabilities of Slovenian parents. *Soci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 State & Society*, 18(2), 199- 231.
Karmasin, S. 2016. Familienfreundlichkeits-Monitor 2016. [Family-friendliness Monitor]. Vienna: Federal Ministry for Women, Families, and Youth (BMFJ). URL: https://www.bmfj.gv.at/dam/jcr:7896594e-2098-45c7-9d56-d4e1ce606907/Familienfreundlichkeits-Monitor%202016.pdf (accessed in January 2017).

Katz, L. F. and Krueger, A. B. 2016. The rise and nature of alternative work arrang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5-2015.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2667.

Kim, E. H.-W. 2018. Low fertility and gender inequity in developed Asian countries.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14(2), 113-115.

Klingman, G. 1998. *The Politics of Duplicity. Controlling Reproduction in Ceausescu's Romania*.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ohler, H.-P., Billari, F.C., and Ortega, J.A. 2002. The emergence of lowest-low fertility in Europe during the 1990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8(4), 641-680.

Kravdal, Ø. 1996. How the local supply of day-care centers influences fertility in Norway: A parityspecific approach.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15(3), 201-218.

Kreyenfeld, M. 2004. Fertility decisions in the FRG and GDR: An analysis with data from the German Fertility and Family Survey. *Demographic Research*, *Special Collection* 3(11), 275-318.

Kreyenfeld, M. 2010. Uncertainties in female employment careers and the postponement of parenthood in Germany.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3), 351-366.

Kučera, M. 2008. Padesát let hodnocení populačního vývoje České republiky. [Fifty years of assessments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s in the Czech Republic]. *Demografie* 50(4): 230-239.

Lalive, R. and Zweimueller, J. 2009. How does parental leave affect fertility and return to work? Evidence from two natural experiment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3), 1363-1402.

Lareau, A. 2002. Invisible inequality: Social class and childbearing in black families and white famil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5), 747-776.

Lee, D. 2018. The evolution of family policy in South Korea: From Confucian familism to Neo‐familism. *Asian Social Work and Policy Review*, 12(1), 46-53.

Lee, S. 2015. The 3rd Plan for Low Fertility and Ageing Society in Korea: Last chance to recover from the ultra-low fertility tren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KIHAS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merging Issues in Low Fertility and Ageing Societies*, Seoul, 14 December 2015.

Lee, S., Duvander, A.-Z. and Zarit, S. H. 2016. How can family policies reconcile fertility and women's employment? Comparisons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Sweden. *A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22(3), 269-288.

Lee, S. and Choi, H. 2015. Lowest-low fertility and policy responses in South Korea. In: Rindfuss, R.R. and Choe, M.K. (eds.) *Low and Lower Fertility*.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pp. 107-123.

Legisl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Belarus. 2011.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от 11.08.2011№357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рограммы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на 2011 - 2015 годы". [Decre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Belarus No. 357 from 11 August 2011 "National Programme of Demographic Security of the Republic of Belarus in 2011-2015." URL: http://pravo.newsby.org/belarus/ukaz0/uk701.htm

Lei, X. 2017. “What we want is to be happy rather than marrying”: Exploring Japanese single women’s perceptions on marriag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Advanced Japanese Studies* 9, 15-29.

Lesthaeghe, R. 2010. The unfolding story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6(2), 211-251.

Letablier, M.-T. 2003. Fertility and family policies in France. *Journal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Population)*, Supplement to Volume 1 : 245-261.

Levine, H., Jørgensen, N., Martino-Andrade, A., Mendiola, J., Weksler-Derri, D., Mindlis, I., Pinotti, R. and Swan, S.H. 2017. Temporal trends in sperm count: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regression analysis. *Human Reproduction Update*, 23(6), 646-659.

Lidové Noviny. 2019. Lidé nemohou spoléhat jen na stát. Každý si musí spořit na své stáří [People can not rely exclusively on state support. Everyone has to save for their retirement]. Interview with Czech PM Andrej Babiš. *Lidové Noviny* 2 February 2019, 10-11. URL: http://ceskapozice.lidovky.cz/penzijni-reforma-kdo-vychova-vic-deti-bude-ocenen-fbh-/tema.aspx?c=A190206_014837_pozice-tema_lube

Luci-Greulich, A. and Thévenon, O. 2013. The impact of family policies on fertility trend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9(4), 387-416.

Lutz, W. 2014 A population policy rationale for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0(3), 527-544.

Ma, L. 2014. Economic crisis and women’s labor force return after childbirth: Evidence from South Korea. *Demographic Research,* 31(18), 511-552.

Ma, L., 2016. Femal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second birth rates in South Korea.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earch,* 33(2), 173-195.

Marczak, J., Sigle, W. and Coast, E. 2018. When the grass is greener: Fertility decisions in a crossnational context. *Population Studies*, 72(2), 201-216.

Martin, C. 2010. The reframing of family policies in France: processes and actors.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0(5), 410-421.

Matsukura, R., Retherford, R.D., and Ogawa, N. 2007. Declining fertility in Japan: Its mechanisms and policy responses.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 22(2), 33-50

Matysiak, A. and Szalma, I. 2014. Effects of parental leave policies on second birth risks and women’s employment entry. *Population*, 69(4), 599-636.

Matysiak, A., Vignoli, D. and Sobotka, T., 2018. The Great Recession and fertility in Europe: A subnational analysis. *Vienna Institute of Demography Working Papers*, No. 02-2018.

Matysiak, A. and Węziak-Białowolska, D. 2016. Country-specific conditions for work and family reconciliation: An attempt at quantific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32(4), 475-510.

McDonald, P. 2000. Gender equity,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future of fertility.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earch*, 17 (1), 1-15.

McDonald, P. 2002. Sustaining fertility through public policy: The range of options. *Population-E*, 57(3), 417-446.

McDonald, P. 2006. Low fertility and the state: The efficacy of polic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2(3), 485-510.

McDonald, P. and Bélanger, A. 2016. A comparison of fertility in Canada and Australia, 1926-2011. *Canadian Studies in Population*, 43(1-2), 5-22.

Miljkovic, D. and Glazyrina, A. 2015. The impact of socio-economic policy on total fertility rate in Russia.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37(6), 961-973.

Milligan, K. 2002. Quebec's baby bonus: Can public policy raise fertility? *Backgrounder*, 24 January 2002.

Milligan, K. 2005. Subsidizing the stork: New evidence on tax incentives and fertilit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3, 539-555.

Mills, M., Rindfuss, R.R. McDonald, P., and te Velde, E. 2011. Why do people postpone parenthood? Reasons and social policy incentives. *Human Reproduction Update*, 17(6), 848-860.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Republic of Korea. 2015. *The Current State of Low Fertility and Aging Population in Korea (SeroMazi Plan 2015).* URL: http://www.mohw.go.kr/m_eng/common/board_file_dn.jsp?BOARD_ID=3000& (accessed 20 March 2019)

Ministry of Labour and Social Policy, Republic of Bulgaria. 2007. *National Demographic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of Bulgaria 2006-2020*. English version available at https://ec.europa.eu/migrantintegration/?action=media.download&uuid=2A85DDFC-AC1A-622A-646A501234891A2E (accessed 20 March 2019).

Ministry of Labour and Social Protection of the Republic of Belarus. 2016.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от 14.03.2016 № 200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рограммы «Здоровье народа и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на 2016 - 2020 годы» [Decree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he Republic of Belarus No. 200 from 14 March 2016 "Nation's Health and Demographic Security of the Republic of Belarus in 2016- 2020"]. URL: http://mintrud.gov.by/ru/Gos_programma_Zdorovie_naroda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of Estonia. 2011. *Strategy of Children and Families 2012-20. Smart Parents, Great Children, Strong Society.*

Monnier, A. 1990. The effects of family policies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A re-evaluation. *Population: An English Selection* 2: 127-140.

Morgan, S.P. 2003. Is low fertility a twenty-first century demographic crisis? *Demography* 40(4), 589- 603.

Morgan, S.P. and Berkowitz King, R. 2001. Why have children in the 21st century? Biological predisposition, social coercion, rational choice.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17(1), 3-20.

Morgan, S.P. and Rackin, H. 2010.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behavior in the United Stat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6(1): 91-118.

Morgan, S.P. and Taylor, M. G. 2006. Low fertili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2(2006), 375-399.

Mörk, E., Sjögren, A. and Svaleryd, H. 2009. Cheaper child care, more children.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3942. http://ftp.iza.org/dp3942.pdf

Mulder, C.H. 2006. Home-ownership and family formation. *Journal of Hous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21(3), 281-298.

Mulder, C.H. and Billari, F.C. 2010. Homeownership regimes and low fertility. *Housing Studies*, 25(4), 527-541.

Myong, S., Park, J. and Yi, J. 2018. Social norms and fertility.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11744 (August 2018).

Myrdal, A. 1941. Nation and the Family. The Swed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tic Family and Population Polic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Myrskylä, M., Kohler, H.-P. and Billari, F.C. 2011. High development and fertility: Fertility at older reproductive ages and gender equality explain the positive link. *PSC Working Papers Series 10-3- 2011*,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RL: http://repository.upenn.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29&context=psc_working_papers

Myrskylä, M., Goldstein, J. and Cheng, Y.-H.A. 2013. New cohort fertility forecasts for the developed world: rises, falls, and reversal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9(1), 31-56.

Nagase, N. and Brinton, M. C. 2017.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and second births: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fertility in Japan. *Demographic Research*, 36(11), 339-370.

Neyer, G. and Andersson, G. 2008. Consequences of family policies on childbearing behavior: Effects or artifact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4(4), 699-724.

Ní Bhrolcháin, M. 2011. Tempo and the TFR. *Demography*, 48, 841-861

OECD. 1999.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Policy in Norway, Country Note. Paris: OECD Publishing. URL: http://www.oecd.org/norway/Early-Childhood-Education-and-Care-PolicyReview-Norway.pdf

OECD. 2006a. *Babies and Bosses. Reconciling Work and Family Life. A Synthesis of Findings for OECD Countries.*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06b. *Starting Strong II.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1. *Doing Better for Families*. Paris: OECD Publishing.

OECD. 2014. *Society at a Glance 2014. The crisis and its aftermath.* Paris: OECD Publishing. URL: http://www.oecd.org/els/societyataglance.htm.

OECD. 2017a. *The Pursuit of Gender Equality: An Uphill Battle*. OECD Publishing, Paris. URL: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81318-en

OECD. 2017b. *Starting Strong V. Transitions from early childcare education and care to primary education* Paris: OECD Publishing. URL: https://doi.org/10.1787/9789264276253-en.

OECD. 2019. *OECD Family Database* (Data on government spending on family benefits and childcare and education enrollment; Tables PF1.1 and PF3.2). URL: http://www.oecd.org/els/family/database.htm

Okun, B. 2013. Fertility and marriage behavior in Israel: Diversity, change, and stability. *Demographic Research*, 28 (17), 457-504.

ONS. 2018. *Childbearing for women born in different years, England and Wales: 2017.*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URL: https://www.ons.gov.uk/peoplepopulationandcommunity/birthsdeathsandmarriages/conc

eptionandfertilityrates/bulletins/childbearingforwomenbornindifferentyearsenglandandwales/2017

Pailhé, A. and Solaz, A. 2012. The influence of employment uncertainty on childbearing in France: A tempo or quantum effect? *Demographic Research* 26(1), 1-40.

Pall, K. 2018. Estonia. In Blum, S., Koslowski, A., Macht, A. and Moss, P. (ed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eave Policies and Research* 2018. URL: https://www.leavenetwork.org/fileadmin/user_upload/k_leavenetwork/country_notes/2018/FINAL.Estonia2018.pdf (accessed in April 2019).

Panova, R. and Buber-Ennser, I., 2016. Attitudes towards parental employment: a ranking across Europe, Australia, and Japa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Gender Studies*, 6(2), 11-37.

Parr, N. and Guest, R. 2011. The contribution of increases in family benefits to Australia's early 21stcentury fertility increase: An empirical analysis. Demographic Research, 25(6), 215-244.

Pension Fund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019. Maternity (Family) Capital. Summary information. URL: http://www.pfrf.ru/en/matcap/ .

Perelli-Harris, B. 2008. Ukraine: On the border between old and new in uncertain times. *Demographic Research*, 19(29), 1145-1178.

Pettit, B. and Hook, J. L. 2005. The structure of women's employ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ocial Forces*, 84(2), 779-801.

Philipov, D. 2003. Fertility in times of discontinuous societal change. In: Kotowska, I and Jóźwiak, J. (eds.) *Populati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Statistical Publishing Establishment, Warsaw, pp. 665-689.

Philipov, D. 2009.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outcomes: The role of policies to close the gap.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5(4), 355-361.

Plantenga, J. and Remery, C. 2010. *Flexible working time arrangements and gender equality. A comparative review of 30 European countries.* European Commission; Luxembourg: Publication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URL:https://publications.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13a65488-9cd7-46f5-b9f4-d60e3dd09592/language-en

Plantenga, J. and Remery, C. 2009. *The provision of childcare services. A comparative review of 30 European countries*. European Commission; Luxembourg: Publication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URL: https://eurogender.eige.europa.eu/system/files/the_provision_childcare_services.pdf

Põldma, A. 2014. Family Policies. Estonia (2014). *PERFAR. Population Europe Resource Finder and Archive*. Accessed in April 2019 at https://www.perfar.eu/policy/family-children/estonia .

Pötzsch, O. 2018. Aktualler Geburtenanstieg und seine Potenziale [Recent increase in births and its potential].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Wista* (3/2018): 72-89.

Pop-Eleches, C. 2006. The impact of an abortion ban on socioeconomic outcomes of children: Evidence from Romani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4(4), 744-773.

Poston, D.L. Jr. (ed.) 2018. *Low Fertility Regimes and Demographic and Societal Change*. Cham: Springer.

Präg, P. and Mills, M.C. 2017.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in Europe: usage and regu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ross-border reproductive care. Ch. 14 in: Kreyenfeld, M. and

Konietzka, D. (eds.) *Childlessness in Europe: Contex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Springer, Cham, pp. 289-309.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007.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09.10.2007 г. № 1351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5 года. [Executive order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No. 1351

from 9 October 2007 "On Approval of the Concept of the Demographic Poli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 the year 2025."] URL: http://kremlin.ru/acts/bank/26299 (accessed 21 March 2019).

Puur, A. and Klesment, M., 2011. Signs of a stable or provisional increase In fertility? Reflections on developments in Estonia. *Demográfia, English Edition*, 54(5), 31-55.

Radenacker, A., Krapf, S., Klüsener, S., Amtsberg, J. 2014. Family Policies. Germany (2014). *PERFAR. Population Europe Resource Finder and Archive*. URL: https://www.perfar.eu/policy/familychildren/germany .

Rahman, F. and Tomlinson, D. 2018. *Cross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intergenerational trends*. Report, Resolution Found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Commission. URL: https://www.resolutionfoundation.org/app/uploads/2018/02/IC-international.pdf (accessed 5 April 2018).

Raymo, J.M., Park, H., Xie, Y. and Yeung, W.J.J. 2015. Marriage and family in East Asia: Continuity and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1(2015), 471-492.

Resolution Foundation. 2018. A new Generational Contract.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mmission. Intergenerational Commission and Resolution Foundatiuon. URL: https://www.resolutionfoundation.org/app/uploads/2018/05/A-New-Generational-ContractFull-PDF.pdf

Rich, M. 2019. Japan's working mothers: Record responsibilities, little help from dads. *New York Times,* 2 February 2019. URL: https://www.nytimes.com/2019/02/02/world/asia/japanworking-mothers.html.

Ridao-Cano, C. and Bodewig, C. 2018. *Growing United: Upgrading Europe's Convergence Machine. World Bank Report on the European Union*.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The World Bank.

Rindfuss, R.R., Guzzo, K.B. and Morgan, S.P.. 2003. The changing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low fertility.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2, 411-438.

Rindfuss, R.R. and Choe, M.K. (eds.) 2015. *Low and Lower Fertility. Variations across Developed Countries*.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Rindfuss, R.R. and Choe, M.K. (eds.) 2016. *Low fertility, Institutions and their Policies. Variations across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Rindfuss, R.R., Guilkey, D.K., Morgan, S.P., Kravdal, Ø. and Guzzo, K.B. 2007. Child care availability and first-birth timing in Norway. *Demography*, 44(2), 345-372.

Rindfuss, R.R., Guilkey, D.K., Morgan, S.P. and Kravdal, Ø. 2010. Childcare availability and fertility in Norwa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6(4), 725-748.

Rosstat. 2019. Data on fertility rates in Russia in 2016-18 (in Russian). Russian Federation Federal State Statistics Service. URL: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ru/statistics/population/demogr ap hy/

Rovny, A. E. 2011. Welfare state policy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 level: A compar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1(4), 335-347.

Ruhm, C. J. 2000. Parental leave and child health.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19(6), 931-960.

Russian Presidential Academy. 2015. *Critical 10 years. Demographic polici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uccesses and Challenges*. Moscow: Russian Presidential Academy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RANEPA) and International Laboratory on Political Demography and Social Macro Dynamics. Available at (accessed 10 January 2019).

Salles, A. 2006. The effects of family policy in the former GDR on nuptiality and births outside marriage. *Population-E*, 61(1-2), 141-152.

Sanderson, W.C., Skirbekk, V. and Stonawski, M. 2013. Young adult failure to thrive syndrome. *Finnish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48 (2013), 169-187.

Santow, G. and Bracher, M. 2001. Deferment of first birth and fluctuating fertility in Sweden.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17, 343-363.

Schmidt, L., Sobotka, T., Bentzen, J.G and Nyboe Andersen, A. 2012. Demographic and med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postponement of parenthood. *Human Reproduction Update*, 18(1), 29-43.

Sironi, M. 2018. Economic conditions of young adults before and after the Great Recession.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39(1), 103-116.

Slonimczyk, F. and Yurko, A. 2014.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the maternity capital policy in Russia. *Labour Economics*, 30, 265-281.

Soare, F.S. 2013. Ceausescu's population policy: a moral or an economic choice between compulsory and voluntary incentivised motherhood? *European Journal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 2(1), 59-78.

Sobotka, T. 2004. *Postponement of childbearing and low fertility in Europe*.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Amsterdam: Dutch University Press.

Sobotka, T. 2008. Does persistent low fertility threaten the future of European populations? In: J. Surkyn, J., Deboosere, P. and Van Bavel, J. (eds.) *Demographic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A state of art in demography*. Brussels: VUBPRESS, pp. 27-89.

Sobotka, T. 2011. Fertilit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fter 1989: Collapse and gradual recovery.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36(2), 246-296.

Sobotka, T., 2016. The European middle way? Low fertility, family change, and gradual policy adjustments in Austria and the Czech Republic. In: Rindfuss, R.R. and Choe, M.K. (eds.) *Low Fertility, Institutions, and their Policies*.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pp. 131-163.

Sobotka, T. 2017. Post-transitional fertility: the role of childbearing postponement in fuelling the shift to low and unstable fertility levels. *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 49(S1), S20-S45.

Sobotka, T. 2019. Rapid increase in childlessness among women in in East Asia: A neglected "driver" of ultra-low fertility? Policy brief, forthcoming.

Sobotka, T. and Beaujouan, É. 2014. Two is best? The persistence of a two-child family ideal in Europ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0(3), 391-419.

Sobotka, T. and Beaujouan, É. 2018. Late motherhood in low-fertility countries: Reproductive intentions, trends and consequences. In: Stoop, D. (ed.) *Preventing Age Related Fertility Loss*, Springer: Cham, pp. 11-29

Sobotka, T., Hansen, M.A,. Jensen, T.K., Pedersen, A.T., Lutz, W. and Skakkebæk, N.E. 2008. The contribution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 to completed fertility: An analysis of Danish dat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4(1), 79–101.

Sobotka, T. and Lutz, W. 2011. Misleading policy messages derived from the period TFR: should we stop using it? *Comparative Population Studies – Zeitschrift für Bevölkerungswissenschaft*, 35(3), 637-664.

Sobotka, T., Skirbekk, V. and Philipov, D. 2011. Economic recession and fertility in the developed world.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7(2): 267-306.

Sobotka, T., Zeman, K., Potančoková, M., Eder, J., Brzozowska, Z., Beaujouan, É. and Matysiak, A. 2015. *European Fertility Datasheet 2015.* Vienna Institute of Demography / Wittgenstein Centre for Demograhy and Global Human Capital (IIASA, VID/ÖAW, WU). URL: http://www.fertilitydatasheet.org/

Spéder, Z. 2016. Fertility declin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low fertility in a changing policy environment—A Hungarian case study. In: Rindfuss, R.R. and Choe, M.K. (eds.) *Low Fertility, Institutions, and their Policies*.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pp. 165-194.

Spéder, Z., Murinkó, L. and Oláh, L.S. 2017. *Policy support and impact on third births in post-socialist Hungary.* Stockholm Research Reports in Demography, 2017/31; URL: https://doi.org/10.17045/sthlmuni.5602657.v1

Sperling, D. 2010. Commanding the "be fruitful and multiply" directive: Reproductive ethics, law, and policy in Israel. *Cambridge Quarterly of Healthcare Ethics*, 19(3), 363-371.

Stark, L. and Kohler, H.P. 2002. The debate over low fertility in the popular press: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1998–1999.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1(6), 535-574.

Šťastná, A. and Sobotka, T. 2009. Changing parental leave and shifts in second and third-birth rates in Austria. *Vienna Institute of Demography Working Papers* 7/2009.

Statistics Norway. 2018. *Facts about education in Norway – key figures 2016*. Oslo: Statistics Norway, Division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URL: https://www.ssb.no/en/utdanning/artikler-ogpublikasjoner/_attachment/335543?_ts=160b64995e0

Statistics Sweden. 2019. Summary of Population Statistics 1960-2018. Stockholm: Statistics Sweden. URL: https://www.scb.se/en/finding-statistics/statistics-by-subject-area/population/populationcomposition/population-statistics/pong/tables-and-graphs/yearly-statistics--the-wholecountry/summary-of-population-statistics/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2019. Period Total Fertility Rates in Germany, eastern Germany and western Germany, 1990-2017. Wiesbaden: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URL: https://www.destatis.de/DE/Themen/GesellschaftUmwelt/Bevoelkerung/Geburten/Tabellen/geburtenziffer.html (accessed 16 April 2019).

Steiber, N., Berghammer, C. and Haas, B. 2016. Contextualizing the education effect on women's employment: A cross - 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8(1), 246-261.

Stloukal, L. 1999. Understanding the 'abortion cultur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David, H.P. (ed.) *From Abortion to Contraception. A Resource to Public Policies and Reproductive Behavior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from 1917 to the Present.*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pp. 23-37.

Szelewa, D. and Polakowski, M. P. 2008. Who cares? Changing patterns of childcare in Central and

Thébaud, S. 2010. Masculinity, bargaining, and breadwinning: Understanding men's housework in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18(2), 115-131.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paid work. *Gender & Society*, 24(3), 330-354.

Thévenon, O. 2011. Family policies in OECD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7(1), 57-87.

Thévenon, O. 2016.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policies on fertility in France: Lessons from the past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In: Rindfuss, R.R. and Choe, M K. (eds.) *Low fertility, Institutions and their Policies. Variations across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pp. 49-76.

Thévenon, O. and Gauthier, A.H. 2011. Family polic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 'fertilitybooster'with side-effects. Community, Work & Family, 14(2), 197-216.

Thévenon, O. and Solaz, A. 2014. Parental Leave and Labour Market Outcomes: Lessons from 40 Years of Policies in OECD countries. *Documents de travail,* No. 199, Paris: INED. URL: http://hdl.handle.net/20.500.12204/AWRH4_Jdgpz89Adag43x

Thompson, R. and Lee, C. 2011. Sooner or later? Young Australian men's perspectives on timing of parenthood.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16(5), 807-818.

Tsuya, N.O. 2015. Below-replacement fertility in Japan: Patterns, factor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Chapter 5 in: Rindfuss, R.R. and Choe, M.K. (eds.) *Low and Lower Fertility*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pp. 87-106.

United Nations, 2015. *World Population Policies Database*.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Policy section. URL: https://esa.un.org/poppolicy/about_database.aspx .

United Nations, 2017.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7 Revisio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URL: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ublic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17-revision.html

UNICEF. 2018. *TransMonEE 2016 Database*, Geneva: UNICEF Regional Office for CEE/CIS (released in June 2018). URL: http://transmonee.org/database/

UNFPA 2016a *Population Situation Analysis in the Republic of Moldova*. Chisinau: UNFPA,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and Centre for Demographic Research, NIER. URL: *https://moldova.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pub-pdf/PSA_engleza.pdf*

UNFPA 2016b: *Demographic Security Policy Concept for Georgia 2017-2030*. Tbilisi: UNFPA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and Parliament of Georgi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FPA. 2018. *The Power of Choice. UNFPA State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Report 2018*.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URL: https://www.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pubpdf/UNFPA_PUB_2018_EN_SWP.pdf

Van de Kaa, D. J., 1996. Anchored narratives: the story and findings of half a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 *Population Studies*, 50, 389-432.

Vandenbroeck, M. 2003. From Crèches to Childcare: constructions of motherhood and inclusion/exclusion in the history of Belgian infant care. *Contemporary Issues in Early Childhood*, 4(2), 137-148.

Van Eekelen, R., Scholten, I., Tjon-Kon-Fat, R.I., van der Steeg, J.W., Steures, P., Hompes, P., van Wely, M., Van Der Veen, F., Mol, B.W., Eijkemans, M.J. and te Velde, E.R. 2017. Natural conception: repeated predictions over time. *Human Reproduction*, 32(2), 346-353.

VID. 2018. *European Demographic Data Sheet 2018*. Vienna Institute of Demography (VID)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 (IIASA), Wittgenstein Centre (IIASA, VID/OEAW, WU), Vienna. URL: www.populationeurope.org

Vignoli, D., Drefahl, S. and De Santis, G. 2012. Whose job instability affects the likelihood of becoming a parent in Italy? A tale of two partners. *Demographic Research*, 26, 41-62.

Vikat, A. 2004. Women's labor force attachment and childbearing in Finland. *Demographic Research*, 3(8), 175-212.

Wall, G. 2004. Is your child's brain potential maximized? Mothering in an age of new brain research. *Atlantis: Critical Studies in Gender, Culture & Social Justice*, 28(2), 41-50.

Wall, G. 2010. Mothers' experiences with intensive parenting and brain development discourse.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33(3), 253-263.

Wells, M. and Bergnehr, D. 2014. Families and family policies in Sweden. In Robila, M. (ed.) *Handbook of Family Policies Across the Globe*.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pp.91-108.

Westley, S.B., Choe, M.K. and Retherford, R.D. 2010. Very low fertility in Asia: Is there a problem? Can it be solved? *AsiaPacific Issues* (Analysis from East-West Center), No. 94-2010.

Wilkins, E. 2019. Low fertility: A review of the determinants. *Working Paper* No. 2 (July 2019), Technical Division Working Paper Series, New York: UNFPA, Population & Development Branch. URL:https://www.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pubpdf/FINAL_Determinants_of_low_fertility.pdf

Wilson, C. 2004. Fertility below replacement level. *Science*, 304(5668), 207-208.

Zakharov, S. 2016. The modest results of the pronatalist polic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long-term evolution of fertility in Russia. Part 1. [In Russian]. *Demographic Review*, 3(3), 6-38. URL: https://demreview.hse.ru/article/view/1745/2468

Zakharov, S. (ed). 2018.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И. Двадцать четвертый ежегодный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Population of Russia. 24th annual Demographic Review]. Moscow: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URL: https://id.hse.ru/books/225078536.html

Zegers-Hochschild, F., Adamson, G.D., Dyer, S., Racowsky, C., de Mouzon, J., Sokol, R., Rienzi, L., Sunde, A., Schmidt, L., Cooke, I.D. and Simpson, J.L. 2017. The international glossary on infertility and fertility care, 2017. *Human Reproduction*, 32(9), 1786-1801.

Ziebe, S. and Devroey, P., 2008.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are an integrated part of national strategies addressing demographic and reproductive challenges. *Human Reproduction Update*, 14(6), 583-592.

人口学相关词汇中英文对照表

【高频词词条索引】

人口学词汇

更替率（replacement rate）
生育率（fertility rate）
分孩次生育率 （parity-specific fertility rate）
意愿生育数（intended number of children）
时期生育率（period fertility）：
时期总和生育率 （period total fertility）
辅助生殖（服务） （assisted reproduction）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终身生育率（completed fertility rate）
队列生育（cohort fertility）
生育间隔（birth interval）
生育推迟（delayed parenthood）
高龄生育（higher reproductive age）
完整家庭规模（completed family size）
进度效应（tempo effect）

政策类词汇

一揽子政策（policy package）
带薪育儿假（paid parental leave）
非用即失（use it or lose it）
利益分配 （allocation of benefit）
现金补贴（cash benefit）
财政转移（fiscal transfer）
税收优惠（tax advantages）
直接补偿（direct compensation）
产假（maternity leave）
陪产假（paternity leave）
托育服务（childcare services）
国家社会主义（state-socialist）
性别平等主义（gender egalitarianism）

【分章节词条索引】

第一章

<u>人口学词汇</u>

出生率（birth rate）
老年人口（aging population）
理想生育率（desirable fertility rate）
活产（live birth）
终身队列生育率（Completed cohort fertility（CTFR））
进度与孩次调整总和生育率 (Tempo- and Parity adjusted Total Fertility （adjTFRp））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s，TFR）
辅助生殖（服务）（assisted reproduction）
卵细胞捐献（oocyte donation）
代孕获得的父母身份（surrogate parenthood）

<u>政策类词汇</u>

家庭政策（family policy）
全民动态参与计划（plan for dynamic engagement of all citizens）
工作方式改革（work style reforms）
关爱儿童的友好型社会（childrearing friendly society）
性别分工（gender division）
教育热（education fever）

第二章

<u>人口学词汇</u>

中等低生育率（moderately low fertility）
很低生育率（very low fertility）
超低生育率（ultra low fertility)
极低生育率（lowest low fertility）
更替率（replacement rate）
生育率（fertility rate）
时期生育率（period fertility）:
时期总和生育率　（period total fertility）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终身生育率（completed fertility rate）
队列生育（cohort fertility）

第三章

人口学词汇

生育水平（fertility level）
生育目标（fertility target）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政策类词汇

医疗保健（health care provision）
住房法规（housing regulation）
劳动力市场法规（labor market regulation）
辅助生殖（assisted reproduction）
税收政策（taxation policy）
儿童友好环境（child-friendly environment）
直接补偿（direct compensation）
分配现金补贴（allocation of cash benefits）
终身免征（life-long exemption）

第四章

人口学词汇

进度调整总和生育率（tempo-adjusted TFR）
时期生育率（period fertility rates）
新移民（new-coming migrants）
晚育年龄（later childbearing ages）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终身队列生育率（completed cohort fertility）
队列生育率（cohort fertility）
生育时间（timing of births）
家庭规模（family size）
终身生育率（completed fertility）
进度调整总和生育率（tempo-adjusted TFR）
平均生育年龄（mean age at childbearing）
生育高峰（peak childbearing）
生育提前（earlier childbearing）
生育间隔（birth interval）
传统总和生育率（conventional TFR）
进度与孩次调整总和生育率（Tempo- and Parity-adjusted Total Fertility）
婴儿潮（baby boom）
生育水平（fertility level）

孕产资本（maternity capital）
新生儿（newborn children）
辅助生殖周期（AR cycles）
辅助生殖活产数（AR live births）
终身队列生育率（completed cohort fertility rate）
非计划生育（unplanned births）
生育决策(fertility decision)
生育意愿(fertility intention)
迁入率(immigration rate)

政策类词汇

性别角色（gender roles）
一揽子家庭政策（family policy package）
儿童福利（child benefits）
带薪育儿假（paid parental leave）
双职工家庭（dual-earner families）
育儿假（parental leave）
全日制学校（all-day schools）
托育设施（childcare facilities）
育儿费用（childcare costs）
产假（maternity leave）
机构式儿童托育服务（institutional childcare）
日托机构（daycare facilities）
儿童津贴（child benefit）
免税资格（tax allowances）
一揽子政策（policy package）
财政货币转移支付（financial cash transfers）
家庭福利（family benefits）
税收减免（tax reductions）
国家社会主义制度（state-socialist system）
财政紧缩（budget constraints）
预算削减（budget cut）
生育津贴（baby bonus）
性别规范（gender norms）
家庭政策（family policy）
带薪假期（paid leave）
国家社会主义（state-socialism）
育儿津贴（childcare allowance）
带薪产假（paid maternity leave）
鼓励（多）生育主义政策（pronatalist policies）
政策组合（Policy bundles）
公共儿童托育服务（public childcare）
儿童托育服务（childcare provision）

学龄儿童（school-aged children）
非用即失（use it or lose it）
财政激励（financial incentives）
财政转移（financial transfers）
金钱激励（monetary incentives）
经济紧缩（economic austerity）
劳动力市场政策（labor market policies）
天使计划(Angel Plan)
合作伙伴奖金 （partnership bonus）
非全日工作（part-time employment）
现金照护计划（Cash-for-care scheme）
财政转移补助（financial transfers）
现金转移补助（cash transfers）

第五章

<u>人口学词汇</u>

生育决策 (reproductive decision)
性别规范 (gender norm)
生育权利 (reproductive right)
现代避孕方法 (modern contraception)

<u>政策类词汇</u>

国家社会主义政策（state-socialist policy）
性别薪酬差距 (gender pay gap)
孕产资本 (maternity capital)
政策兼容性 (policy compatibility)
不连贯政策 (incoherent policy)
育儿假 (parental leave)
政策目标性 (policy targeting)

编译说明

低生育率已经成为全球性现象，由此带来的少子化、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近期发布的两卷应对低生育政策报告以实证为基础，深入介绍了多个典型低生育率国家的生育率发展趋势，及其相关人口和家庭应对政策，分析了影响生育率的多方面因素，总结了政策的实施效果，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研究资料。

两卷报告内容丰富，涉及人口、政策、经济、社会等多领域中英文专业术语的互译，专业性较强，我们组织了多学科背景的人员进行翻译。为方便中英对照、消除可能存在的歧义，我们特意在中文版本中增加了中英词汇对照表，以方便读者阅读时使用。

本次报告由联合国人口基金和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共同翻译，由贾国平博士和陈功博士负责组织。以下为参与具体翻译的人员名单：

第一卷（按姓氏首字母排序）：崔牛牛、郭超、胡玉涵、金鑫、康宁、李娜、李宁、林进龙、刘天俐、罗雅楠、曲别娟娟、孙计领、孙晶晶、孙永臻、汪洋、王振杰、卫雅伦、魏玥、吴振东、武继磊、于奇、张蕾、张新辉、张雅璐。

第二卷（按姓氏首字母排序）：陈思诺、黄成烨、李佳佳、林是琦、刘岚、刘尚君、刘艳、索浩宇、王黎、杨帆、钟逸靖。

第一卷报告由张蕾博士、张雅璐博士负责校译，第二卷报告由刘岚博士、杨帆博士负责校译。张雅璐博士和胡成花女士负责了大量协

调组织工作。两卷报告最后由贾国平博士和陈功博士负责审核和校译。

翻译过程中得到十二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国际智库专家委员会主席、蓝迪国际智库专家委员会主席赵白鸽，十三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等领导和专家的鼓励和支持！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英文报告一直在修改完善中，中文报告翻译时间较紧，限于认识和水平等，肯定还存在不足和欠准确之处。敬请各位同行专家及读者批评指正，以便进一步修订过程中改进。

报告中文编译组

2021 年 7 月 9 日